俄羅斯研究 注道涵题

目 录

• 俄罗斯与亚太研究专辑 •

专论

3 熊光楷 /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 太和平与稳定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新秩序

- 10 冯绍雷 /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 24 B· Π· 拉林 / 愿景的方向与可能性的边界: 对俄罗斯制定 21 世纪上半叶亚 太地区战略的几点意见
- 42 申 韬 / 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 斯亚太战略

历史视野中的俄罗斯与亚太

- 67 林精华 / 俄印超常关系二百年与俄国的 印度学
- 116 松里公孝 / 1884 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 的创建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 构
- 151 曹 群 / 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 178 吴若痕 / 中国的"瓦西里"与他的俄罗 斯朋友——走私者与他们的跨文化 身份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宇 编: 陈大维(常务)

杨成

刘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出版日期:2013年4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3 年第2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3年第2期(双月刊)

Contents

Xiong Guangkai
Promoting Sino-U.SRussia Relations, Main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Pacific Region·····(3)
Feng Shaolei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0)
V.L. Larin
Vectors of the desired and limits of the possible: some remarks on Russia's
strategy in Asia Pacif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XXI century
Shen Tao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Russian Asia-Pacific Strategy in an Era of
Changes (42)
Lin Jinghua
Russia-India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200 Years and Indian Studies
in Russia
Kimitaka Matsuzato
The Creation of the Priamur Governor-Generalship in 1884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siatic Russia(116)
Cao Qun
On Russian Sea Power Strategy before the Russo-Japanese War (151)
Sören Urbansky
"Vasily" of China and his Russian friendsSmugglers and Their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

Gen. No. 180

专 论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能光楷**

【内容提要】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对此地区的战略关 注不断加大: 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 的参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交 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 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 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 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 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 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

【关键词】亚太战略 中美俄三边关系 新发展 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02-0003-(7)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继续发着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亚太地区作为新兴国 家最集中、经济发展最活跃、各方利益交汇最密集之地,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聚焦亚太地区, 既顺应了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反映了 三方的共同关注。2012年是国际政治的"大选年",中、美、俄都进行了领 导层的新老交替,这不仅会对三边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也将直接影响三方在

^{*} 本文系熊光楷上将在"第六届中美俄三边关系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该学术研 讨会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协办,于2013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熊光楷上将授权本刊发表此文,本刊在此衷心地表示感谢。

^{**} 熊光楷, 上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原会长。

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当前,中美俄三边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三方在亚太地区互动得到加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同时,影响三边关系长远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需要我们积极加以应对。下面我重点讲三个问题。

一、当前中美俄三边关系在亚太的新发展

随着亚太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三方不断加大对亚太的战略关注,中 美俄三边关系成为影响亚太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一)亚太成为中美俄三方更加重要的战略舞台。过去一年里,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外交上强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美领导人频繁访问亚太国家,总统奥巴马胜选连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东南亚;经济上积极推动美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安全上强调经略亚太是"美国家安全团队的首要任务",推出新版"防务战略指南",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参与。进一步将亚太明确为俄外交的一个优先方向。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亚太是"发展最快的地缘政治空间,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正在向其转移"。去年以来,俄成功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亚太议会论坛第21届年会等重大活动,大力推进与亚太国家的务实合作,加快了融入亚太经济圈的步伐,对亚太事务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是亚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为亚太共同繁荣创造了更多机遇。中国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等多个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亚洲安全稳定的坚决维护者,为促进地区的和平安宁作出了重要贡献。
- (二)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交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与奥巴马总统互致信函,就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对话磋商机制也日臻完善,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的重要成果。中美战略与安全对话成功举行,亚太事务磋商深入推进,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等达成新共识,两国还隆重纪念了尼克松访华40周年。安

全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中美两国海军举行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美方还邀请中方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两国高层保持密切沟通,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不断提高,特别是今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选择俄罗斯和几个非洲国家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意义重大。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已迈上新的台阶,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88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最大的贸易伙伴,俄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人文合作和民间交流蓬勃发展,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日益密切。双方共同制定了未来10年两国关系发展规划,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美俄双方保持对话的连续性,双边关系取得一定进展。近期,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同意避免采取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举动。俄正式加入WTO,美取消实行了38年的对俄贸易制裁,美俄贸易和投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制约中美俄关系持续发展的深层矛盾犹存。美国坚持对台军售立场,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连续发表不当言论,不仅给亚太地区平添紧张因素,也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美俄两国围绕人权、地缘政治、反导等战略平衡与稳定问题的矛盾依然存在。中俄经贸合作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中美俄关系在亚太互动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亚太地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三方在亚太地区开展合作,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对多重挑战。

(一)中美俄在亚太的共同利益深入拓展。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亚太地区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发布的报告预测,2013年亚太地区整体经济将增长6.3%,高于2012年的5.6%。亚太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必将为中美俄三边合作提供新的活力和动力。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是三国共同的利益。发展离不开安全,共赢离不开合作,亚洲的经济发展与地区安全稳定密不可分。亚洲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二战后较长时期总体和平稳定的"安

全红利"。当前,安全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安全与发展问题联系更加密切,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更加紧密。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符合中美俄三国的共同利益。**推动亚太经济发展与合作是三国共同的目标。**近年来,三国积极推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亚太经济技术合作,亚太地区多个自贸区建设深入推进,对亚太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中美俄联合成立非主权国际评级机构,表明三方致力于通过深化合作推进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推动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 (二)中美俄关系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外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近期,美外交安全团队进行了新的人事布局,美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反思,可能对美中、美俄关系带来一些积极影响。但有些美方人士仍坚持"冷战思维",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抗出发来处理与中俄的关系,推动新一轮对台军售,加快推进亚太反导建设,增加了亚太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半岛局势存在进一步紧张升级的可能。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出招惹事。南海问题也受到多种因素干扰。
- (三)中国将在促进三方亚太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致力于塑造和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亚太地区负责任的一员,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维护中美俄三边关系健康发展,愿与美俄携手共进,通过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合作等各种渠道,推动三方合作向更宽领域和更高水平发展。中国欢迎美俄等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亚太地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区,亚太事务应由亚太地区各国协商解决。我们欢迎美俄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太平洋足够宽广,应能容得下中美俄的共存与合作。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携手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三、对推动三边关系发展、维护亚太稳定的有关建议

中美俄三边关系在维护亚太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一)增强彼此战略互信,确保亚太总体稳定。战略互信是稳定的基石,相互尊重是信任的支撑。中美俄应着眼维护亚太战略全局稳定,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进一步加强高层互动和对话磋商,切实尊重他国的核心和重大利益,不断扩大战略共识,夯实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深厚根基。
- (二)完善地区合作模式,累积亚太合作基础。随着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中美俄在亚太的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三方应从维护地区持续发展与长期繁荣出发,创新合作理念,拓宽合作渠道,夯实利益基础,加强在地区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加强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等新兴领域的协调,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赢未来,努力构筑亚太地区全面合作的新模式。
- (三)加大安全事务磋商,有效管控地区威胁。亚太地区多种文明交汇, 热点问题集中,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分歧交织。针对地区热点问题和海 洋争议,中美俄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责任加强安全磋商,发挥积极影响, 多做劝和促谈的工作,少做火上浇油的事情,防止局部问题扩大化、地区问 题国际化,努力避免危及地区安全稳定的事件发生。
- (四)加强核安全合作,维护亚太持久和平。核安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核威胁是亚太地区面临的紧迫问题。中美俄三国应携手合作,确保核材料安全,防止核扩散,坚决防范核恐怖主义。在当前朝鲜核问题复杂敏感的情况下,中美俄更需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防止半岛局势失控,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合作促进共赢,互利带动发展。当前,亚太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俄三方应以世界的眼光、世纪的眼光和战略的眼光,深入思考三边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全面规划在亚太地区的对话与合作,坚持相向而行,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路径,共建和平稳定、繁荣美好的新亚太。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strategic position of Asia-Pacific,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are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this region. The U.S. implements further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while Russia get more involved

in the Asia-Pacific affairs and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affairs. There is intensified interest convergence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three powers. China and the U.S. are committed to constructing new power relations,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mutual trust reach a new level, and the U.S.-Russian relations show signs of improvement. Meanwhil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U.S.-Russian relationship still faces certain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hot issues may affect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enough space for Sino-U.S.-Russian cooperation. These three powers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existing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and even create more, enhancing strategic mutual trust, deepen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effectively regulating contradictions as well.

【Key Words】 Asia-Pacific Strategy, Sino-U.S.-Russian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New Progress,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Т Аннотация **Т** С рост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Китая,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расти: США углублен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я увеличила своё участие в дела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Китай продолжает играть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в дела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Совпаде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трёх сторон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тёт,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созда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вышли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в америка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оявились признаки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Между тем, углубл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 -америка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ерьёзн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развитие вопросов «горячих точек» региона может повлиять на развитие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азвити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США и России, три страны должны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сширя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точки пересеч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постоянно создавать новые точки совпад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укрепля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оверие, углублять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эффективн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е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вызов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оверие

(责任编辑 陈大维)

Gen. No. 180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新秩序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冯绍雷**

【内容提要】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吸引全世界眼球的聚焦点。这一地区很可能 成为当今世界在一个较长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该地区也是世界 上发展水平和治理模式最具多样性的一个区域。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 的大国, 当前两国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俄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 可能成为一个可以通过相互"内化"以求得相互支持的合作过程。两国在亚 太地区开展的合作非常有可能超出以往的深度与规模, 两国联手合作有可能 具有改变力量格局的动能。在安全事务方面,中俄两国元首在2013年的联 合声明中,提出了有关地区安全的新构想;在经济合作等方面,中国的城市 化进程、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为中俄在亚太地区的合作留下了巨 大的空间。针对面向亚太未来的中俄关系,还需要对若干理论和战略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亚太地区 新型大国关系 中俄关系 亚太安全 亚太经济 【中图分类号】D822(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02 -0010-(14)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心逐渐地向亚太地区转移, 地处太平洋两侧和欧 亚大陆腹地的中国与俄罗斯及其双边关系, 势必会面临一次全新的机遇和挑 战。而这次中俄两国共同面临的发展战略调整,很可能比以往几十年的历次 变化都将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 目批准号: 07JJDGJW251)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首先是由于中俄两国本身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总体来看,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以往几十年所认为的"改革"或"转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意义。过去几十年中所说的"改革"或者"转型",较多地是指如何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法制和民主制度的过渡,特别是注重以欧美先进国家为范例来推进这种过渡。而当前中俄两国所经历的变化,除了依然包含有上述重要内容之外,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重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应对地区和国际权力转移所带来的挑战等等使命。这些内容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或者"转型"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各种条件和目标大体上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中俄这两个大国在亚太 地区开展的合作就非常有可能超出以往的深度与规模,从而给这个异常不确 定的世界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由于中俄两国各自特有的资源禀赋、独特的 历史文化、大国的实力规模、初步实现的改革和发展格局、包括从以往几十 年的挫折、教训中所获得的深刻体验和所形成的思想高度及远见,使得这两 国联手合作不仅有可能具有改变力量格局的动能,而且更可能从精神上和心 理上提振信心,为一个更加多样化发展的世界注入活力。

几乎所有预言都认为,亚太乃是当今世界一个较长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因为这一地区不仅聚集了身处危机但综合实力强大的美国、积三十年发展优势并继续有望保持增长的中国、以及虽经天灾人祸但实力依然雄厚的日本等经济大国;并有着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疆域最为辽阔、且显示出很大经济发展潜能的俄罗斯;同时,还有着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发展中、转型中新兴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当这一地区占世界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的水平,而传统的欧洲迄今依然陷于金融危机困顿之下而难以自

拔的时候,不能不成为吸引全世界眼球的聚焦点。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水平和治理模式最具有多样性的一个区域。这里有着历来被视为是以发达的民主和市场体制为治理模式的强大国家,也有着迄今依然保持着冷战时期的统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困难国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乃是一大批或是比较接近于前一种模式、或是依然尚处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其治理模式的谱段之五光十色为世界之最。这种难得的多样性进程既为地区发展带来极大变数与磨难,但同时也为未来形塑成熟体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和条件。

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这一地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区域,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与本地区临近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外,往往还与区域外的地区和国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贸易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这一地区整体的区域合作依然只能保持 APEC 这样松散的势头,难以像欧盟那样形成一个具有相对共同的货币、内部贸易水平大大高于外部贸易水平的相对共同拥有的市场。2011年之后,美国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计划正日益接近于迫使每一个亚太国家作出选择,这使得当地原来进行中的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正面临着重新组合的考验与挑战。

亚太地区治理模式多样性的背后乃是该地区文化与宗教的多样化。因为,这里不像欧洲地区那样有一个覆盖整个区域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传统,相反,儒学、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互相参杂,在各地各显神通,使得区域治理模式难以归一。国际政治中的区域文化与治理模式的对应性特征在亚太地区正在得到证明。

与这样一种多头并立的文化格局相对应的乃是亚太地区的自然地理状态,也因大洋和高山大川阻隔而呈现高度多样化的局面,远不像欧洲总体上以大陆平原为主的地理面貌。环境和人文两者的结合使得亚太地区的发展有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气质,崇尚和谐融合与循序渐进成为这一地区所特别关注的政治原则。

在上述背景之下,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独具特色。这里不光聚集着 冷战局面形成以来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尚未统一的国家:南北朝鲜和中国; 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也在这里隔洋对望;尤其是地处广大文明结合部的俄罗斯一直努力以交通东西、连接南北作为其立足和发展的支点,而无论国际国内情势如何艰难,始终追求发挥自身独特的国际影响。近年来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紧张与波折,大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占优势的局面,同时也没有根本改变冷战后国际合作依然占主导方向的趋势。但是错综复杂的形势表明,这一地区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对于政治经济空间的炽烈竞争,而且,有关未来国际主导权花落谁家的诸多议论,始终以该地区多样化、多方向的发展进程为重要背景。^①

=

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虽然有着不一样的历史经历,国内体制和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本区域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但是,相似的命运和抱负推动着这两个大国在面对目前的挑战时共赴时艰,促使着中俄两国要学会处理复杂背景之下的利益交叉与纠结,而且将致力于实现协同奋斗之后的互利共赢。^②当前中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两国新上任的领导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之中有望对国家进行稳健和有效的治理。在这样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期中,两国精英阶层可以根据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对于本国现代化建设和双边关系作出全面的部署。中俄两国政治历史上同时出现这样的契机是一个难得的政治条件。具有复杂历史的大国治理从来就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治理。除了需要有公正有效、切合实际的治理模式,政治家个人的作用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当着中俄这两个紧密比邻的大国都处于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也处于在未来国际格局中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中俄两国领导人能够互相沟通、密切合作,不仅对于两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关乎国际大局。正因为如此,人们欣慰地听到习近平主席在首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见

① 参见冯绍雷:"远东地区: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安全认知",《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

② 参见冯绍雷:"'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俄罗斯研究》, 2011年第5期。

面之后说,他和普京"很谈得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①

当前中俄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说明我国将中俄关系置于优先发展方向之一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决策。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并强调中俄关系乃是当前最好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表明中国选择最佳、最优伙伴时并不简单机械地以哪个国家最富有、或者哪个国家最强大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综合地考量公平、正义、安全、利益、与时机的合宜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中国在选择伙伴关系时,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选择关系成熟、双方有着较多共识、较少问题的国家作为伙伴。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全局意义的中美关系就不重要,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于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就不重视,更不意味着中国不把最重要邻国之一的日本置于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首先发展中俄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序地展开整个新型大国关系的系列构建过程。

当前中俄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在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改革 攻坚和结构转换的临界状态。虽然国情背景和制度文化不同,但两国这一发 展阶段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会使中俄两国 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个可以通过相互"内化"以求得相互支持的合作过程。 作为一系列重要国际组织成员的中俄两国,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遵守一 般国际规范与准则,但都坚持以本国国情和切身利益为依据来选择自己的现 代化道路。中俄两国在营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的同时,都不可避 免地显现出追求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强烈热情和愿望。中俄两国都力求坚持 创新、清廉、和谐与公正的治理模式,连两国的具体政策措施中都有不少相 似和可以相互借鉴之处。两国各自优势的取长补短,以及习近平主席访俄后 的中俄联合声明中点明的两国体制和政策的"对接",非常有可能切实推动 这一对双边关系的优化和提升。^②

第四个特点是,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俄两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参与重大国际决策、拓展中俄国际影响空间的关键时期。就

① "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22932.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3 年 3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3/c 124494026.htm

地区层面而言,中国支持俄罗斯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而俄罗斯支持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北极理事会,推动与中国在北冰洋大陆架地区的资源勘探合作,并呼吁为中国进一步参与中东多边的事务拓展空间。^①在全球层面上,中俄之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事务等所进行的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中,中俄两国势必能作出重要建树。

几

中俄关系虽然在客观上面临如此重要而有利的发展机遇,但依然存在着不少发展中的困难。

其一,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像俄罗斯那样具有几起几落复杂历史的基督教(东正教)大国与一个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东方大国——中国,有着这样全面而直接的交往与接壤。从蒙古鞑靼占领一直到中苏同盟,两种相距遥远的文化居然能够在千年历史中数度大规模地超越时空而接触交融。而且,在经历了既是异常紧密的命运关联、又是利益与意愿冲突之后,依然能够互相包容共存。近日,俄东正教大牧首来华访问并受到最高礼遇的接待,就是一个证明。但这段复杂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记忆和忧患,不可能迅速消散。

其二,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俄两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和差异,两国交往中的种种思想的、体制的、物质的准备也显得不足,这与实际利益和思想理念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制约着中俄关系的发展。虽然,两国政治精英之间有了高水平的交往,但是,民间的相互认知水平仍然有待于大大提升;两国的利益互补性格局虽然清晰,但还远远没有在各项具体交往中得到落实;两国由于同处于发展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而自然产生的"外溢"和"外部性"问题,同样会引起新的利益与观念的冲撞。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最近对于中俄关系的评价来说:"旧的疑虑尚未消除,又产生了新的问题"。^②

① V.V. Naumkin, "Russia an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No.9, 2013.

② Sergey Karaganov, "Xi in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19 March, 2013.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Xi-in-Russia-15898

其三,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若干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于中俄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自然会存在种种顾虑与疑惑,其中必然会有人依然对中俄关系竭尽分化和牵制之能事。当着现代外交中依然是西方国家具备更加纯熟的技巧,当着国际学术界依然是西方规范占据主导地位,当着世界媒体还依然是西方话语显示优势,尤其是当着西方所拥有的实力使其能够用"武器的批判"来遏制"批判的武器"的时候,上述挑战势必将会长期存在。

五

就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而言,目前至少是因以下两种思潮的影响而呈现 出复杂的局面。

首先,期待对日益激化的国家间地区间竞争采取"势力均衡式"的地缘政治方法来加以解决,主张运用实力之间的平衡抵充和运用优势的战略遏制来维持既有格局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认为"新地缘政治"时代正在到来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问题在于,这种传统的国际政治方法虽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但是,每当设定力量平衡的目标之时,往往出现的结果是,既定格局中的每一方不光是追求平衡,而且还要追求超出于对方势力并取得优势的余额。在英文当中,这一余额也通常被称为"balance"。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还是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大体上并没有超出一般"势力均衡"的逻辑。这样一个看似旨在实现平衡、实际却是在被反复提升的竞争局面中,蕴含着各自争抢优势的无穷危机。

对于构建亚太区域安全多边体制的诉求中,明显可以看到来自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动、同时也得到了若干地区经验证明的区域多边安全构想。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大国的成长都须融合在一个多边合作的国际环境之下,才能够保证区域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二战以后,战胜国对于一个曾经强大的德国进行肢解,并以一系列国际多边组织加以制约,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想法。冷战结束之际出现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德国"用一个马克换来了自身的统一",亦即用拱手相让自己的经济主权、接受所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支配的方式,换得欧洲各国对于德国政治统一的认可。无疑,这种被"新自由主义"

理论家所推广的欧洲经验,依然是值得各国思考和借鉴的推进地区安全的一种先例。实事求是地说,"势力均衡式"的地缘政治安排所不能遏制的竞争,也的确有可能被消化吸收在某一种成熟的多边体制之内。但是,问题在于亚太地缘政治环境和亚太国家成长的历史经历都大不同于欧洲以及德国。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是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亚太地区也不具备立即照搬欧洲式的多边安全机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两国元首在 2013 年的联合声明 中所突出的一系列有关地区安全问题的新构想。其一,中俄主张以互信、互 利、协作为基础的普遍平等、不可分割的共同安全与集体安全,坚持用和平 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反对颠覆别国的合法政权,主张建立亚太地区的"开放、透明、平等、 包容的安全合作的架构"。这一立场出自于对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现实的考 量,显然远远超越了只追求自身安全的"绝对安全"的立场,也区别于仅仅 以武力追求"平衡"和照搬欧洲安全模式的做法。其二,面对当下紧迫的安 全挑战,中俄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虽然并没有指涉具体的国家,但严肃而 明确地主张在国际法框架内以政治与外交手段应对弹道导弹的扩散。同时, 也表明了不能以一部分国家的安全去损害另一部分国家安全的公正立场。这 一态度不光是应对当下的朝鲜半岛问题,而且也是应对亚太其他热点冲突问 题的应有立场。其三,中俄双方郑重声明,要在事关领土和主权等核心利益 问题上互相支持,要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成果,特别是声明要加强 两国在反导问题上的互相理解、沟通和支持,反对一国或国家集团单方面无 限度地以反导武器相威胁。这是一个从未被如此强调过的新的共同立场与合 作领域。①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摆脱金融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3 年 3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3/c 124494026.htm

危机影响之后的亚太地区从总体上说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推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使得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有可能面临重新分化的格局。

这一背景之下的中俄经济合作对于地区的发展前景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未来十多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不光是今后五年总共10万亿美元的海外采购、5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以及4亿人次的海外旅游将大大地拉动中国经济和亚太地区的互动,[©]同时,俄罗斯巨大的经济潜能,包括其无比丰厚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条件、以及人文教育资源,有可能形成与整个地区的紧密互补而发挥巨大优势。

仅从东亚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还是东盟诸国,今后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资源、环境、土地等诸方面,而就此而言,恰恰是近在咫尺的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有着几乎能够满足所有这些发展条件的要素。按照俄罗斯著名能源企业家卢克集团总裁阿列克佩罗夫在其新著《俄罗斯石油: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记载:俄罗斯现有石油储量还可以使用36-40年,天然气储量可以使用75-80年。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俄罗斯拥有进一步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规模的一切必需条件。^②除此之外,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为数绝少还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今后若干年中除了能源资源将成为重要的投资品而被炒作,农粮资源也将成为另一个被炒作的投资品。俄罗斯专家所津津乐道的还有来自贝加尔湖的几乎是取之不尽的淡水资源,这几乎是当今世界最后一处甚至不用大量投资即可以被商业化的大片净水资源。^③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为中俄合作留下了余地。俄方规划,从 2010 年至 2025 年,远东地区人均住房面积将从 19 平方米增加到 32 平方米,住房建设将有很大空间。加上其他

①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2013 年 4 月 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 115296408.htm

② [俄]B·阿列克佩罗夫:《俄罗斯石油:过去、现在与未来》,石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9-412页。

③ 参见"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 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各类道路、桥梁、机场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筹划的领域, 需要作出合乎双方意愿和长远利益的制度性安排。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近年来被热炒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和开放, 也绝对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可以即刻启动的项目。这是一个事关经济、政治、 安全等诸方面复杂背景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推动深入全面的专项研究。

以近来受到高度关注的北方海域通道问题为例,鉴于北极附近的北方海 域由于暖冬已经初步出现了4-5个月的通航期,于是,沿东北亚地区的海域 北上,经白令海峡,沿俄罗斯北方海域进入已可初步通航的北冰洋地区,直 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一条贸易通道的打开,成为未来国际经济贸 易格局中的一个新因素。无疑,这对于亚太地区、北极地区、北欧地区、包 括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都将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对俄罗斯来说, 虽然它决不会放弃其对于北极地区的地域优势, 但这是关系到远东、西伯利 亚开发的一个难得机遇,无论是基础设施、贸易通道、沿线开发等方面都将 有所得益。对于美国来说,这也可料想是一个可以期待的重要市场与航线, 特别是未来其页岩气产品可经过这一通道向欧洲输出,同时这也将是其参与 远东和北极事务的一个重要通道。而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资源、贸易、物 流方面,还是战略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 选择北方海域通道沿线的几个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推行这一项多边大 型合作,可能既符合目前在当地出现的人口、物流相应集中化的态势,也可 避免因深入远东、西伯利亚腹地而造成不必要的疑虑,同时也有利于北方海 域通道今后的运行。

七

面向亚太未来的中俄关系,需要对若干理论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未雨绸缪。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气候与交通条件特殊的大陆国家,尤其是在远东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究竟是否可以简单地用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加以解释?对此,西方学

者早就有所讨论。^①近年来的西方学术界在提出"能源诅咒"理论之后引起了普遍的争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未必就一定导致市场经济的无法发展。^②从中俄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往往存在着既运用市场原则,又有不受其限制的必要与可能。中俄天然气合作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市场原则和长远战略需求相互结合的典型例子。同时,在"页岩气革命"搅动整个能源格局、欧洲能源需求有所降低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可能不对亚太出口市场特别加以关注;但是从中方来看,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之内未必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能源需求结构。因此,如果我们不仅考虑能源供需关系的变化,而需更多地着眼于政治与战略大局,有条件、有步骤地接纳俄罗斯参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为推进中俄能源谈判寻找到更多进行利益互换和需求互补的回旋空间。

就战略而言,中俄合作不可能不涉及与美国的关系。从冷战年代开始,中美苏三边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始终激荡人心的问题。当今条件下的中美俄关系问题已经具有了与当年不一样的背景和语境。在如今的国际条件下,尽管局部地区一再出现若干危机临界状态,但是,与冷战时代相比,一是没有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必要,二是没有了全球军事抗衡,三是没有了全面结盟对峙这样的局面。中俄美三边关系已经大体上不再是全面对抗性的那样一种大国关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制衡又是一种常态,任何双边关系都有一个对于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必一定是一个国家,可能是一组国家)的影响和制约的考量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三边关系的互动乃是国际政治历史上的一种常态。从当今发展来看,中俄关系大幅度地推进,既是相互间合作与发展的需要,但也不可避免地是对于外在制约和挑战的一种抵御。所幸的是,在中俄关系推进的同时,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也几乎同时在不同层面和领域保持着积极的调整和合作的深化。比如,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之后当即传来的关于美国考虑不再在东南欧设置第四期

① Fiona Hill, Clifford Gaddy, *The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Out in the Co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ix-xi.

② 关于俄罗斯"能源诅咒"问题,参见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以及李沛:《"资源诅咒"视角下的俄、澳资源模式比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反导系统的信息,说明中俄接近的背景之下,美俄合作依然有所推进;而时过两月,习近平主席于6月初的访美,显然说明中美关系同时也获得了进展。

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如何在理论上和战略上进一步加深对于新型的大国三边关系的理解,显然这将是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按照基辛格博士的看法,任何权力均衡的做法都还必须有一个道义的底线,也即任何权力政治的运用都还必须在注重功利目标的同时,坚持公正和正义。

也许,对中俄关系发展趋势的认识还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一种判断。以我所见,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在不断遭逢内外各种艰难险阻的情况下持续地向前推进,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动力的。其中重要的动因之一,乃在于中俄都参与其间的全球化态势及其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与三十年前相比,全球化已经不再是由"华盛顿共识"来独自推动的一种潮流,而是有着更多观念和思想的加入,其中包括"中国梦"和俄罗斯的大国抱负等一类观念的强劲推动。全球化进程也不再是只有起自于私有部门和市场机制的激发,而是有着远为多样的参与者的加盟,其中特别是以国家、政府为背景的大企业集团的介入,使得原来仅以自由主义导向来解释全球化的观点显得单薄。2012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显然是这一动向的一个理论反应。^①当然,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已经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争论而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在此背景之下的资金、商品、技术、人员的流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比较单一的由西方和发达地区流出的趋势,现在正逐渐地改变为西方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双向流动。正是这样一种潮流的变化,带动着中俄关系一齐朝向前行。

说到底,中俄关系的发展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变化,也即是世界多样化发展趋势的不可遏制。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乃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变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80 年代末,预感到东欧阵营即将发生变化,福山预言今后将不再会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对阵,得出了所谓"历史的终结"的结论。三十年之后,

① "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Spread of a New Sort of Business in the Emerging World will Cause Increasing Problems", *The Economist*, 21 Jan., 2012. 另外还可参见张昕: "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俄罗斯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福山又发表了他自己同样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在这部著作中,福山认真地反思了为何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这一现象缺乏认知,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还远远缺乏足够的重视。在这部书中,福山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在于"善治"与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民主固然是必得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民主和"善治"的相互关系还远待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还远未有定论。①这一变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今世界变化的深刻性已经使得西方主要的思想理论家对于二、三十年前自己结论的理论渊源都在作认真的反思,而作为当事者的中国和俄罗斯,就更有必要认真总结制度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思考世界变化发展的可能趋势,勇于实践和创新,包括理论思想的创新,以使得中俄两国的合作不仅为新时期大国关系的构建作出铺垫,而且也真正地为两国人民谋福祉。

【Abstrac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is area may be the fastest growing region bo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in current world in a rather long period. Meanwhile, this region is also a region with the most diversification either in development levels or in governance models on the ear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wo great powers in Asia-Pacific,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The modernization in both countries can become a cooperative process for mutual support through mutual "internalization". Both countries'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is very likely to go beyond the past depth and scale, their coordinative cooperation will become a dynamic for power changes in this region. As to security affairs, new concep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Sino-Russian Joint Statement in 2013. A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have left enormous space for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Regarding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in Asia-Pacific, various theoretical and strategic issues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1.

need to be explored further.

【Key Words】 Asia-Pacific Region,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 -ship,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sia-Pacific Security, Asia-Pacific Economy

【Аннотац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центром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внимания миров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Этот регион вполне возможно станет регионом с наиболее быстрым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азвитием в мире 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длительном периоде времени; данный регион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гионом с самым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ми в мире уровнями развития и моделя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являются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х нынешн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тупают в нов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Процес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может стать процесс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заимной «интереализации» целях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вусторонн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превзойдёт предыдущую глубину и масштаб,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может облад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ом измен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у власти. В вопроса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совместном заявлении 2013 г. выдвинули новые иде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обла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и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оцесс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Китая,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и Сибир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 Китаю и России огром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вести углублен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ряд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удущег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责任编辑 封 帅)

愿景的方向与可能性的边界

对俄罗斯制定 21 世纪上半叶亚太地区战略的几点意见

B • **川** • 拉林*

【内容摘要】为了成功融入亚太、促进其太平洋地区发展,俄罗斯需要提出新的战略规划。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战略应成为俄罗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总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在21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一个政治项目。不过,一个正确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型也十分关键。改变该地区社会经济以及人口状况的尝试如果失败,那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思想压力。为了有效、成功地实施其太平洋政策,莫斯科应公开摒弃整个远东——从极北纵深向南——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的观念。这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将会导致精力与资金的分散。为保障地区居民能享受一样高的生活质量,它应在选择经济增长带(区)和集中人口的基础上,做出有利于崭新的空间地理发展模式的选择,将远东变为吸引人前来生活的地方,并塑造一种和谐的经济结构。俄中央和地方政府应从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的利益出发,解决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俄罗斯 远东 亚太地区 发展战略 中央-地方关系 【中图分类号】D73/77(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2-0024-(18)

在制订有关发展东部各地区以及使俄罗斯与亚太一体化的各类规划、战略与方案方面,新世纪的头十年或许已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丰富的一个阶

^{*} В • Π • 拉林 (В. Π . Лари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

段。早在 1986-1987 年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C.Горбачев)就公开宣布了这些任务,而克里姆林宫的继任者们也反复肯定该任务的重要性。因此,在解决此任务时出现的停滞更迫使俄罗斯的领导人们不断地关注这个问题。一方面,中国迅速崛起,印度和越南经济发展成功,世界经济增长和政治活跃的中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与力量场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区域发展的关键进程中,俄罗斯却不出席、不参与、不施加影响,而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些俄罗斯自己的亚洲领土上——发生着社会经济的衰退,这都让俄罗斯感到不安、急躁和窘迫,并要求俄罗斯采取行动。

2009 年 12 月 28 日,俄联邦政府签署第 2094 号政府令,批准了命途多舛的《2025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①而到了 2010 年 3 月 17 日,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Д. Медведев)发布 713 号总统令,要求制定新的文件——《俄联邦与亚太国家发展合作战略与 2050 年前远东社会经济发展预测》(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Ф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ТР и прогноз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о 2050 г.),该战略旨在"确定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合作中最重要的方向,论证并预测远东地区确保实现俄罗斯利益的经济发展"。负责战略制定的权威委员会由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维•伊•伊沙耶夫(В.И.Ишаев)院士主持,委员会曾深入研究相关技术难题,并请有关专家提供相关材料,但是,事情似乎也就这么结束了。

参与远东地区发展战略与规划制订的有优秀的政治家、政府要员和严谨的学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也对 2050 年前远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预测。^②这些"职业战略家和规划家们"已多次应一些俄罗斯州长、市长和有抱负的政治家的需要,为地区发展制订战略,其中也包括远东地区,因此他们在此领域已是如鱼得水。天然气专家、石油专家、能源专家、铁路专家一一来自俄罗斯经济所有领域的代表们配置了自己的"战略必需品"。

①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ода. http://www.minregion.ru/activities/territorial_ planning/ strategy/federal development/346/(检索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

②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2050 (Синтез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гнозов: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2050). Под ред. П.А. Минакира, В.И. Сергиенк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11. С.912.

战略和规划很多,而实际成果却为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建造了直达滨海边疆区南部海岸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同时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份额从2007年的17.1%上升至2011年的23.2%——这就是亚太"一体化"的所有可见成果了。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该地区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下降,而在生活水平上与俄罗斯欧洲地区和邻近国家、地区的差距也在拉大。五年内,政府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政支持,但总体来说收效甚微。看来,克里姆林宫对战略规划实施十分不满,这促使其在2012年秋天的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实现国家长期规划的基础上提高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和人口发展水平》^①这么一个议题。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如此明显而又锲而不舍地想要解决问题、使这潭死水变活的愿望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祸害的根源在哪里?毫无疑问,仅有愿望是不够的。会不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坚信的那样,俄罗斯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特性正是"俄罗斯长期不能……成为亚洲和/或亚太地区的强国,也长期不会在保障亚洲安全的事务中扮演独立角色"的主要原因?[®]将俄罗斯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重新定位在"市场现实和纯资本主义方向"能解决问题吗?[®]我们认为,情况显然比这更复杂,问题的根源也更深。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提出一套自己的战略基础要素。战略不是规划,战略是前进的思想。我在此再重复一遍,俄罗斯必须要有一种这样的战略,"建立在严格的连续性之上,利益——目标——任务——威胁——决策,一种有清晰目标、务实任务和可实现成果的战略……终于是时候明确表述并公之于众了:俄罗斯为什么需要远东、中国、日本、东亚和亚太地区?这一战略应为俄罗斯的整体,尤其是其东部地区,清晰地构建'东亚价值'的垂直线。"[®]我们绝不试图在此领域内和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专家们竞争,我们给

① О повышении уровн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рограмм.

② S. Blank, "Russia's Failure in Asia",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24, 2010, Oct. p.82.

③ S. Blank, "At a Dead End: Russian Policy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Demokratizatsiya*, 2009, Vol.17, No.2, p.139.

④ Ларин В.Л.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АТР в начале XXI в, Влвдивосток: ИИАЭ ДВО РАН, 2011, С.56.

自己提出的是一个更简单的目标:对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并试着探索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感谢研究所的同仁,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 关系专家,他们参与讨论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合作的发展战略,并为其出谋划 策。2011 年 9 月,他们的提议经汇总,并以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名义递交 至哈巴罗夫斯克的俄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处。

论俄罗斯在亚太的战略

我将从几个基本前提开始我的论述。我认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尤其是 其远东沿海地区的行动都应当建立在这些基本前提的基础之上,并据此决定 战略的关键参数:

第一,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战略一定是俄罗斯在东亚及亚太地区总战略的一部分。第二,当今的俄罗斯不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玩家,因此,除了"使俄罗斯的内外战略有效适应"地区发展的大趋势之外,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对俄罗斯来说,"不参与跨太平洋的安全、合作与共同发展空间的形成进程"就是它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冒险^①。第三,制定战略规划应当从现在的出发点开始。这个"出发点"不应该是良好的愿望,而应当是对能力和可实现的范围的冷静评估。做一个描画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者很容易,因为除了过度乐观之外,在这样的规划里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了。而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却要指出面前的坎坷、崎岖、困境与危机,这比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要难得多:会有人指责他不爱国,会有人诬蔑他的良好用心,还会有更多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与之相应,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互动^②以及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发展的一整套战略都应基于以下三大支柱:

①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2030.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вариант. Под ред. Акад. А.А. Дынкина. ИМЭМО РАН. М.: Магистр, 2011. С. 443, 449.

② 笔者在此处所用的"亚太地区"和"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概念更多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亚太地区包括"面向"太平洋的东亚国家(北起中国、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也包括现在与太平洋地区关系紧密且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即指:从贝加尔湖开始到东部(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在经济上与太平洋地区息息相关的俄罗斯地域。

- 对全球及区域范围的进程和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和后续监控;当区域局势发生原则上的变化时,对现有的评估、结论和政策进行调整。原则上说,无论是亚太地区国家还是俄罗斯本身,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做的。可实际上,在该地区各国中,俄罗斯本身往往会被顽固地忽视,而许多预测都在方向和结果上产生了分歧。
- 评价俄罗斯的客观利益和能力。无论在俄罗斯本土还是在国外,做到这一点都需要花大力气。对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的朋友和对俄罗斯不怀好意的人来说,提出一个审慎的方案都是十分困难的。
- 为使这些利益和俄罗斯在区域进程中的建设性影响成为现实,应选择合适的手段。这也十分困难,因为即使除去内外障碍,可采用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最困难的是根据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采用一系列相应的政治决策,之后再选择经济和社会手段来促进其实现。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及未来发展战略决定了俄在此地区将扮演什么角色?而这个角色是俄远东地区(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发点。客观上俄罗斯没有能力在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因此俄罗斯首先需要评估当下的形势,预测这个——它如此渴望融入的区域——的地缘政治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远景,并以此为出发点。亚太地区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体系的特点如下:

首先,结构相对稳定,建立在双边关系和军事政治同盟(美-日,美-韩)的基础之上,并对其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 尽管中国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关键玩家的行动和政策,但这一新的力量中心 还未成形。^①第二,在亚太地区没有一致的地缘政治利益,政治互信极低。^② 为了保障安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与立场主导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而这又是建立在各方对立并优先考虑军事政治威胁的基础上的。第三,

① 就这一问题,一位美国专家十分悲观地指出,"亚太地区的其他大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或是加入北京的后备军并对其俯首称臣,或是通过结盟的方式来抵抗中国,平衡中国的力量。" 参见 S. F. Szabo, "Welcome to the Post-Western World", *Current History*, 2011. Vol.110, No.732, p.12.

② 详见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in Northeast Asia: texts of reports, Vladivostok: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Peoples of the Far East, FEBRAS, 2011.

地区的(文明的)特性和历史记忆显著影响着各国与地区优先战略的形成, 也影响着其实现机制。

因此,俄罗斯积极参与到这一体系中去,正在打破已有的平衡。如今,在全球、欧洲和中东问题上,俄罗斯政府时常与美国和北约对立,与北京站在同一阵线上。在东亚政治这一层面上,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理论上会导致重返冷战时期的格局,尤其当俄罗斯被推向在朝鲜与台湾问题上表态时更是如此。^①因此,对俄罗斯政府来说唯一可靠的战略决策是:将俄罗斯东部视作俄罗斯政治和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在优先考虑该地区利益的基础上,自主权衡俄罗斯在太平洋政治中的战略重心。

亚太地区经济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 1、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原材料、财政、人力资源、技术)来进行长期高效的发展。这些资源不平均地散布在亚太各区域,这既为有效的生产合作创造了适宜的条件,也可能产生残酷的竞争。
- 2、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时甚至在一个国家之内也会产生这种情况(例如中国)。
- 3、尽管制造中心会逐步在亚太地区和个别国家内部迁移,但亚太地区 无论是现在还是可见的未来都将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对亚太地区的大 多数国家来说,国际贸易的意义尤其巨大,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极 大地相互依存。
- 4、现代经济一体化才刚刚在亚太地区打通一个入口,但还没有在整个 地区建立完整的结构。
- 5、在亚太地区发展自由市场尚有不少严重障碍(签证、海关和出入境的规章制度是劳动力、资本与商品转移的障碍),这也限制了跨国公司的能

① 总的来说,俄罗斯往亚太地区靠拢的初步定位很可能吓到一些西方分析家,使他们神经紧绷。例如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就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巩固其"大国"地位,他一心想把俄罗斯的政策向欧洲和西方转移,并总结说:"俄罗斯从骨子里希望和西方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在未来几十年里,俄罗斯可以从中国和一些非西方国家获得它所必需的投资,但俄罗斯若希望经济现代化、发展能源领域,则这些必需的技术和决窍只能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里找到。"参见 Грэм Томас. Россия и остальной мир// Россия-2020: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д ред М.Липман и Н.Петрова. Моск.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М.: РОССПЭН, 2012. С.33.

力。

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与民族文化特点的总和决定了其发展动力的作用具有多元性和多向性,这些动力能够将亚太地区引导至不同方向。如今在这些力量中占主导地位的有:

- 国家利益和国际矛盾。目前这个因素几乎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中占据优先地位:
- 以保障国家安全作为首要任务。除朝鲜的核计划,亚太地区几乎没有威胁安全的因素,而对威胁的意识本可以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促使其共同行动;
- 生态因素和自然气候因素。亚太地区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大,使得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变得至关重要;
 - 跨国公司的利益^①;
- 各区域的利益与抱负。比方说,中国政府支撑着东北三省的发展需求,该需求极大地影响了中俄关系的特点与方向,也保证了图们江项目的长期存续:
 - 科技进程,尤其是在能源和军事领域的进步;
- 民族构成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如今在中国、越南、印度这样人口 众多、快速发展的国家,人口性别和年龄的结构与质量正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而这也将引起极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亚太地区的主要发展趋势和政治决定因素可以列成如下的图表(参见表 1),这张表揭示了未来数十年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有利条件、挑战与威胁。当 然,对这张表还可以进行扩充。

① 详见 Луконин С.А. Роль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корпораций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тран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римере Япо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и КНР): дис. ... канд. экон. Наук. М., 2008. 219 с.; Ph. De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Pacific Regionalism", *Trade Working Papers 21836*,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а 2030 一书的各位作者则认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势力和所扮演角色都有所增长,参见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2030.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вариант... С.370-371.

一般因素 积极因素 危险因素 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全球经济与商业的活 全球对立中心从大西洋 速度加快,居民福利 跃中心转移至亚太地 地区转移至太平洋地 水平提高;区域一体化 区;资源竞争加剧。 X 基础形成。 国家利益, 而不是区 域利益或全球利益, 民族国家的稳定性 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 在政治中居主导地位 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武装力量的增加和完 国家努力保证本国安 全的责任的共同认识 善, 本国军工复合体的 有所增长。 发展,军备竞赛。 统一的经济环境和信 该地区各国家为世界原 息环境作为共同利益 料市场和市场营销展开 全球化 的基础出现。 竞争。 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性 提升并扩展,与西方 文化环境和谐化 各文明间矛盾加剧 价值观相对立

表1 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影响亚太地区的关键因素

对未来的几十年进行预测是一件毫无风险的事情,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后很少还有人会记得这些预测。但如果考虑到研究者的声誉,那么做这样的预测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不过我们还是试着对二十一世纪中叶亚太地区的发展提出我们的预测。

- 在全球国际关系中,亚太这一分支成为世界主流。
- 亚太地区将形成多极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将与美国一起成为亚太地区关键的政治玩家(同时还有统一的朝鲜、印度、东盟和日本这样的强力玩家)。
 - 国家同盟将合力建成跨亚洲和欧亚的交通网、物流网和能源网。
 - 生态将成为决定经济决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 与对安全的非军事威胁所进行的斗争将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合作的 首选之一。
- 一些政治军事紧张的源头将消失(例如朝鲜半岛和台湾),但由于 领土争端,地区冲突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岛屿和大陆架,南亚和 东南亚)。

对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发展和区域发展趋势进行评估,让我们可以论及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战略重心。而对俄罗斯东部来说,将亚太地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与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当下的发展进程相对照,也能大致勾画出风险和威胁的范围。同时,我以俄罗斯亚太地区的现状作为出发点,我的前提是:国家的发展及其重中之重——人的利益——将是俄罗斯在此地区的主要利益。

表2 对俄罗斯的风险与威胁的评估以及必要的战略决策

风险	威胁	战略决策	
国内			
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的 速度和水平落后于地区领先 国家	无能力参与地区生产合作	在地区国际劳动分工中确 立并巩固自身专长领域	
	技术、能源和生产上对个别 国家和个别大型跨国公司的 依赖达到了临界状态。	投资人力资源、教育、基 础学科和高科技发展。	
	远东地区生活水平与毗邻地 区的差距增大,远东地区人 口流失。		
	在经济和政治上对邻近地区 (首先是中国)的依赖达到了 危险的程度。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限定对 邻国依赖程度,调整国家 之间关系的性质。	
军事技术潜力落后,军事力 量平衡改变且对俄罗斯不利	邻国的领土要求(日本、中国、统一后的朝鲜)	在合理、足够的范围内加强亚太地区的国防力量。	
	俄罗斯未参与亚太地区弹道 导弹防御体系的形成	积极与美国就军事战略问 题进行对话	
俄罗斯未参与亚太地区经济 与政治机制的建立	回避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决策	通过政治和财政手段保证 俄罗斯参与亚太地区组织 与结构构成之中	
由于中美力量平衡的变化与 影响范围的转变, 地区安全 体系平衡被打破	边境沿线的军事政治紧张局势	维持亚太地区的力量平 衡,避免被迫在中美之间 选择其一的情况。	
	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活 跃化	国际间情报合作	

	对居民生命与健康的全球性 和区域性威胁加深、加强(生 态问题、流行病、自然灾害 和技术灾害等等)。	下,制定确保俄罗斯太平	
毗邻地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 (朝鲜半岛北方、中国)	在俄罗斯太平洋地区施加的 人口和宗教压力	为争取地区合作与发展进 行国际合作	
国 际			
未能成功将太平洋地区转变 为推进俄罗斯进入亚太的桥 头堡	俄罗斯融入亚太任务宣告失 败	制定并施行与俄罗斯现实 和能力相符的太平洋地区 发展战略	
选择的区域发展模式与该地区的能力与需求不相符	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与俄罗 斯融入亚太的计划宣告失败	逐步建立对太平洋地区发 展战略实现和修正的监控 体系	
远东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进一 步落后于俄罗斯其他地区和 邻国	太平洋地区社会分化加深, 社会紧张度增强,人口流失 与人口负增长。	制定保证远东地区人口数量的战略	
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对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东方"文化扩张",居民民族结构变化,"亚洲分离主义"。		
远东地区知识潜力的消耗, 由于邻国更具吸引力导致人 才流向邻国	亚太地区的区域竞争力水平 下降(知识潜力,人口质量)	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人口 "吸引点"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以及俄罗斯人内部威望下降(在亚洲国家吸引力增强的背景下)		

如此一来,俄罗斯预防内外威胁的战略决策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方面: 积极(而非偶尔)参与区域各国为确保区域安全而实施的区域政策与措施; 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现实和俄罗斯政府的能力出发,制定、实施并实现俄罗 斯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整体发展战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选择优先战略也具有 同样重要的意义。根据其重要程度,我将它们按以下的顺序排列。

职能优先级

1. 外交政策方面:

- 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在区域事务中成为独立的一"极")
- 维护和平的环境
- 增加战略伙伴和盟友
- 名副其实地参与到区域结构之中

2.经济方面:

- 能源——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它客观上都是俄罗斯与亚太一体化的主要方向
- 将远东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跨太平洋地区的交通与物流系 统联通
 - 稳定的自然资源销售市场的存在与多样化
 - 平衡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积极发展生产合作
- 在使用亚太地区自然资源的同时,从中获取利润与优势,维护并发 展太平洋的生物资源
 - 3.文化方面:
 - 在亚太地区塑造俄罗斯的有利形象
 - 在亚太地区文化空间中推进俄罗斯文化
- 积极促进文化交流,使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居民适应亚太地区的文 化与传统

4.社会方面:

- 发展民间外交
- 发展兄弟城市与友好城市
- 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非政府组织

5.安全保障方面:

- 维护地区军事政治稳定;
- 协助调解区域争端:
- 保证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粮食、能源和生态安全。

地理优先级

第一,中国。中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是俄罗斯的主要经济伙伴,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俄罗斯最具前景的产品销售市场(不仅仅是原材料销售),也是物流交通、服务与旅游业的巨大市场。从国际政治和保障地区安全的角度来说,在大部分全球和区域事务中,中国都是俄罗斯的伙伴和志同道合者。同时,中俄之间漫长的边境和历史经验使得双方十分重视维持这段无冲突的双边关系。为使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有所建树,与中国的合作具有关键性意义。同时,在中国境内高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将阻碍远东地区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第二,美国。尽管美国在全世界和亚太地区起着主导作用,但由于先天的地理环境,美国不能在亚太地区成为俄罗斯战略决策的重心。这主要是因为美俄关系传统上建立在全球和欧洲范围之上。在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太平洋视角的开拓,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都尚需时日。

第三,朝鲜半岛。朝鲜核计划、朝韩对话与统一的问题从解决前到解决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亚太地区所有大国关注的中心。除此之外,由于俄罗斯与日本关系较为紧张,在短期或中期首尔都将是"俄罗斯在东北亚的首要现代化伙伴"[©]。

第四,印度。考虑到其人口数量、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印度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第五,日本。尽管俄日之间领土争端尚未解决,但只要两国领导人不将 其拔高到首要位置,并利用此事塑造国家主权维护者的形象以赢取政治威 望,俄日关系的发展仍有很大潜力。

第六,蒙古。第七,越南。第八,东盟。

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发展战略

在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优先级的排列对制定战略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必须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规划是否是一个经济或政治项目?

① Тренин Д.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2020: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д ред. М.Липман и Н.Петрова. Моск.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М.: РОССПЭН, 2012. С. 65.

实现这一规划能否给俄罗斯带来收益和利润?或者只是为解决各种国家问题创造一个政治平台?

我相信,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更多是一个政治项目。在所有可见的将来,远东的地缘政治地位仍将在俄罗斯内政外交中占主导地位。然而,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失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与思想负担,而为了保住远东的领土,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承受此负担。投资远东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可以减轻国家为维持它们所需要的总支出。

因此,俄罗斯东部和亚太地区政策以及远东地区的发展战略的优先级按如下顺序排列:

其一,保护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东部边境的安全;

其二,为全国的需要和利益,也为了发展远东地区的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亚太地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潜力,形成相应的思想、方法和机制:

其三,保证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居民过上满意的生活;

其四, 使远东地区的领土依然是俄罗斯的生态储备。

该战略的实现取决于目标、需要和现有资源。

目标,一是使国家这一部分领土依然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基本要素,也 是俄罗斯作为一个亚欧和太平洋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二是将 远东地区转变为俄罗斯亚太地区牢靠的基建、知识和经济后盾。

实现战略的资源并不像所说的那么匮乏,而是有多种多样的。重要的是,需要有强大的政治资源:领导者对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的认识,为俄罗斯谋求太平洋大国地位,以及维护东部地区领土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与俄罗斯欧洲地区的现有判断截然相反,如今在东部地区缺乏经济和民族分离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这是因为人们将东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趋同化与分离主义混为一谈了,尽管在亚太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和宗教组成部分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土壤必然会形成。

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则较小:虽然远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且与周边国家的边境和地区联系发展成熟,但必须指出,该地区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竞争

力还很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原因)^①,且没有投资吸引力(由于较 差的投资环境)。

2025年前的远东发展战略决定了今后十年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原则,但这样的模式和原则无法巩固其经济资源。远东地区原料出产与中转的功能将最终得以固化,与周边国家(日本、中国、韩国)的技术差距也将拉大。远东地区将在经济和技术上更加依赖他国,尤其是中国。再加上能源网(能源管道和电力网)和统一的交通物流网的关系,远东将牢牢地依附他国。使远东继续保持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桥头堡和地缘政治空间地位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如今该地区的社会人口资源情况最为糟糕:人口数量正在灾难性地下降。如果目前的政策持续到2025年,则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人口数量将会减少到500万至550万,民族结构将会改变,平均知识水平下降,人口质量恶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将加剧。无人区和荒地的面积也将增加。而在亚洲邻国极易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情况下,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与上述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密度也将失衡,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思想和道德心理资源也不容乐观。民意调查显示,远东地区的居民对当局、尤其对中央的信任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而居民在远东生活的意愿也十分薄弱。^②

因此,对既有目标和实现它们的现有资源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假设出在制订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发展战略时的几个原则性要求。

第一,必须转变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领土的观念和意识。先前所做的所有规划,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发展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生产力,而此观念应当被发展人力潜力的战略所替代。

第二,需要从立法上来巩固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为 亚太地区的经济投资、生产发展、国际关系和人口活力营造特别的条件。

① 为了避免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争论,我们要指出:一些评估显示,为维持亚太地区当地居民和经济所付出的支出比欧俄地区大四倍。参见 K.Mueller, M.J. Bradshaw, "OPTIMIRUS Simulating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6, No.22, p.108.

②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А.Л.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н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эволюция взгляд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иаука, 2011. С.87-94.

第三,国家应当公开摒弃所有地域一同发展社会经济的观念,这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将会导致精力与资金的分散,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在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障地区内所有居民能享受一样高的生活质量,应当在划分经济增长带(区)和集中人口的基础上,作出有利于崭新的空间地理发展模式的选择。

一级地带——"战略稳定地带"。这里包括的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支撑点"(大符拉迪沃斯托克、南萨哈林斯克、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马加丹)和"加速发展的边境地区":如下边境城市——克拉斯金诺、黑瞎子岛、布拉戈维申斯克、外贝加尔斯克。

在"支撑点"的重点,是建造国内与国际间的基础设施,积累知识资源 (科技、教育),发展高科技工业、渔业和海洋文化。在上面提到的四个城 市中,后三个是由于目前的人口数量而被列入。对全世界和亚太地区来说, 符拉迪沃斯托克应当成为俄罗斯非正式的东方首都,是俄罗斯在东部主要的 政治、交通和物流中心,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基点,也是吸引知识和财政 资源的中心。为此必须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提供中央直辖市的地位,并为来自 俄罗斯和国外的居民提供相应的行政权利和经济优待。

"加速发展的边境地区"的一个重要资源是来自邻国中国的人口潜力。 必须在这些边境地区保障俄罗斯中小型公司的优惠待遇,吸引俄罗斯和外国 投资,最终实现中俄边境经贸区协议,而在将经贸区扩展至指定区域后,这 些经贸区的发展将成为目前还在空转的中俄关于远东合作发展和复兴中国 老工业基地规划的方向。

二级地带——"经济稳定地带",即工业发展活跃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城)。

三级地带——过渡地带。人口将从三级地带平稳地迁移到一级和二级地带。

毫无疑问,实现任何战略地区发展规划都需要很高的成本,因此必须划分战略优先顺序。根据重要性,战略规划按以下顺序排列:

首先,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如果不对发展和巩固人力资本进行认真投资,很快在远东地区的经济难题就无人可以解决了。

其次,权力、行政系统和公民社会。如今对俄罗斯全国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低效管理和腐败,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建立高效的行政系统和公民社会。

第三,知识经济、科学与高科技。和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在生产领域上更有竞争力)这样的国家比邻而居,远东地区在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若想在生产上具有竞争力,只能通过国家扶持和关税保护政策,或是在科技成果领先的基础上在个别领域有所突破。

第四,地区国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必须实现工业、农业和交通从贸 易到生产合作的转型。

将远东转变为吸引人前来生活的地方,并塑造一个和谐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应地区的条件,并能从俄罗斯和远东地区的利益出发,解决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是亚太地区战略规划的双重目标。

为解决亚太地区的人口问题,应当停止组织"同胞"向东部迁移。这种坚持不懈的尝试只是把钱打水漂罢了。主要的任务应该是留住当地居民,并为吸引创新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创造社会条件。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比想象中要简单得多:更多地关心现有居民,为正在寻找人生定位的青年们(不仅是俄罗斯青年)创造有吸引力的条件。为此,必须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至少达到亚洲邻国的水平。要为地区居民制定与远东息息相关的生活策略,形成中等收入的稳定群体(形成相应的准则、标准和价值观),调和社会关系,保证远东地区在俄罗斯统一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内的存在感。

一个困难的问题是:哪一种战略是俄罗斯政府最终有能力接受的?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根据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和知识潜力,哪一种战略是俄罗斯的确有能力去实现的?俄罗斯能够将自己视作欧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吗?还是欧洲的镣铐将会再一次让俄罗斯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破灭?

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俄罗斯政府的怀疑者已经足够多了。近年来,他们中的某些人正是由于政府的这一行为而蒙受了耻辱。比方说,几年前恩•莱克林(E. Raiklin)盛怒地预言:"为了拯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土地,

俄罗斯腐败的寡头制······哪怕动一下手指头都不乐意。" [©]我们的体制动了,而且不仅动了手指,连整只手都动了。我们现在想要去相信,这只手能比原先做得更多,它将从诚实、明白而聪明的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发展战略开始。 (高原 译 糜绪洋 校)

Abstract In ord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Asia Pacific and promote Russian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region, it is imperative to put forward a new strategic plan. In the author's view, the new strategy of this territor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Russia overall strategy in East Asia and in the Pacific Pacific Russia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is primarily a political project. However, a correct economic mod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lso crucial. The possible failure in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shape of the region will incr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and the ideological pressure on the state. To be effective and successful in its Pacific policy Moscow should publicly reject the idea of overal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territory of the Far East from its far north to the deep south. This idea is Utopian, leads to the dissipation of forces and means and is uneconomical. It has to make a choice in favor of a radically new space-geographical mod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election of several belts (zon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to achieve the task of ensuring the equally high quality of life throughout the region. To make the Far East area attractive for people's living, to create a harmonious economic structure there, adapted to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region and capable to deal with geopolitic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in the interests of Russia and its far eastern region, must become a dual aim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circle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Russia, the Far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Centre-Locality Relationship

① E. Raikli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Russia in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Journal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2008, Vol.33, No.2 (Summer), p.181.

Т Аннотация Для успеш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в целях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движение нов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Нов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лана. развити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России должна ст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общ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Развитие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в основн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роектом. Олнако правильная является моле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же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не удастся, это увеличит финансовое бре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нагрузку. С целью эффективной, успеш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во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Москва должна открыто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концепци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се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от самой северной точки до самой южной. Эта утопическая идея приведет к распылению денег и ресурсов. Следует сделать выбор в пользу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ой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выдел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ясов (зо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и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одинаково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на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егиона, чтобы превратить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е для проживания место, и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гармонич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Российские центральные и местны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должны, исходя из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обиваться двойной цели разреш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ами

(责任编辑 常喆)

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斯亚太战略*

申 韬**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迁和亚太力量结构的调整,俄罗斯政治精英和专家学者对于亚太战略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当前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计划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寻求参与亚太经济进程;二是加大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投入,努力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三是以主动姿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结构的设计,并积极加强与亚太主要国家的外交互动。但是,俄亚太战略面临着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俄国内传统的欧洲国家身份定位仍制约着俄精英和民众建立对亚太地区的心理认同。未来俄亚太战略对中俄关系将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俄加大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将可能拓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带来机遇;但另一方面,基于俄国家利益制定的亚太战略,也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关键词】俄罗斯 亚太战略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3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042-(25)

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权力政治秩序的重构,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在全球和亚太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下,俄

^{*《}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宝贵建议,使本文的结构和论证更为合理、严谨,作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文中的任何不足和可能的错误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 申韬,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罗斯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亚太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给俄罗斯吸引亚太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但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也造成了对俄罗斯在亚太方向上的战略挤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东部地区的战略安全环境。为了适应当前全球权力转移的新变化,尤其是在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罗斯领导层已经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亚太地区,不仅在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了第24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且逐渐将亚太地区视为俄国家战略利益的攸关地区之一。俄更加重视扩大自己在亚太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并努力在亚太各种力量的博弈中扮演战略平衡者的角色。当然,"在全球权力竞争的中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基于俄在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各方围绕俄罗斯的争夺似乎正日益明显,因此俄可能会在当代全球权力体系的转型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甚至可能成为左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力量平衡的最后一块砝码","这在客观上也给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增加了新的变量。

一、新形势下俄罗斯的亚太战略

近年来,面对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和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俄国内开始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②: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心正迅速由欧洲—大西洋区域转移至亚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失去了它在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并正在被推向国际舞台相对边缘的位置。鉴于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再分配,亚太地区将是俄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拓展方向之一,

①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 新世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② [俄]卡拉加诺夫、博尔达切夫、苏斯洛夫: "重建而非仅仅重启:对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利益",《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俄]卡拉加诺夫、博尔达切夫: "建构新型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俄]卡拉加诺夫、博尔达切夫、巴拉巴诺夫: "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俄在未来全球体系中的地位。

2012年9月5日,亚太经合组织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召开前夕,普京撰文指出:"俄罗斯不会对亚洲事务坐视不管,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缘角度来看,俄罗斯都是亚太地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全面走向亚太地区是俄罗斯辉煌未来和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发展的最重要砝码"。①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进一步表示:"与亚太邻国的广泛合作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方针的优先方向之一……俄愿意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②2010年7月2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远东社会经济发展"会议上也表示:"推进与亚太地区的更紧密合作,有利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加入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将为远东乃至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潜力。"③可见,建立适应新阶段发展特点的新型亚太战略已经成为俄罗斯领导层非常关注的问题。

同时,亚太战略也已经成为俄国内诸多智库和学者研究的重点。俄国内专门研究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智库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俄罗斯国家委员会(CSCAP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在2010年向梅德韦杰夫提交了一份题为《走向东方:俄罗斯太平洋战略》(«На Восток, Россия-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由于亚太地区的经济腾飞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明显衰落,现在亚太地区正在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文明的'发动机',因此俄罗斯应该发挥自己独特的地缘优势,背靠西方,稳定南方,走向东方,做一个新的'欧洲太平洋大国'"。^② 20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召开前夕,谢尔盖•卡拉加诺夫(C.A.Караганов)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主席的

①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2: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естка для форума ATЭC.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6390

②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форума АТЭС.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6432

③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 серьёзный ресурс рос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http://www.kremlin.ru/news/8233

④ CSCAP, "Going East: 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5, 2010,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Going-East-Russias-Asia-Pacific-Strategy-15081 有关俄罗斯要成为欧洲太平洋大国的论述还可参见 http://valdaiclub.com/asia/40381.html

身份牵头撰写了一份题为《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или новая глобал 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的研究报告,建议政府把首都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该报告认为"亚太地区将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因此俄需要使自己的经济与政治进程融入亚太地区,这是保持国内稳定和国际竞争力的先决条件,也是实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全球大国的重要条件";"为参与亚太一体化进程和更好地实施'西伯利亚工程'(Проекта Сибирь), [®]俄需要把部分首都的功能转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城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太平洋首都的方式,来实现将政策从根本上转向亚太地区"。 [®]最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2月27日,普京在第三次竞选总统前夕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的外交纲领性文章。该文不仅把俄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放在俄欧、俄美关系之前进行论述,而且强调,俄罗斯要通过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并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亚太地区充满活力的一体化进程。 [®]

从最近几年俄政府出台的有关亚太地区的政策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俄罗斯新的亚太战略的主要框架,它主要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两个方面的内容。战略目标有三个:维护并扩大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加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使俄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核心目标;重振俄罗斯的全球大国地位并使俄成为多极世界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极是终极目标。在上述三个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俄亚太战略的基本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 "西伯利亚工程"是指俄罗斯对乌拉尔以东地区的重新开发计划,由 2009 年普京签署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 2025 年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导实施,计划每年投入 1 万亿卢布(约合 330 亿美元)以实现在 2011-2025 年间该地区 GDP 总额增加 1.5 倍和工业产值增加 70%的战略目标。有关西伯利亚工程的更多论述可以参见卡拉加诺夫 2012 年牵头起草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相关研究报告"Toward the Great Ocean, or the New Globalization of Russia", 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45700.html

②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Барабанов О.Н., Бордачев Т.В.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или нова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июль 2012. http://vid-1.rian.ru/ig/valdai/Toward_great_ocean_rus.pdf

③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года.

(一)通过"西伯利亚工程"全面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为融入亚太经济圈做准备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核心任务是试图通过"西伯利亚工程"加快发展西伯 利亚和远东地区。2012年4月11日,针对东部地区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普 京在总理任期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应 该受到格外的重视,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 [®]普京在这份工作报告 中确定了政府未来工作的五大优先方向,其中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位居 第二。同年6月,普京签署总统令成立了远东地区发展部,同时筹备设立直 属于总统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国家开发公司,专门负责管理俄东部地区60% 领土上的大型项目的招投标和建设。^②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的具体实施计 划方面,2013年4月2日,梅德韦杰夫在主持远东和贝加尔社会经济发展委员 会会议后宣布《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经济社会发展纲要》[®]正式生效 执行,这意味着远东地区的发展即将进入快车道。这份新的远东发展纲要主 要包括两个联邦专项计划——《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18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 [®] 和《千岛群岛2015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俄政府计划在2013年 到2017年间投入超过10万亿卢布(约合3333亿美元)优先用于远东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以实现远东地区在2025年前由追赶式发展模式转变为超 前式发展模式。根据计划,俄罗斯将投入9800亿卢布(约合323亿美元)修 复跨西伯利亚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投入1010亿卢布(约合33亿美元)对 远东地区61个机场进行现代化改造并重建2个大型机场,投入600亿卢布(约 合20亿美元)建设现代化的联邦级公路网络,投入500亿卢布(约合16.5亿

1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отчет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в Госдуме. http://www.rg.ru/2012/04/11/putin -duma.html

② 关于俄政府决定建立远东地区发展部和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国家开发公司的原因请参见杨成:"权力—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瑞典]史蒂芬·赫德兰(Stefan Hedlund):"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是时候忘记俄罗斯现代化了吗?",《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Программ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ода.

Ф Проект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8 года.

⑤ Проект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урильск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5 года.

美元)建设新发电站和输电线路以保障该地区的能源供应,投入250亿卢布(约合8.3亿美元)建设新港口和发展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通往萨哈林岛的桥梁,把千岛群岛打造成鱼类加工和旅游基地甚至建立类似于英属维京群岛的金融避税区。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2011年到2025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57.7%,投资增加380%,在全俄经济中所占比重从8.5%增加到10.2%,该地区居民数量增加到1240万人。^①俄远东地区发展部部长维克多•伊沙耶夫(B.И.Ишаев)表示,新的远东发展纲要的目标是使远东成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并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②

此外,为了吸引亚太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助力远东大开发计划,俄罗斯积极寻求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为融入亚太经济圈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俄计划以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建设与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2012年1月,梅德韦杰夫提出俄罗斯准备在关税同盟的框架内和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一起与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之间启动自由贸易谈判,以开辟亚太经合组织一体化的崭新方向,为亚太地区市场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创造前景。[®]同年11月,梅德韦杰夫在访问越南时进一步提出2013年关税同盟将与越南启动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计划逐步扩大到整个东盟地区。[®]俄希望以关税同盟与亚太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这种形式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全方位经贸合作,为进一步融入亚太经济圈、实现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提供突破口。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края и Ирку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government.ru/news/1139

② "俄巨资启动远东开发计划,优先用于发展交通",《人民日报》,2013年4月4日。

 $^{\ \, \ \, \ \, \ \, \ \, \ \,}$ Путин В.В.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форума ATЭC.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6432

④ Стать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Интеграция---в целях развития, инновации---в интересах процветания».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4392

⑤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их меж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и Нгуен Тан Зунг выступили с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для прессы. http://www.government.gov.ru/docs/21404/

(二) 加大对东部军区的军事投入, 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加大对东部军区特别是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投入是俄罗斯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基础。2012年5月7日,普京在就职总统的当天就签发总统令,命令把加强在远东太平洋海域的军事力量放在俄海军建设的首要位置,以维护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远东军力建设的严重滞后。这不仅影响了其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东部地区的国家安全。为了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以加强远东军力作为切入点,把新一代"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优先部署到太平洋舰队,并且在远东港口城市纳霍德卡部署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此外,为了增强对日本的威慑力,俄罗斯还计划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部署"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并且动用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和太平洋上空进行常态化"巡视"。[®]加强在远东的军力部署既是俄为应对亚太地区未来可能的安全挑战"投棋布子",也是为其远东大开发计划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要抓手。争取重返越南金兰湾是俄亚太战略布局中一颗重要的棋子,也是其介入亚太地区事务进程的一个有力楔子。金兰湾扼守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曾是冷战时期苏联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对抗的重要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2年11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访问越南期间表示,越南已经同意俄罗斯在金兰湾港设立一处舰船维修基地。[®]重返金兰湾将为俄延伸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提供战略支点,有助于实现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

(三)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结构的设计,加强与亚太主要力量的合作与互动

①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планов развития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ОПК. http://kremlin.ru/news/15242

② 来源参见"俄军前两艘北风级核潜艇将部署太平洋舰队",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2/08-09/4095633.shtml;"俄军部署第 4 个 S400 导弹团, 系首次部署远东", http://www.zhige.net/html/2012/0816/51706.html

③ 参见"俄海军司令证实西北风级航母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120726/43510812.html;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日本对俄飞机绕日飞行表示不安", 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anquan/20110909/43143526.html Ф В ходе визита во Вьетнам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⁴⁾ В ходе визита во Вьетнам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http://www.government.gov.ru/docs/21406/

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结构的设计是俄罗斯提升其在亚太地区话语权的重要战略手段。部分俄罗斯学者提出,美国的亚太轴辐安全模式已不能适应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新变化,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亚洲的赫尔辛基进程,并在此框架下设立小范围的俄一中一美三边合作和对话协调机制,最终在亚太地区形成《太平洋安全和发展公约》。①俄罗斯学者认为建立覆盖东盟国家和亚太地区所有中小国家的《太平洋安全和发展公约》能够为亚太地区中小国家摆脱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挤压,建立主权和安全保障体系奠定基础。而俄罗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将在这种亚太安全治理安排下发挥其战略平衡者的作用,既可平衡中美在该地区的战略博弈,又可帮助该地区中小国家摆脱在中国和美日之间选边站的烦恼,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升相互投资和贸易合作水平,为俄罗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创造条件。②

基于这种考虑,积极展开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加强与亚太主要力量的外交互动,提升与亚太伙伴的战略合作水平就成为了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要维度。普京在2013年2月12日批准了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内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确定了今后俄罗斯亚太外交的基本方针,其中发展同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构想指出"俄罗斯将与中国继续增进平等互信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金砖五国等一系列多边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合作,同时加强和印度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同越南继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东亚峰会是亚太地区战略对话和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是俄罗斯建立和推进亚太地区伙伴网络的重要依托"。³⁸在亚太地区政治力量的博弈游戏中,俄罗斯将会奉行

① Салин П.Б. Россия и Азия или Россия в 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 августа 2011.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Rossiya-i-Aziya-ili-Rossiya-v-Azii-15282 还可参见 "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新世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② "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brp_4.nsf/newsline/6D84DDEDEDBF7DA644257B160051BF7F

均势外交和务实外交的原则,并可能倾向于扮演"战略平衡者"的角色,^① 以实现自身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为恢复其全球大国影响力提供有效支撑。

二、时代的机遇: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动力和条件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和欧洲在未来5到10年将呈现战略收缩的态势,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可能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全球权力结构日益呈现"扁平化"的趋势。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逐渐呈现多元化局面,该地区的大国关系正在加快重组,地区体系和秩序正在加速转型,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也日趋"扁平化"。^②伴随着全球权力竞争的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的权力再分配进程进入关键时期,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和其主导的安全轴辐体系已不能适应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这为俄罗斯进入亚太治理进程并参与亚太治理体系和路径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的战略机遇。

(一) 俄罗斯周边战略环境的变化是俄亚太战略的最大推手

近年来,俄罗斯周边战略安全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俄美关系的"重启"之后,北约东扩步伐的放缓和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启动,使得俄西部安全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地区的退潮使独联体一体化和欧亚联盟的建设出现转机,尤其是在代表亲俄势力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为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延长了基地租赁期限(即从2017年延长到2042年)。俄乌关系的迅速改善不仅减缓了北约东扩对俄罗斯西部的战略压力。与此同时,独联体地区的反俄急先锋格鲁吉亚也由于2008年俄格战争导致其领土不完整的现实而面临在

① 关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扮演战略平衡者的说法可以参见 S. Karaganov, "The Map of the World: Geopolitics Stages a Comeback", http://valdaiclub.com/russia_and_the_world/58580.html

② 有关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的论述可以参见陈玉刚: "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5 期;同时还可见杨成执笔起草的"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加入北约的局面,[©]尽管在2011年底由于杜马选举引发的反对派抗议事件和普京再次上台使得美俄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暂时终止,但俄罗斯仍然可以说正处于相对有利的战略环境中,俄罗斯领导人也非常希望利用这一战略机遇进一步调整和推进俄罗斯的亚太战略。

早在2010年,梅德韦杰夫就指出,"俄罗斯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增强俄 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实现与亚太经济空间的区域一体化,同 时关注亚太地缘政治竞争给俄罗斯利益带来的影响"。②在亚太方向,从国家 安全的角度来看,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的欠发达和人口的持续流失, 有 悖干俄罗斯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战略意愿,不可避免地让人感觉到该地区的脆 弱和安全真空,并将加剧对该地区丰富资源的争夺,而这将会削弱俄罗斯整 个国家的实际主权。^③同时,《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主编奥多尔•卢基扬诺 夫 (Φ .А. Лукьянов) 认为,"俄罗斯一直以来都不是亚洲政策链条上的强势 环节,俄罗斯也从未被亚洲国家认为是'自己人'。但随着亚洲越来越有可 能成为本世纪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平台,如果俄罗斯无法扩大自己 在亚洲的存在,那么将面临的威胁或者是被全球化边缘化,或者处境更为危 险, 在亚太地区两个最强的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可能对峙中扮演'副牌'的角 色。俄罗斯领导层明白这种潜在的危险,因此正在积极寻找在亚洲发挥有效 作用的方式"。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 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将成为未来中美冲突的基础。同时,受到西 方需要"意识形态敌人"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开始出现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非

① 1995年9月北约常设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北约扩大问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导北约如何东扩这一问题。报告规定了考查和评估申请国资格时必须考虑的一系列因素,其中重要一点是申请国必须要在加入前确保国家领土完整并且不能和第三方有严重的领土争端。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后,俄罗斯宣布承认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格鲁吉亚自此面临领土不完整和国家分裂的尴尬现实。

② "梅德韦杰夫:必须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100702/42825210.html "梅德韦杰夫:俄需要更积极加入亚太地区的一体化",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101130/42936213.html

③ "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Ф.А. Лукьянов): "亚洲和俄罗斯的新视角", 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01029/42909239.html

此即彼的对抗性。而中国的迅速强大又在客观上使其周围形成"安全真空"一一邻国会感觉中国"威胁"到它们。这并不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和意图,而是由于其邻国的实力相对弱小,因而希望引入外部势力借助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制衡和对抗中国,这使亚太地区在可能出现政治军事化和开展局部军备竞赛的危险的同时,也为俄罗斯进入亚太地区提供了战略杠杆。^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的亚太战略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冷战结束之后的欧洲地缘政治变动。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而失去了原先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不少优良港口,这使拥有濒临太平洋的天然良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外向型优势日益明显。俄罗斯历史上对出海口的渴求,使得位于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由于其不冻港的优势而成为俄在太平洋的海上门户,而2012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也彰显了俄罗斯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亚太地区国际合作中心的战略决心。

(二)利用亚太经济腾飞的机遇扩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参与亚太 经济治理机制是俄罗斯亚太战略的现实考量

冷战结束后,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的主要受益者,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力量重新分配的中心。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深层次变化,亚太地区正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发动机和财富源泉。如果说目前亚太地区的GDP占全球总量1/3的话,那么到2050年,其所占份额将超过50%。^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第三,印度第四,韩国第十二。^③从2012年初亚太地区外汇储备规模来看,占据第一位的仍然是中国,约3.25万亿美元,位居前十位的还有日本(约合1.29万亿美元)、中国台湾(约合3942亿美元)、韩国(约合3060亿美元)、印度(约合2980亿美元)和中国香港(约合2850亿美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① 有关中国的崛起导致其周围形成"安全真空"的论述请参见:"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1 年 4 月发布的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Managing the Next Phase of Growth", April 20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1/APD/eng/areo0411.htm

③ 参见世界银行 2012 年初对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GNI)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统计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MKTP.PP.CD

外汇储备合计接近6万亿美元。①面对亚太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谢尔盖•卡 拉加诺夫认为,文化欧洲化的俄罗斯其未来在于经济的亚洲化。②但是在过 去的一段时期里,俄罗斯一直未能成功地利用亚太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尽 管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通过进口显著增加了与亚太国家的贸易额,但是与所有 亚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仅占俄罗斯外贸总 额的23.3%。[®]同时,2011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俄贸易额 达到835亿美元,占到俄罗斯与亚太地区贸易额的23%,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但俄与其他亚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均没有超过300亿美元,如与日本仅297 亿美元,与韩国259亿美元,与东盟国家158亿美元,与印度88.9亿美元。 当前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关系可能会导致其担心将在经济 上单方面依赖中国,并可能发展到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国的钳制。由于担心中 国将利用俄对中俄贸易的依赖而牵制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活动, 俄希望积极 扩大与亚太地区其他伙伴的经济联系,改变俄在亚太经济领域的脆弱性。 2012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就体现出俄罗斯希望通过参与亚太经济治理 机制,借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吸引亚太地区日益繁荣的经济力量, 发展与亚太地区政治主体的经济关系,以实现俄罗斯参与亚太经济的战略目 标。

(三)东西方平衡外交的战略传统也要求俄罗斯对外交重点进行再平衡

自沙皇彼得一世时期起,在俄国几个世纪对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均势外交逐渐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俄罗斯即使不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也一定要尽可能地在国家战略利益的攸关地区遏制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平衡该地区的力量格局,同时努力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存在。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制定,一直是基于俄罗斯作为国际

① 参见世界银行 2012 年初对世界各国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储备)的统计数据,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FI.RES.TOTL.CD

② 卡拉加诺夫: "俄罗斯的未来在于经济亚洲化和文化欧洲化",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hqgc/20111230/5376428.shtml

③ 数据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2012 年俄罗斯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12: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М., 2012. - стр. 538.

④ 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统计资料,http://www.customs.ru/index.php?option=com_ newsfts &view=category&id=125&Itemid=1976&limitstart=20

事务战略平衡者的独特作用,体现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影响力。"纵 观几百年的俄国外交史不难发现,俄罗斯走向外部世界的方法,一是如果时 机可能,则实施疆域拓展战略;二是在与其他强国打交道时,努力编织合纵 连横、互相制约的多极均势体系"。^①事实上,俄罗斯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 起为欧洲强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充分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分 化对手,并借助多个强国间相互制衡的关系来扭转对己不利的局面,或通过 多元化手段显示自己的作用, 防止大国权力博弈对俄罗斯国家利益造成伤 害。^②均势外交是俄罗斯外交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在俄国的现实主义 者看来,均势也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最基本条件。伴随着全球权力竞争的重心 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重返亚太都将加剧亚太地区的地 缘政治竞争,并对亚太地区的力量格局造成冲击,亚太地区出现大国冲突风 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而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崛起也使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 更多呈现出"小国撬动大国"的色彩。³一方面,美国以介入中国同周边国 家的领土争端作为战略抓手不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轴辐体系,企图通 过和盟友以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平衡中国崛 起对亚太权力结构的冲击,这为俄罗斯运用均势外交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 发挥平衡作用提供了某种机会。另一方面,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为了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试图让亚太地区的大国互相制衡,并积极引入外部势力平衡中国 的"扩张",这也给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实施均势外交提供了战略空间。面对 亚太地区权力博弈的新变化,俄罗斯也希望在亚太地区多极化的权力格局中 维持一种均势,并试图获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外交文化中的大国情结也是俄罗斯要进入亚太地区并发挥其战略 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最新版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外交战略 的路径被确定为通过发展一个积极的、平衡的外交战略,负责任地融入全球

① 海运、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② 赵淑芳:"俄罗斯外交文化的特点及影响",《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4期。

③ 有关"小国撬动大国"的论述可参见阎梁、田尧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当代亚太》,2012 年第 4 期;同时可参见"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

经济和政治体系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时协调国际进程,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问题。该构想指出,"俄罗斯外交战略的目标是推进全球和地区权力的多极化,争取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平等地位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恢复俄罗斯的全球大国地位,做未来多极化世界中有影响力的、独立的一极"。 ^① 因此,俄罗斯将通过导入亚太战略全面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使俄罗斯成为亚太权力多极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极。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外交传统要求俄罗斯提升亚太地区在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对新形势下俄外交重点进行再平衡。尽管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但普京执掌俄罗斯后,俄罗斯逐渐开始推行欧亚并重、东西兼顾的全方位平衡外交,尤其是俄罗斯发现,如果要想从西方获得更多,就必须借重东方,对西方打"东方牌"才能谋求最大的利益。因此,俄罗斯将对外交重点进行再平衡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这符合俄罗斯在当前国际形势中的根本利益。

三、难以摆脱的桎梏: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制约因素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俄罗斯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在亚太地区的脆弱将严重削弱它的全球地缘政治地位,向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输出是增强国内安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实际上俄罗斯在转向亚太这方面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②,而且在战略层面始终犹豫不决,即使在最新版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对亚太地区的外交虽然也被列为俄外交政策的四大优先方向之一,但却被排在独联体、欧盟和美国之后。综合起来看,俄罗斯的亚太战略虽然在近年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受到思维方式和客观条件的桎梏,距离真正把亚太战略落到实处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

在俄罗斯,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在掌握政策和舆论话语权的大多数政治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brp_4.nsf/newsline/6D84DDEDEDBF7DA644257B160051BF7F

②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 Манифест о светлом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м будущем. http://www.ng.ru/economics/2011-10-05/4 manifest.html

精英心目中根深蒂固。他们一直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身份感到自豪,从未建 立起其作为亚太地区一员的心理认同。当前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以西 方为师, 欧盟被视作俄罗斯现代化计划最重要的外部源泉, 能够向俄提供建 设创新型国家所需的经验和建议。俄国内一直有人担心亚太战略可能会使俄 脱离欧洲发展轨道,继而损害其拥有的欧洲国家属性。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对此直言不讳:"在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看来,经济上转向亚洲意味着对国 家一直坚持的欧洲发展道路和与欧洲保持紧密关系这一原则的偏离, 甚至是 意味着采用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的民主模式似乎比我们还糟糕"。 ①部分 俄罗斯人甚至认为,亚太战略可能会意味着俄将放弃由彼得大帝开启并已持 续了数百年的欧洲化进程。客观地说,俄罗斯的亚太战略一直是其欧洲战略 的配角,是俄在发展与西方关系难以如愿情况下的一张"战略牌",而这种 局面短期内恐怕难以得到根本改变。②正如俄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 诺夫 (C.Б.Иванов) 在 2012 年 10 月 25 日回答"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专家关于俄罗斯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问题时所说,"我们都是欧洲人,我们 与欧洲的贸易要占到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都是欧 元,即使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改变我们的储备结构。我们的 亚洲政策只是对欧洲关系的补充而已"。³在政治精英难以摆脱的欧洲情结的 影响下,俄国内政治精英要建立起对亚太地区的心理认同还尚需时日。

(二) 极低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迄今为止,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仍然是非常低下的,如果以相互投资水平作为指标来衡量,目前俄与亚太国家相互投资都处于较低水平,这影响了俄与亚太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质量。

俄罗斯2011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558亿美元,其中来自日本3.7亿美元,韩国2.7亿美元,菲律宾2.2亿美元,中国1.8亿美元,东盟0.18亿美元;2011年俄对外直接投资672亿美元,其中投向新加坡1.6亿美元,朝鲜0.7亿美元,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Азиат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7 июня 2011.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Aziatskaya-strategiya-15234

②"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转引自李新:"俄罗斯亚太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

泰国0.6亿美元,中国0.2亿美元,印度0.17亿美元,日本0.01亿美元。^①俄与亚太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水平的滞后,不仅影响了俄经济现代化计划,而且也阻碍了其加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更令俄政府担忧的是,在远东大开发计划亟须外来投资的同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吸引外资的状况却不甚理想。事实上,俄实施"西伯利亚工程"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在《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经济社会发展纲要》计划投入的10万亿卢布中,国家预算的投资不足1/2,其余资金需要本土和外来投资。[®]但由于俄政府对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的不重视和远东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俄远东地区的投资环境总体上缺乏竞争力。俄2011年吸引的55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近80%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所在的中央地区,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吸引的外资总量还不足26亿美元,这将可能导致远东大开发计划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

(三)人口的持续流失且贸易结构不合理

远东地区虽然占俄国土面积的36%,但人口仅占全俄的4.5%,而且还在不断流失。据统计,远东地区人口已从1991年的806万减少至2011年的640万,这意味着俄每开发远东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能分配到1.2个劳动力。[®] 更糟糕的是,远东地区居民对未来发展严重悲观的情绪直接导致了该地区最具有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的人口流向国内外其他地区,该地区的部分城市甚至正在上演"空城计"。人口的持续流失不仅还使得该地区在现有计划下的发展前景困难重重,更让大部分"西伯利亚工程"的具体项目由于人力资源短缺而根本无法实施。与亚太国家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也是俄更广泛地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现实障碍。如在俄对华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矿物产品(主

① 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资料,http://www.cbr.ru/statistics/?Prtid=svs&ch=PAR_30241#CheckedItem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края и Ирку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http://government.ru/news/1139

③ 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资料,http://www.cbr.ru/statistics/?Prtid=svs&ch=PAR_30241#CheckedItem

④ 根据俄联邦统计局 2012 年公布的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指标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2012: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12. С.22.

要是原油和石油产品)、原木,而在俄对华进口中,却是机械工业设备和制成品、轻工日用品占了绝大多数。俄工业品占中国进口工业品的比例从1997年的30%减少到2007年的不到3%,而且大部分都具有"原料属性"。[®]俄罗斯现在正越来越担心成为中国的"原料附庸"甚至发展为"政治附庸",这将可能会逐渐动摇俄与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信心,加深俄认为自己已沦为原料供应国的失败感。

(四) 历史与传统的影响

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发展历史看,俄罗斯始终将西伯利亚视作封闭 的战略大后方,而把远东视作军事前沿堡垒。这种传统心态严重制约了这一 地区的发展。

在17到18世纪,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才出现第一批俄罗斯定居者,因此也形成了不同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习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更加独立和自由,严酷的气候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但也导致他们生活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该地区成为俄罗斯对抗同盟国和法西斯轴心国的战略大后方。而随后该地区大量油气资源的发现有力地支撑了苏联与西方世界在冷战时期的对抗,也有力地支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运动,并且给苏联经济注入"强心剂"。但这一地区却似乎总是和俄罗斯的国家悲剧联系在一起。在沙俄时期,该地区是政治犯的囚禁地及流放地,而在苏联时期,"古拉格"和"远建"[®]把成百上千的人送进这里的劳改营并使这片土地成为全俄的悲惨之地。在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被苏联领导层视作国家的战略纵深部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储备库,而这一地区的经济也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环境中发展。由于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西伯利亚和远东成为苏联在亚太的军事前哨,这不仅影响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居民的心理,尤其是滋

① Карагано С.А., Барабанов О.Н., Бордачев Т.В.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или нова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 2012 年第1期。

② "远建"是 1930-1950 年代苏联开发东部和北部的主要组织机构"远东和北方建设管理总局"的简称,主要从事工业、道路建设、行政和经济管理,其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劳改营的囚犯。

生了他们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慌,这一影响直到现在尚未彻底消除。^①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不仅俄政府对亚太资本进入远东地区(尤其是油气开采领域)施加了各种限制措施,而且俄民众对引进亚太资本开发远东也一直存有抵触心理。例如,俄《论据与事实》杂志就在俄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刊发《远东是外国人的吗?》一文,明确表示反对向中国、韩国等亚太国家租赁远东地区可用于农业开发的荒地。^②在远东大开发渴求外部资金的同时却又排斥亚太国家的投资,这不仅将影响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计划,更让俄罗斯缺少与亚太地区联系的经济纽带。

(五) 行政部门的腐败和低效

行政机构的系统性腐败一直是俄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一个根深蒂固的 顽疾,它不仅吞噬了国家发展项目的大笔资金,而且直接影响到外资进入俄 潜在的投资领域。

普京在 2012 年竞选总统前夕总结过去十年政府的经济政策时坦言:"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成本直接取决于政府官员对你的态度"。[®]在"透明国际"发布的 2012 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在 176 个国家中排在第 133 位,落后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和乌干达。[®]而在"透明国际"2011 年发布的全球海外公司行贿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在全球 28 个主要经济体中依然排在最后一名。[®]虽然现在俄政府治理腐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俄仍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经济大国"。此外,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低下甚至不作为,可能让远东开发计划成为空中楼阁。2012 年 11 月 29 日,普京在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发展委员会会议上批评"远东发展部在成立半年后,前三个月忙于在莫斯科的办公楼,后三个月忙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办公楼,致

① 2012 年 9 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拉林对中国《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近两三年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威胁论"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18/c157278-19033182-1.html

②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чужестранцы?//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 февраля 2012 года.

③ Авторская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http://putin 2012.ru/events/149

 $[\]textcircled{4}$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2, Full table and rankings", <code>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2/results/</code>

⑤ "Bribe Payers Index Report 2011, Results by country/territory", http://bpi.transparency.org/bpi2011/results/

使国家批准的计划都停留在纸上,已拨付的大笔资金和物质也被侵占"。^① 如果考虑到俄政府的政策经常朝令夕改,远东开发计划的确对亚太国家的吸引力有限。

四、俄罗斯的亚太战略与中俄关系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于中俄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事务,一方面可以拓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给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带来新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基于俄自身国家利益制定的亚太战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排增添新的变量。俄罗斯亚太战略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冲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助于中俄两国形成"利益和价值观共同体"^②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行"再平衡"战略,无疑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战略空间的新一轮挤压。作为俄罗斯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继续深化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是俄罗斯参与亚太的重要基础,这也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将会进一步接近。中俄两国战略上的相互接近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美国防范中国崛起和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衡甚至是对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同时,中俄同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的提升将对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中国作为俄亚太战略的重要参与方,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可以为中俄之间建立一种"两国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而中俄之间的"两国协调"机制又将为在亚太地区利益攸关的大国之间构筑"大

① "普京的不满与远东发展的困境",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21130/43633333. html

② "利益和价值观共同体",借鉴了瓦尔代报告中的"利益和认知共同体"的说法,参见"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国协调"机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①这种亚太地区"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将可以有力地促进亚太地区国家之间最终形成一个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将减少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摩擦和限制无序竞争带来的祸患,符合中俄共同崛起背景下两国的战略需求。

此外,相比较俄罗斯,中国在当代全球体系转型中可能正处于一个相对 不利的位置。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将可能导致中国和美国等一些西方大 国关系中对抗性的潜在上升。在亚太地区, 伴随着中美之间和中日之间结构 性矛盾的升级,中国现在需要结交战略利益相同并且有实力的国家来对冲国 际体系对中国崛起的阻力。必须承认的是, 在中国与世界所有大国所建立的 各种不同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只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真正具有实质性的战略 内容。^②况且俄罗斯在当今全球军事战略格局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俄美之间维持的核均势仍在客观上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和平的 国际环境。因此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俄关系可能将在进一步 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定位。其最终的目标不会指向传统意义上的联盟关 系,而是建立中俄"利益和价值观共同体"。中国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合 作水平正是检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级至"利益和价值观共同体"的核 心指标。在俄罗斯加大对亚太地区投入的背景下,中俄两国需要在亚太地区 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以中俄两国协调机制为基础推动构筑亚太地区的"大 国协调"机制,使这一地区真正形成一个各国利益相互"镶嵌"的多元化权 力格局,并使其成为新的地区结构建构的重要推手。为实现这一大国协调机 制的最终建立,中俄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维护者和区域合作的重要推进 者,有必要加强两国协调,积极主动地参与亚太地区治理和发展议程的设定, 担负起亚太地区"服务型"大国的责任,给这一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提供更多 的公共产品,缓和乃至消除西方、周边国家对中俄"双崛起"可能产生的顾

① 有关建立中俄"两国协调"机制和在亚太地区构筑"大国协调机制"的概念,借鉴了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2年5月4日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所提出的在中美之间建立"两国协调"机制的新理念。同时可参考郑先武:"大国协调:亚太安全治理的新途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7日。

② 有关中俄关系的论述参见刘古昌: "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田永祥:"中俄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崔启明:"关于中俄关系的几点思考",《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

(二) 有利于充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经济内涵

作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最大的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经济和开发远东的重要机遇。对此,普京曾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中国是重要的全球经济中心,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绝不是威胁,而是带有巨大事业合作潜力的挑战,这也是一种机遇,要抓住朝着我国经济'风帆'吹来的'中国风'"。普京强调,俄罗斯要积极协调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使两国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相结合,同时要合理运用中国潜力来提升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使俄罗斯的"经济之帆"能够乘上"中国风"。在这个意义上,普京对中俄关系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中国自然也需要一个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②

中俄经济合作的潜力还很大。在远东被俄罗斯亚太战略定位为俄罗斯经济新的"增长极"的同时,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而把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规划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计划有机地衔接起来,将有助于深化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经济内涵。2009年,中俄两国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这份文件和《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相辅相成,标志着中俄经贸关系将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计划到2030年将销往亚太地区的天然气提高到全俄出口总量的20%,将销往该地区的石油提高到全俄出口总量的30%,这也为中俄能源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③此外,随着俄亚太战略的逐步深入,俄经济发展的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西伯利亚和远东正逐渐从俄国家发展的边缘地带转向俄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前哨"。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俄罗斯联合建设连接欧洲和亚太的大欧亚交通运输走廊,同时发挥两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鉴于目前中俄经贸

① "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③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редлагаемой до 2030 года. http://government.gov.ru/

关系与两国的政治关系不协调、不平衡的现状,中国参与俄远东开发计划, 将改变目前中俄两国"政热经冷"的局面,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拓展和延伸带来更多的机遇。

(三)俄罗斯重返金兰湾可能会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增加新的变量,而 且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潜在竞争也可能给中俄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俄罗斯亚太战略是基于俄国家利益制定的,这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必须看到的是,重返金兰湾作为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对冲了美国的亚太军事再平衡战略,但在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牵制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布局,增加了影响南海争端的外部因素,使得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提高。必须明确的是,俄罗斯非常善于利用地区力量竞争来影响大国关系格局,在权力博弈的过程中纵横捭阖,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此,中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及早分析清楚俄亚太战略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战略安排,以确保在亚太地区形成新的战略平衡的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空间。

此外,亚太战略的"中亚维度"也一直是中俄关系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未来欧亚联盟的建设,将使俄罗斯在更大程度上主导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这可能导致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受到限制。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潜在竞争,很可能成为中俄几近"晴空万里"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①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继续充当俄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已成为俄地区利益的竞争者,或者说,中国的崛起态势越来越引起俄罗斯在战略上的担忧。^②因此,在亚太地区,中俄应更密切地协调彼此立场,争取形成共生、共存、共利、共赢的格局,而不是演变成战略竞争,争取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亚太地区乃至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① "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②"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讨论用中方报告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五、结 语

俄罗斯的亚太战略,是在全球权力政治格局大变迁和国际力量结构重组的背景下,俄罗斯为借重亚太经济机遇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必然结果。亚太地区已成为俄罗斯的战略关切、经济利益和外交政策的交汇地。目前,俄罗斯已经成为亚太地缘权力体系向多极化演变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力量。随着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亚太区域合作的能力和意愿都会增强,其对中国周边环境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格局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但需要明确的是,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并不是要取代俄罗斯朝向欧洲的文化和社会定位,而是俄罗斯为适应现在和未来的全球权力变迁并使国家发展更趋平衡的战略安排。在一些俄罗斯学者看来,"亚洲无法给俄罗斯提供能替代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的归属感","所谓的'亚洲发展道路'不会把俄罗斯引向一个发达的亚洲,而只能够引向落后的非洲,与欧洲的疏远将进一步损害我们的欧洲属性,并导致国家社会文化的迷失和堕落。" ① 因此,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将在极力避免伤害俄罗斯欧洲属性的前提下,增加俄罗斯发展战略的亚太维度;在保持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发展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Abstract】 With changes in global power configu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Asia-Pacific power structures, Russian political elites and experts increasing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Asia-Pacific strategy. Currently, Russian Asia-Pacific strate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first, seeking participation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process through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area with plans for Siberian and the Far East; second, increasing its military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Азиат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7 июня. 2011.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Aziatskaya-strategiya-15234; 有关俄国学者对亚太战略的争论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思考可参见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上的相关评论文章, Russia's Euro-Pacific vision—wishful thinking or realistic prospect?, http://valdaiclub.com/asia/40381.html

investment in the Far East, making all efforts to expan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sign of Asia-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energetically promoting its diplomatic interaction with major Asia-Pacific countries. However, 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realistic constraints, particularly its traditional position as a European country domestically still restricts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its elites and folks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uture Russian Asia-Pacific strategy will have two effects, on one hand, Russia's more participation in Asia-Pacific affairs may promote Sino-Russian overall strategic coordination partnership to a new level, bringing opportunities for both countries' economic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ia-Pacific strategy, based on Russian national interests, may also, to certain extent, influence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 in Asia-Pacific.

Key Words Russia, Asia-Pacific Strategy,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 】 Вслед за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власти и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а также эксперты и учёные России придают всё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России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три области: ускор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восто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ланов развития Сибир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желание *<u>V</u>Частвова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ах; увеличен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енных вложений,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расширению свое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занятие активной позиции вопросах участия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и структур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а также активн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основ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Однак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множества реалий,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носительно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возможн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н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двух сторон,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увеличение участия и усилий России в дела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приведёт к углублению и расширению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создавая тем самым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стран и освоения региона,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может повлиять 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Кита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封帅)

Russian Studies

Gen. No. 180

历史视野中的俄罗斯与亚太

俄印超常关系二百年与俄国的印度学*

林精华**

【内容提要】印度之于俄国,不仅是和西方争夺中亚—南亚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不断重建"东方文明"的最重要资源。由此,无论是被英国殖民时虚弱的印度,还是国力和经济并不发达的冷战时代的印度,都得到了帝俄和苏联的倍加重视。而俄苏重视印度,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这种奇观,和俄国有效地改造了从西方引进的印度学息息相关:俄国的印度学不同于英国殖民主义的论述,它唤起了俄国知识界对现实印度的同情、对古典印度的崇敬,也赢得了印度的好感。苏联延续了这种印度学传统,甚至加大对印度古典文明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苏联和印度产生了更积极的回应。殊不知,这种成效正是俄苏把印度纳入其东方战略的认知和定位的结果,而且还产生了印度比中国更可信和更值得尊敬的效果。

【**关键词**】印度学 印度研究 帝俄 苏联 【中**图分类号**】D83/8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2-0067-(49)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 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在俄国人心目中, 印度享有更高的地位, 这是同为东方国家的中国难以 企及的。姑且不论到 1917 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饥饿的石头》已有六个 俄译本,就直观印象而言,位于莫斯科友谊大街上的中国大使馆,其西边百 米左右就是罗蒙诺索夫大街和米丘林大街交界处的甘地广场。这里矗立着圣 雄甘地 (Махатме Ганди, 1869-1948) 的铜像。为了纪念这位印度民族独立解 放运动和国大党的领袖, 1969 年苏联发行了甘地诞辰百年纪念邮票, 1985 年建立甘地广场。1987 年此地又增添了印度政治领袖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1917-1984) 的铜像,同年苏联发行纪念她诞辰 70 周年的邮票。第 二年,这一广场上就竖立起了由印度人赠送的圣雄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铜像。1988年,莫斯科还成功举办了苏联的印度节:1989 年,又在莫斯科创立了尼赫鲁文化中心……诸如此类行为,显然不仅仅是出 于联合印度反对西方的需要。而且,经济并不发达的印度,是苏联和后苏联 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0年3月普京总理访问印度时,辛格公开 声称,"印俄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因为我们认为俄国是可信赖 并且可靠的战略伙伴。我们的双边关系不仅仅是独立自主的,而且其意义已 发展为超越时代的现象。我们的伙伴关系覆盖了诸如防卫、民用核能源、太 空、科学技术、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①。第二年,梅德韦杰夫总统更声称, 印俄关系已发展到新层次,即优先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如此景观, 远不只是现实的国际政治利益驱动所造成的, 也不单是由于 俄印地缘政治关系自然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按科留卡耶夫 (М.Корюкаев)2007年在彼得堡大学历史系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9 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俄印文化关系》所说,在当代世界上,俄印关系 是两种不同类型文明的相互平等协作的案例,而在俄印人民相互关系的历史

¹ DavidScott (ed.), Handbook of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213.

² Vladimir Radyuhin, "Medvedev calls Indo-Russian relations a '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Hindu, 14.07.2011.

③ 国内学界对俄印关系的研究,一般都聚焦于后冷战时期的两国特殊关系,参见李冠杰: "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印俄战略合作的成效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12年 第4期。这类研究对于历史因素作用的关注往往略有不足。

进程中,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了多方面稳定性^①。这种说法并非后人的一厢情愿:早在1906年9月18日,著名的《真理之声》报就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发社论《忽视印度是不可原谅的》强调:印度之于俄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的!而且,这种极具稳定性的俄印关系,进一步影响到后苏联时代俄国的国际战略,包括如何认知和处理俄、中、印三边关系。"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武器出口方面,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明显地迫使俄国要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选择,而争辩的结果显示,印度显然要胜一筹。"^②这不仅是说说而已,例如,俄国著名的《视点》杂志2012年10月12日刊登题为《许可起飞了》的文章说,历经12年,俄国兑现了向印度出口高性能的多用途军事一运输飞机的合同,显示了俄印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性,由此坚信,"俄印是独一无二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不可能彼此抛弃的,虽然会有些问题"。

这种似乎难以理解的俄印关系,仅从当下的国际政治学角度论述是不够的,因为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结果。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俄国的印度学(Indology/индология)及其产生的效应,对俄印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或者说,正是由于印度学提供的"知识",使得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能够放心地开展双方的现实合作,积极推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俄国印度学: 帝俄获取南亚和中亚战略利益的途径

我们知道,进入19世纪以来,世界上关于印度及其文明的认知,并非源自印度自身的叙述,而是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印度学。出入印度的欧洲学者、殖民官员、商人、新闻工作者等,纷纷记录关于印度的印象、研究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导致印度学在欧洲迅速形成。同时,由于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使印度学形成了两种潮流——在发现印度和开发印度初期,欧洲人直观地描述所接触到的印度的不同方面,形成了对印度文化和历史进行想象性

① Корюкаев М. Русско-индий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в. Введение. 2007. С.1. (俄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收藏)

② T. Zarzecki, "Arming China or Arming India: Future Russian Dilemma", *Contemporary Strategy*, Vol.18, No.3, 1999.

和感性描述的印度学(Indomania)。因为对于印度的智慧和神秘性之向往,这种充满着好奇心的、个人经验式的文字,在 19 世纪初之前一直很流行,它召唤着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冒险家和商人源源不断来印度淘金。而自 19 世纪以降,一些专业学者和殖民官员,用现代人类学观念和殖民主义姿态对待印度的历史、宗教、习俗、政治等,产生了否定性研究东方文化的印度学(Indophobia)。这两种各自产生很大影响的论述模式,在英国皆特别兴盛,并且正如英国社会变革方向深受贵族精英左右那样,印度学也难以摆脱那些贵族文学家的影响。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米勒(James Mill, 1773-1836)之作《英国之印度的历史》(1817),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作为贵族文学家之作的痕迹,受到包括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之诗《毁灭者萨拉巴》(1801)和《克哈马的诅咒》(1810),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叙述拜火教(Fire-Worshippers)之作《拉拉•罗克》(1817)等影响,而这些文本皆充满着对印度居高临下的英国东方主义色彩。

然而,与英国这种因长期实际殖民印度,并在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视野下观察、研究印度有很大不同,俄国对印度问题的认知要复杂得多。从早期自发出现的印度印象,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学理性的印度研究,虽然这期间在论述范式上大量借鉴西方,但终究是塑造了俄国特有的印度形象、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印度学。

俄国和印度之间很早就有商贸往来的传统。早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俄国商人阿法纳西•尼基金(Афанфси Никитин,?-1474)就去印度旅行和经商。他的《在三个海上航行》(1468-1472)作为俄国第一部商贸和非宗教旅行之作,涉及作者在高加索、波斯、印度、克里木等地的旅行和经商活动,主体内容是关于印度各邦的政治结构、商业、农村经济、风土人情和传统等^①。这部开启了俄国印度学的文字,在苏联时代仍备受重视——作家库尼内伊(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ниный)据此创作了畅销的中篇历史小说《去三个海》(1940),小说家普里贝特科维(Владимир Прибытковый)据此写了畅销的长

① 1475 年手稿转到莫斯科官员瓦西里·马梅列夫手中。俄国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发现了该作,1818 年出版了其中片段,全本是1821 年出版的。1857 年,伦敦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书名为《十五世纪的印度》。

篇历史小说《特维尔客人》(1956), 1958 年苏印合拍了同名电影; 而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维塔谢夫斯卡娅(М.Виташевская)之作《阿法纳西•尼基金旅行记》(1972),则认真分析了这位历史人物在印度旅行的具体过程及其对俄国认识印度的意义。

这种充满赞赏之情的记录印度之作,此后成为俄国的传统,出现了一系 列印度之旅的作品,如美籍俄裔贵族旅行家和神智学家巴拉瓦茨卡娅(Еле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 1831-1891)的《来自印度山洞和密林中的信函》(1879)以及诸 多关于印度神秘主义的论述,当时就得到了托尔斯泰和圣雄甘地的认可;谢 尔巴托夫(O.A.Щербатов) 公爵的《漫游印度和锡兰: 我 1890-1891 年旅行 笔记》(1892)记录了考察印度和锡兰(1972 年改称为斯里兰卡)的见闻,尤 其是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地区的佛教与风土人情: 1906 年,俄国著名军事将 领诺沃茨基(Василий Новицкий,1869-1929)参加对蒙古、阿富汗和印度的 军事考察,其后来写成的《慢行东蒙古》(1907)和《从印度到法兰克福》(1910) 等旅行记,个性化地描写了印度的战略重要性和奇异风俗;在皇村学校毕业 后入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后又任职于该系并成为帝俄科学院院士的谢尔巴 特斯柯伊(Федор Щербатской, 1866-1942), 在其《1910 年在印度公干的简 单报告》(1912)中记录了他访问孟买等地的见闻,包括当地人的民主意识在 不断增长、传统民俗正在发生变化等情形。诸如此类个人经验式的印度游记 文本, 生动记录了印度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奇风异俗、英国殖民给印度带 来的混乱等,和西方的印度学论述大相径庭。重要的是,在阿法纳西•尼基 金之后,印度与古罗斯—俄罗斯帝国的商贸联系日趋密切。16 世纪,俄早 期重要城市、位于伏尔加河南段的阿斯特拉罕, 甚至出现了印度商人村。① 当然,更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俄)罗斯诸多大公一皇帝皆破除各种障碍,和 印度各邦建立了不同的联系,开展了多种商业贸易活动,17-18世纪俄国有 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探险者赴印度经商、探险。这些行动有效地建立了俄印联 系,为18-19世纪之交俄国印度学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根据、感性体验的基础。 帝俄枢密官和外交委员会档案馆馆长马林诺夫斯基(Алексей

① Surendra Gopal, *Indians in Russia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Calcutta: South Asia Books, 1988, pp.85-87.

Малиновский, 1762-1840), 其《关于 1469-1751 年间赴印度的俄国使节和来俄贸易的印度商人的通报》(1837), 就特别论述了近三百年间俄印贸易的各种情况及其对俄印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可是, 印度学后来在俄国的形成和壮大, 却不是因为双边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贸易额增大, 也不是若干重要印度学家的热衷, 而是由于当局有意推动体制性的印度学研究, 以便更系统地认知印度: 这正是出于沙俄东方战略的需要。

的确,在俄国,作为学科的印度学,是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历程所催生的。因为这个历程在不断引进西方现代化模式改造俄国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认识和研究东方的学术制度,使得俄国体验和接触印度以及东方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借助西方人文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欧洲印度学框架,对印度的认知也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感性体验,而要求有叙述的逻辑、专业知识和相应的东方学理论、判断印度事务的价值观等。

这样一来,18世纪俄国著名的音乐家、语言学家和戏剧家、学者列别 杰夫 (Герасим Лебедев, 1749-1817), 意外地成了俄国印度学的奠基人。1788 年,列别杰夫经由英国来到印度(先抵达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而后大部分时 间在加尔各答),以拉大提琴谋生,研习梵文(Sanskrit)、孟加拉语(Bengali)、 北印度语/印地语(Hindi)等达 12 年之久。后因英国殖民者的干涉,他被迫 离境,回到俄国。在外交部任职期间,他利用自己在印度的经验、接触到的 西方印度学知识,满腔热情地研究印度,并创建梵文出版社,出版自己关于 印度研究的力作《对东印度婆罗门教仪式和习俗系统之公正观察》(1805)。 该著作第一部分介绍印度神话、宗教、宇宙观,第二部分介绍印度天文学和 孟加拉目历,第三部分介绍婆罗门教的各种仪式、教堂建筑和装饰、印度节 日、不同民族的习俗、东印度的地理和经济(包括东印度公司商贸)、印度贸 易等。这样的文字,为严肃而学理性地向俄国人介绍印度社会、历史和文化 开了先河,表达了对被西方殖民后的印度及其民众的深切同情,表示了对印 度文明古老和深邃的赞赏。不仅如此,他还出版了研究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语 法之作《东印度方言的综合语法》(1805)、研究东印度算术之作《数学手稿》 (1815)等,尤其是把《旧约》中智慧篇《传道书》(Екклесиаст)翻译成印地 语。他还应俄国著名诗人杰尔查文(Гаврил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之邀写了

《印度作诗法》(1815)等,并准备了《婆罗门教语字母表》、《孟加拉公民和 俗众语—俄语简明词典》等珍贵材料。这么多丰富的印度学文字,多立足干 作者自己对东方文化的实际接触,从中几乎见不到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字里 行间充满着俄罗斯人特有的情怀,不单向同胞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印度知识, 也使俄国人看到了印度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和独特价值。列别杰夫的工 作,使印度研究进入俄国东方学体系有了可能,尤其是意味着对印度的认知 脱离了18世纪之前拜占庭的知识体系,也开始独立于18世纪以来的欧洲范 式。作为俄国印度学的开创者,列别杰夫的作用是奠基性的。即便其许多文 献没有被充分利用,但他提供了 18-19 世纪之交俄国人对于印度的认知及其 方法,比较系统地从知识论上奠定了俄国不敌视印度的战略构想,从研究基 调上确定了以后俄国印度学界哪怕经常和欧洲同行有密切交往,也能保持自 己的俄罗斯特性——超越欧洲在西方的东方学框架下研究印度,看到了不同 于西方建构的神奇而落后印度,并发现欧洲给印度带去的"现代文明"未必 是福音,有可能是更大灾难的意蕴。这样的认知对俄国影响深远,以至于后 苏联俄国印度学家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印度和俄国一直被 西方误解: 西方以其殚精竭虑所建立的绝对高贵的欧美生活方式, 诽谤和排 斥'野蛮的'(barbaric)印度和俄国。印度和俄国因此曾为捍卫自身传统价 值、文化和世界观,不屈地反对试图颠覆其文明认同的外来强力"。由此, 当代俄国学界完全不认为俄国读者能接受芝加哥大学南亚语言和文明系教 授尹登(Roland Inden)《东方学家所建构的印度》(1986)和《想象印度》(1990) 所提供的西方关于印度的描述^①。

实际上,印度学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和成果都表明,其与西方的印度学的确有很多区别。1730年代,彼得堡大学创建的亚洲博物馆,就搜集有丰富的梵语和印度其他语言的文献,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方研究所,由此形成了俄国最早的印度学基地。1762年,彼得堡大学建立印度文献俄语翻译研究中心,起初主要是翻译英、法、德、葡等语言的印度学文献。从1840年代初开始,加大直接从梵文和印地语翻译原始文献的力度。到19世纪末,

① Eugenia Vanina (ed.), *Indian history: a Russian viewpoint*, Delhi: Pragati Pub., 2003, p.xiii.

莫斯科大学、喀山大学、哈尔科夫大学等纷纷建立印度研究中心。从 1890 年代开始,俄国许多大学的斯拉夫学和古典学专业都开设梵文课,目是这类 系科学生的必修课。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俄国的古典印度学,并形 成了自己的特性:一方面在俄国所建立的东方文化框架下研究吠陀教、佛教、 婆罗门教等,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其中梵文和佛教又受到特别的关注, 由此形成了俄国印度学的特色——重视研究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明为何 特别热衷于艰深而严肃的精神一哲学追求,而对世俗生活则漠不关心:研究 这种古老文明所包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等重大问题。另 一方面,俄国学界积极回应西方印度学,批判欧洲文明优越论在对印度传统 文明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殖民主义倾向。例如,针对英国印度学体系把传统 印度社会视为"东方专制独裁(oriental despotism)"的典型,俄国著名的法 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科瓦列夫斯基 (Макси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51-1916) 院 士在其印度学著作《公用土地:理性和发展及其变质的若干结果》(1879) 和《印度之声》(1914)中指出,西方文化进入印度广大的乡村共同体后引发 了各种动荡,破坏了印度各邦既有的社会结构。这是因为英国进入印度后, 强行输入印度的所谓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社会制度,实际上严重破坏了印 度传统的文化体系和秩序。

这种深刻的论述,在科索维奇 (Каэтан Коссович, 1814-1883)——这位曾在彼得堡大学教授梵文的学者——那儿得到了积极的呼应。这位有着极好的梵文功底、翻译过《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编纂过《梵俄词典》并曾给后来成为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齐切林 (Борис Чичерин, 1828-1904)和印度学大师米纳耶夫 (Иван Минаев, 1840-1890)教授过希腊文和梵文的学者,立足于其扎实的语言能力和研究基础,深刻批评西方印度学的所谓印度无史论。他指出,"若历史是描述由民族自身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些理念影响下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命运,若历史是描述那些有意志和自主意识的民族能够组织其国家成功抵抗反对自由思想和自由创造的现象,若某个民族生活中有着无法攻取的永久记忆和文献证明,那么印度对于世界上任何最有历史思想的民族而言,都完全不是下等卑贱的国家"。此论断的深刻意义,

① Серебряк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Индии. М.: Высш.шк, 1985. С.13.

至今不减。

这种从历史哲学高度探究印度问题的方法,在佛教经典俄文选编学奠基人、曾先后任彼得堡大学校长、科学院院长、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奥尔登堡教授(Cepreй 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1934)那里,演变成了对印度佛教的深入研究。其力作《佛教徒行传》(1894)、《印度的佛教艺术》(1901)和《印度文化》(1919)等,着力探究印度文明的魅力如何得益于佛教及其思想的深邃。作为俄国著名的印度学家,在十月革命之后(1919)动荡的局势中,他倡议科学院组织举办首届佛教艺术展,并在展览期间举行了五次主题为"印度大师佛之生命"的关于佛教的演讲。他说,"长期以来学界流行这样的论调:正如印度人没有历史感那样,印度也没有历史。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言论。印度有其历史,那是我们至今不能清楚理解的历史,因我们欠缺相应的知识和出色的研究方法论。倘若我们有一种内含某些普遍特征的范式,并掌握大量文献,那么平等地讨论印度史和其他国家史、用特别态度对待最重要和最有意思的文化史的日子,就会迅速来临。" ②这样认识和推崇印度文明,对后来苏俄人在印度学领域努力践行用第三世界文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设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印度学在帝俄时代得到长足发展(一直影响到苏联、苏联解体之后),则是与俄罗斯帝国的东方战略——扩大在印度及其相邻地区的战略利益分不开的。葡萄牙人利用开辟新航路的先机,最早在印度建立了多个据点,垄断了印度和西方之间的贸易。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快速发展,刺激着西方各国在世界不同地区寻找更多的市场和原料产地。1600、1602、1604年,英国、荷兰、法国先后在印度不同区域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各自采用"以印制印"或"连印制他"的战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对印度的殖民争夺。但是,在1757年开始的普拉西战役中法国战败,英法于1763年签订《巴黎和约》,从此开启了英国独自殖民印度的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由此从商业组织变成军事和政治强权机构,开始全面征服印度。1849年吞并旁遮普,至此英国完全占领了印度(2/3地区为英国直接统治,1/3地区由英国殖民当局委托五百多个各地王公代行统治)。

① Сергей Ольденбург. Культура Индии. М.: Наука, 1991. С.126.

并且,英国借助所占领的这块庞大殖民地,向北扩张到西藏,向南延伸到东 南亚。在此征服过程中,有明显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印度学日趋体 系化。英国殖民印度的行为,和 18 世纪以来因推行西方发展模式而不断壮 大的俄罗斯帝国要在中亚和南亚谋取更多利益的战略意图发生了碰撞。面对 已经失去占领印度的先机的现实,俄国不能满足西方确定的地缘政治格局, 大胆地直面意义越来越重大的印度问题。这正是伊达洛夫(С.Идаров)在"印 度在俄国对土耳其和英国之政治中的意义"(《俄罗斯通报》1884年第6期) 中所论述的——获得印度是俄国重建世界地位的不可或缺的步骤。于是,俄 国积极关注印度事务的进展。如在英国正全力征服印度的 1847 年,莫斯科 就翻译出版了伯恩斯坦(Bernstein)的著作《大英帝国与印度》。与此同时, 沙俄帝国也伺机企图改变印度的格局。就在大英帝国在印度的鼎盛时期,曾 应保加利亚当局之邀和帝俄当局推荐出任保加利亚内阁总理和内政部长的 俄国中将索伯列夫(Леонид Соболев, 1844-1913), 发表了《俄罗斯有进军 印度的可能吗?》(1901)等文献,大胆讨论武力改变英属印度局面的可能性。 同一时期,另一位将军乌斯季诺夫(В.Устинов)则发表《论英帝国主义》 (1901),激烈批评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占世界贸易额 65%)和军力, 在印度和世界不同地区的殖民行为。

除此之外,俄国人为了寻找机会打破自己在印度事务上的被动局面,还 把目光投向了尚未被英国充分占领的西藏,把西藏和印度联系起来,以图重 建其与印度的联系,大力发展和印度相关的"藏学"。

俄国按照欧洲的观念,把西藏和中国分开,让"藏学"和"汉学"成为两个独立的系统,而把"藏学"和"印度学"密切关联起来,使西藏问题和印度问题、蒙古问题一体化。实际上,俄国和西藏本不相干,直到彼得大帝改革建立科学院东方所和俄国第一个博物馆——珍宝馆(кунсткамера)后,在从西方获得的藏文手稿和藏传佛教的法器中才知道西藏。此后,借助从西方购买更多的西藏文献,及远征西伯利亚的同时经由蒙古获得更多的西藏珍宝,俄国得到了更多关于西藏的知识和感性认知。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帝俄把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等族裔纳入其版图。这个过程和西欧殖民扩张到南亚和西藏的趋势相遇,出现了帝俄科学院东方所别洛

夫博士《俄国的西藏政策(1900-1914)》(1914)所谈到的情形: 俄国人之所以对西藏有强烈的兴趣,首先是因俄国有许多人信仰喇嘛教,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图瓦人等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俄国当局把保障喇嘛教徒自由进入西藏当做职责,但更重要的是,"与西藏毗邻的南疆是俄国势力范围,俄国不愿意同其他大国共享。一旦英国人控制了西藏,就有可能潜入新疆,由此进入俄国的中亚。"^①于是,帝俄加紧按自己方式研究西藏,出现了把蒙古一西藏一印度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施密特(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Шмидт,1795-1847),他发表了上百种德文和俄文论著,并把《圣经》译成蒙古语,编纂了《藏俄词典》(1843)。另一方面,帝俄又加紧实施和印度相关的西藏政策,如 1879 年开始兴建跨里海大铁路,以便控制西藏和印度。

此举和英国欲将在南亚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喜马拉雅山东北边一西藏的 战略发生了冲突。1899-1905 年间任英属印度总督的柯曾(George Curzon, 1859-1925), 在考察印度、中亚和远东后认为, 俄国是英国维持印度这块最 有价值的殖民地之最大威胁,其《俄国在中亚》(1889)、《英俄问题》(1889)、 《波斯和波斯问题》(1892)等著作,有针对性地重构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 的版图,提出大英帝国应实行统一的南亚—中亚政策,并要把西藏也纳入其 中。伦敦当局采纳了他的设想。这样一来,英俄在西藏一印度问题上的矛盾 加剧:俄国希望沿着新疆—西藏边界划线,新疆属于大清帝国但和俄国有关, 保证西藏独立而不受他国控制: 英国希望这样划线成功, 既可借俄国之力弱 化中国,又不伤及英属印度的战略格局,还能进一步分沾西藏的利益。可是 俄国触碰印度—西藏边界线问题, 使自认为是印度唯一保护国的英国从中看 到,俄国意在控制中亚和西藏的各种资源,并进一步威胁英属印度的战略地 位。虽然柯曾确信,西藏会更支持英国而不是俄国,英国有足够的时间把俄 国从西藏驱逐出去,但他还是建议英国和印度要充分利用达赖喇嘛,以免他 更亲近俄国[©]。对此,俄国另辟蹊径,巧妙地利用西藏佛教: 奥尔登堡任科 学院院长期间,以印度学家的身份极力争取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倾 向于俄国,促其向彼得堡派遣藏传佛教传教团。达赖喇嘛借机向帝俄科学院

① Белов Е. Политика по Тибете в россии// Восток. №3. 1994. С.98-99.

② A.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1906, p.255.

赠送大量珍贵的西藏文化和佛教文献,向俄国地理学会赠送很多法器和资 料。出生于布里亚特的僧人阿旺•德尔智(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 1853-1938),成 了俄国实现其西藏战略的重要角色。此人 19 岁去蒙古和西藏学佛,先后成 为达赖喇嘛的陪读、西藏政府的重要政客(1903-1905年出任达赖喇嘛的"财 政部长"),1898、1900、1901年先后受达赖喇嘛之命出访彼得堡,沙皇尼 古拉二世曾两次接见此人。在他的游说下,从 1905 年开始,达赖十三世多 次打算去访问俄国,尼古拉二世全权担保他的来访,俄国外交部也极力给予 方便促成他成行,只是因意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客观原因,未 果。但是,在他的帮助下,俄国和西藏还是建立了政治联系,沙俄借此承诺 支持西藏从中国和英国控制下独立出来。而印度和英国也把此人视为同俄国 进行正式谈判的西藏代表(如 1898-1899 年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出使 欧洲,受到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接见)。由于他的怂恿,1904年反对英国染指 西藏的达赖喇嘛十三世逃跑到外蒙古的库伦,只因1905年俄国发生流血事 件、局势不稳, 达赖喇嘛第二年又选择到北京觐见, 1909 年回到西藏。此 后,西藏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1910年达赖喇嘛十三世出逃到印度, 请求英国帮助他反对中国统治,但因 1907 年签订的《俄英协定》承认西藏 属于中国、俄英都不得控制此地,这个条款使英国人无法把握唾手可得的机 遇,由此加剧英国提防俄国对西藏和印度的觊觎。首任(1890-1892)英属南 罗德西亚地区行政长官科尔克霍恩(Archibald Colguboun, 1848-1914)在他 所著的《俄国反对印度》(1900)中说,从莫斯科公国壮大起来的俄罗斯帝国, 先后把芬兰、利沃夫、拉脱维亚、波兰、波斯尼亚等纳入其版图,俄国发现 印度和西藏之后,会惯例性地产生占有的冲动,而且俄国不是文明治理所占 领的地区,"不同于英国治理印度,俄国统治下的中亚一些村镇,土地是不 能经买卖和抵押到居民手里,而是俄国人垄断经营的。大量的犹太人,在俄 国人到来后, 贿赂殖民官员而获得土地", 其他农产品贸易也是被垄断的, 相较而言,"印度在事实上被视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中心,但治理有效。仅 凭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反对外国侵略者。"[□]显然,觊觎印度和西藏之战略

① 参见 Archibald R. Colquhoun, *Russia Against India: the Struggle for Asia*,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 Rbothers, Publishers, 1900, pp.87-88, 203.

地位和资源的俄国,与英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把西藏同印度关联起来的印度学, 凸显了佛教对于俄国的意义, 因 而获得了政府的支持。1908 年达赖喇嘛经德尔智向俄国外交部建议在彼得 堡建立藏传佛教寺庙,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зивольский, 1856-1919)、总理大臣斯托雷平(Пётр Столыпын, 1862-1911)等都同意该 建议。1909年尼古拉二世接见德尔智以后,当即决定在彼得堡建寺庙(其实, 当时彼得堡的佛教徒还不足二百人),并很快成立了寺庙建设委员会,东方 学家拉德洛夫 (Василий Радлов, 1837-1918) 院士任主席, 成员包括亲王埃 斯佩尔·乌赫托姆斯基(1861-1921)、东方学家奥尔登和谢尔巴茨柯伊等。 1915年,寺庙最终落成(此前两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举 行了第一次大型法会)。这种经由佛教而把藏学-印度学-蒙古学一体化,从 理论上支持帝俄当局的西藏战略的做法,在俄国是深入人心的。在战事画家 韦列夏金 (Василий Верещагин, 1842-1904) 的诸多油画中,包括《喜马拉雅 山之夜》(1874-1875)、《喜马拉雅的小型马》(1874-1876)、《克什米尔的山 间小溪》(1874-1876)、《印度拉达克的谥号古迹》(1874-1876)等,西藏和 印度是同一片地区,这两地的宗教、风俗习惯、自然风光等在这些艺术作品 中被同质化。这种观念在苏联时代很活跃,在苏联解体后同样有生命力,如 俄联邦多次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布里亚特、卡尔梅克, 理由乃此地有众多尊达 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藏传佛教信徒,其宗教信仰自由及其相关事务须确保。

正是这种与英国争夺印度—西藏和中亚利益的战略意图,迫使俄国必须加大对印度问题的研究,一些重要人物和媒体顺势把英国—印度—西藏—中亚关联在一起观察,在更大空间里重新审视印度—西藏社会以及俄印关系等问题,以至于印度研究和关注印度事务—时蔚为壮观。

早在 1874 年,参加过克里木战争、远征波兰和中亚的安宁科夫 (Михаил Анненков, 1835-1899) 将军就出版著作《控制西北邻居的英印关系》,讨论英国和英属印度之非正常国家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之于俄国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曾是亚历山大三世的教子、尼古拉二世的御医、布里亚特人巴特马耶夫 (Пётр Бадмаев, 1851-1920),多次到访包括蒙古和西藏在内的中国各地,宣扬俄国版图应该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发表震惊欧洲和俄国的《把西藏、

蒙古和中国纳入俄罗斯帝国<关于对东亚的俄罗斯政治任务>之方案》 (1893)。到19-20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影 响力巨大的《通报》(Сведения)周刊经常刊载追踪印度—西藏问题的文章。 仅 1900 年就发表 12 篇,如《邻国当下所发生的事件:印度》和《印度的军 事消息》。1904 年第 1、2 期连续刊载题为《西藏问题》的文章。同样,随 着印度—西藏问题在俄国战略中地位的上升,俄国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也越来 越多,而且大多是从俄国人的视角批评英国在印度—西藏和中国的举动。 1906年,著名的《真理之声》报(Голос правды)先后发表《英藏和约之终结》 (4月6日)、《论俄印和解》(5月30日。讨论俄英在西藏与印度问题之争)、 《英印报纸对中国关于鸦片法令的评论》(12 月 11 日)等文。1907 年,印度 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情势变得扑朔迷离,《真理之声》又发表《印度的 民族运动》(1月13、2月9日)、《印度的国防》(2月1日)、《日本对印度 的观察》(2月5日)、《1907-1908年印度财政预算》(3月13日)、《土著人 论印度的财政预算》(3月24日)、《印度骚动》(4月22日)、《英国自由主 义者对印度事务的观点》(6月18日)、《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7 月7日)、《印度国民大会上的若干争吵》(12月22日)等。更有甚者,这年 俄国和英国对印度的争夺白热化,8月31日俄英外交部长在彼得堡签署瓜 分中亚和西藏利益的《俄英协定》,虽然俄国获得了巨大利益,但《真理之 声》报却连续刊文《俄英在中亚之关系的历史与近期和英国议定的不合时官 性》(9月14日)、《俄英协定中关于波斯(伊朗)部分俄国得到了什么》(9月 18日)、《俄英协定中涉及阿富汗部分俄国所犯的外交错误》(9月18日)、 《印度的军事地位》(10月5日)、《俄英协定的诸种后果》(11月21日)、 《英国人在印度的探险和考察》(1908年2月16日)等,直接批评当局在这 个事件上损害了俄国的利益。甚至到 1910 年,还发表干预性文字《西藏事 务》(1月14日)、《西藏事件》(2月14日)等。在此事件之后,该报关注印 度事务成了常态,如 1909 年发表《印度的选举改革》(11 月 8 日)、《印度 的选举结果》(12 月 12 日)、《印度的基础教育》(11 月 26 日)等,1910 年 发表《印度一些原住民省长和政治骚动》(1月13日)等。与此同时,其他 媒体对印度问题也热情不减,如《土耳其斯坦公报》就发表过《最近印度国

民大会》(1901年4月26日)、《英国和俄国在中亚》(1903年7月6日)等文。正因为如此,俄官方的报告《印度作为中亚问题的主要因素:印度土著民看英国人及其管理》(1906),甚至被社会公开讨论。社会持续关注印度事务,召唤更多人士进入印度学界,并促使更具现实意义的印度研究在印度学中的地位日渐凸显。

这样一股趋势,吸引着政界和军方的科学协会、地理学会、建筑学会、东方学会、自然科学协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等,纷纷投入印度学研究,多番讨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欧洲印度学、印度问题国际化等问题。曾任俄军少将的著名军事地理学家和东方学家韦纽科夫(Михаил Венюков,1832-1901)关于英国殖民印度和亚洲问题的论著,如《近 30 年来英国在印度之战》(1872)、《英国控制亚洲概论》(1875)、《简论英国控制亚洲的当代状况》(《知识》1875 第 3 期)、《土耳其人和外国人论英属印度》(《俄罗斯思想》1900 年第 2 期)、《外国人论印度》(1900 年第 6 期)等,是俄国把印度学引向印度研究的重要中介。这些论著和曾征战印度并掌握印地语的波罗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олозов,1864-1908)将军的《印度的西北边境》(1902)、著名东方学家和民族志学家阿里斯托夫(Николай Аристов,1847-1910)的《英印的高加索:英国和阿富汗边境部落之冲突》(1900)等一道,推动着俄国人更多地关注大英帝国对印度殖民治理及其产生的内政危机、对外冲突等问题,并从俄国人的立场表达对印度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

进而,直接关切俄国和英国在印度的冲突问题,也就成为印度研究界的重要使命。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教育家韦肖尔(Николай Вессель, 1837-1906),其发表的《大英帝国在印度》(《历史通报》总第 20 卷/1885年第 6 期)、《东方问题》(1877)、《俄国和英国在亚洲》(1904)等论著,博加托夫(B.B.Богатов)等人撰写了《英国、印度、中国》(《世界史通报》1902年第 1 期)。在帝俄时代以《俄国军事地理学》(1910)著名、在苏联时代以《军事地理学导论》(1922)著名、在后苏联以《战争哲学》(2003年整理出版)著名的帝俄一苏联军事理论家斯涅萨列夫(Андрей Снесарев, 1865-1937)将军,作为著名的印度学家,是那份官方报告《印度作为中亚问题的主要因素:印度土著民看英国及其管理》的主撰者,他在两卷本《西北印度的戏剧

(军事地理描写)》(1903)中论述了印度艺术所蕴含的地缘战略信息。而他的《东方的布哈拉城》(1906)和《帕米尔概论》、《英俄和约》、《印度民族志学》(1907)等,则直接讨论印度地理的重要性、族裔构成的复杂性、印度之于俄国的战略意义等。其他如格鲁列夫(Михаил Грулёв,1857–1943)将军的《俄英在中亚的竞争》(1909)、古里耶夫(Б.Гурьев)的《俄国与伊朗的贸易和大印度之路的设计》(1913)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论著,显示出俄国对印度的重要战略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这种俄国印度学在述说着和英国印度学的区别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样遭受西方压力的感同身受之情怀,由此衍生出对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高度关注。1890-1906年间,印度先后遭遇鼠疫、饥饿,俄国不少重要媒体跟踪报道,如《真理之声》先后发表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霍乱》(1906年3月22日)、《救援的旗帜》(29日)、《印度的鼠疫和老鼠》(9月19日)等报道。这类报道,引发帝俄政府和东正教圣主教公会动员俄国社会各界帮助印度人,医学科学家不仅研究灾害的原因,还身体力行去救助。如曾发表轰动一时的《1896-1898年印度瘟疫》(1898)的著名流行病专家卡什卡达莫夫博士(B. Кашкадамов, 1865-1941),就和许多医务工作者一起直接奔赴疫区参与救治。他根据自己的经历所写的《关于1899年2月20日至1900年7月17日出差印度的报告》(《社会卫生环境通报》1902年第1期),提供了关于疫情的大量信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英国殖民当局救助不力的批评。以后,随着印度国大党的建立和发展,俄国印度学界也开始关注并支持印度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当然,俄国印度学本身的实绩,更在于对印度文化的引进和切实研究。其中,就译介梵语史诗《摩诃婆罗多》而言,俄国虽比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要晚,但 1778 年就开始有了俄语译文片段,零星翻译不断;到了19世纪,时任喀山大学教授和不久调任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彼得罗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1814-1875),先后在《望远镜》(1835年第7期)、《莫斯科人》(1841年第8期)、《祖国笔记》(1841年)等著名杂志发表了该诗的一些俄译章节,在这以后又出版了多种《摩诃婆罗多的片段》(1844、1851)、《摩诃婆罗多的短篇故事》(1851)等,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著名的《梵语经典文

选》(1846)。这样,就形成了俄国印度学的一个特色——印度研究被纳入国 家的东方战略, 但具体的印度学展开过程则不受意识形态干扰, 出现了所谓 "没有现实价值的"史诗翻译和佛经研究热潮。而这样的特色也成就了彼得 堡学派: 帝俄政府大力支持发展的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 以及和彼得堡大学 关系密切的帝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批优 秀的印度学人才,推出大量既为国际印度学界所震撼、又推动了俄国对印度 战略的成果。上文论及的印度学大师米纳耶夫,就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 系,后来到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研究梵文、巴利文,1872年通过博士 学位论文《概论巴利文的语音和形态学》的答辩,此后任彼得堡大学比较语 言学教授,是世界上较早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的学者之一。他还发表了 《佛教:研究与资料》(1887)、《古印度和西方联系的新因素》(《人民教 育部杂志》1870年第8期)、《关于佛之轮回的几篇作品》(《人民教育部 杂志》1872年第6期)、《印度的民间故事》(《人民教育部杂志》1874年 第 11 期, 1876 年第 2、4-5 期)、《锡兰和印度概论》(1878)、《梵语文学 中最重要作品概论》(1886)、《佛教:研究与资料》(1887)等一系列重要文 字。苏联时代东方学家还整理出版了他在印度和南亚各地的旅行日记 (1955)。这些深入研究印度佛教和古代文化的文献,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夫、 语言功底和历史诗学的方法论,得到印度和国际印度学界的公认。而著名印 度学家库德里亚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Кудрявский, 1867-1920) 虽然曾多年在欧 洲研究梵文和拉丁文比较语言学、古印度社会生活, 其实毕业于彼得堡大学 历史语文系并留校任教。正是得益于彼得堡大学打下的学术根基,他才能够 发表《古印度家庭尊敬客人之道和仪式》(1896)、《古印度生活的四个阶段》 (1900)、《附录有梵语语音学和句法学词典与概述的最初梵语文选》(1903)、 《古印度家庭仪式研究导论》(第一部分论尊敬客人之道、第二部分儿童教 育,1904)等重要文献,成为以研究梵文和古印度日常生活而著名的印度学 家。在彼得堡出生却在德语学校成长、在彼得堡大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 梵文的德裔俄籍印度学家伯特林克(Отто фон Бётлингк/Otto von Böhtlingk, 1815-1904),就深信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他翻译了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语 法学著作《帕尼尼语法》和《奥义书》,编纂了7卷本《梵文词典》(彼得

堡,1853-1875),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简明梵文词典》(1879-1889)等。在印度学领域声望显赫的勒里希家族,也和彼得堡大学不无关系。其中,得到印度社会公认和苏联高度赞赏的印度学家尼古拉·勒里希(Николай Рерих,1874-1947),就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此后任职于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艺术科学院。苏联时代,彼得堡大学易名为列宁格勒大学,同样培养出大批出色的印度学家。彼得堡学派以其扎实的研究成果、对印度文学艺术的出色译介,使印度文学艺术和佛教在俄国社会许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不仅仅是得益于彼得堡学派,而是整个俄国的印度学界共同努力, 使印度文化在俄国产生了神奇的效力,并直接影响了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 文学艺术发展和社会思潮。曾就读于喀山大学东方学系的列夫•托尔斯泰, 就受益于印度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和甘地通信,探讨印度文明,并高度肯定 孟加拉开悟神秘家帕拉马罕萨(Ramakrishna Paramhamsa, 1836-1886)的佛教 思想。他还撰写了俄国第一部佛陀传记《佛陀》(Будда, 1906),探讨释迦牟 尼成佛经过和佛教哲学。到了晚年,他更关注印度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问题。 1908年7月4日,他记下了阅读印度近代哲学家维韦卡南达(Shami Bibekā nondo, 1863-1904) 作品的情况: "我已经阅读了这位作家关于上帝的最好 文章。我认为必须把它翻译过来。我本人是这样考虑的:他对叔本华的'意 志'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但有一个错误,他的批评始于对世界(宇宙)的理 性推理。我们是不接受对世界的理性推理的。因为类似的理性推理,看上去 似乎很重要,实际上是胡说(yenyxa)。明智的理性通常可以且必须只能从个 案、从自身开始。""如此评价这位取法号"辨喜"、致力于吠檀多派理论 的创立和传播的印度哲学家, 显示出托尔斯泰对印度古典文明的敬仰和 对印度近代化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不满。1909年11月2日,他又在日 记中写道, "今天我阅读孟加拉开悟神秘家帕拉马罕萨著作。身体很虚 弱。" ②次日,他的家庭医生、也是作家的马科维茨基(Душан Маковицкий, 1866-1921)记下其活动:"托尔斯泰从《孟加拉开悟神秘家帕拉马罕萨言论》

① Лев Толстой. Пол. соч. Т.56. М.: Государ.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С.138-139.

② Лев Толстой. Пол. соч. Т.57. М.: Государ.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С.163.

中挑选了百句格言,并想从阿希达南达著作《我的大师》中做一些补充;"[©]1910年3月12日,托尔斯泰写如下日记:"为何逆向进化运动起源于婆罗门教、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因宗教意识是逆向对待实际上日益改善的生活的……"[©]诸如此类的文字共同显示出,印度文化是晚年托翁的心灵慰藉。

有意思的是, 托尔斯泰在印度文化熏陶下成为东方智者型的作家, 并在 审美上促使俄国人关注佛教,而在理论上深刻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 国知识界的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则是较早严肃讨 论印度哲学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为善辩护:道德哲学》(1894-1897)认为, 佛教表明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醒悟,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信仰,显 示人怀有真正的舍己精神(само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е),这样的佛教应该和基督教 融合。③可以说,正是印度文化,召唤他突破东正教神学,走向基督教哲学。 而参加过《艺术世界》杂志筹办的现代艺术展并搜集了大量印度艺术造型的 印象主义画家拉里奥诺夫(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 1881-1964), 曾致信其妻子 冈察诺娃 (Наталья Гончарова, 1881–1962) 说, "我重新打开去东方之路, 并且确信,在我之后,会有很多人沿着这条路前行";其妻则回应说,"西 方只是过往东方艺术之发现的传送器。经由西方,东方回来了。但在这个中 间环节中必要性却消失了,随时间流逝就直接找到根源" 4, "我诚惶诚恐 地远离了西方······我走向了艺术本源之路,走向了东方。"^⑤就是在这一时 期,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Валерия Брюсовт, 1873-1924) 的选编《人 之子,或人之诗篇》(1899),汇集了印度、中国、日本、墨西哥等国诗人作

① Маковицкий Д. Соб. соч. Т.4. М.: Государ.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94

Дев Толстой. Пол. соч. Т.81. М.: Государ.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С.400.

③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е. Том. 8. СПб.: Товарнщество Просвыщение, 1913.

④ Сарабьянов Д.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конца XIX нач. XX века. М.: МГУ, 1993. С.181.

⑤ Поспелов Г.Г. Новые течения в станковой живописи и рисунке.---Рус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1908-1917. кн. 4. М., 1980. С.140.

品,成了著名的畅销书。诸如此类的现象无不意味着,印度文化和佛教对俄 国知识界和大众有一定的亲和力。

面对俄国社会在西化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印度学及其成果 启示一些文学艺术家转向东方。这种情形在 19-20 世纪之交表现得更为明 显。在这期间出现的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白银时代,与这样的情形不无关系, 即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等普遍受惠于印度学成果,印度的文学艺术和佛教思 想自然地渗入俄国文艺思潮,知识分子藉此重新认识俄国自身的问题。巴尔 蒙特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 之所以能成为俄国杰出的象征主义 诗人,就因其受到印度佛教和印度学的启发。在奥登堡的帮助下,他曾于 1913年出版译作迦梨陀娑的古典梵文戏剧《沙恭达罗》和《佛之生命》(Жизнь Будды)。后来在《论迦梨陀娑》(1936)中他论述道,印度乃幻想之国,是 祭神的人间寺院之象征,佛经即《第二旧约》(Второй завет), "印度智慧 包含着人可企及的智慧的全部色彩, 印度智慧的丰富性是取之不尽的, 完美 的印度之轮廓显示出那是思想之国,只有在思想中才会有幻想"。同样,象 征主义大师和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6-1941) 在《新路》杂志刊发诗篇《佛》(Будда) 和《涅槃》(Нирвана), 用诗句演绎印度佛教的复杂深奥以及诗人对其的领悟,他感慨"佛陀召唤人 们无忧无虑的快乐","我不想拷问和计算/我只是要再度感受幸福是什么 样的——不是去思考/天空是什么样的——不是想要……",以此来批评资 本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功利主义的庸俗化潮流。①而著名诗人、画家和文艺批 评家沃罗申(Максимилиан Волошин, 1877-1932),不仅主张学习印度文化, 而且身体力行, "为了认识欧洲文化, 我去了巴黎……抛开所有'欧洲', 剩下的只有人类的,要学习另外的文明,在印度和中国寻找真理。"他后来 在自传《关于自我》中描述在巴黎的法兰西国家图书馆接触东方文化的情形, 认为是得益于友人德尔智经常向他灌输"涅槃"思想,灵魂深受冲击,知道 佛教内容多涉及罪孽与报应、地狱与转世等问题,但其道德高度堪比同样是 训诫和惩罚的基督教。^②不能忘记的是,曾经写作《论俄罗斯理念》的象征

①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Было и будет: дневник 1910-14. Пг., 1915. С.308.

② Гамбо-Намжил Заятуевич Заятуев. Цанид-хамбо Агван Дорджиев. Улан-Уде, 1991. С.17.

主义诗人和理论家伊凡诺夫(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 1866-1949), 其对俄罗斯思 想的扩展方式同样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启示。他热衷于印度神秘主义,并通过 体验佛教思想来丰富其诗歌特色,如组诗《伊甸园》第5篇(1912)中就有这 样的诗句: "印度灵魂,神秘地传播开来的一种灵感/和它窃窃私语,五彩 缤纷的曙光抑或每个月的明月/在玫瑰色的灰烬上,在它崇高伟大得让最大 的荣耀羡慕之时/如深渊显露那样,燃尽的火焰露出真面目?"还有,著名 的象征主义诗人古米列夫 (Николай Гумилёв, 1886-1921) 的诗篇《迷路的电 车》(1921)更是声称: "我在哪儿?如此痛苦又如此紧张/有一个声音在叩 响我的心房/'你看见车站,在那里可以买到印度灵魂的票?'"另一位象 征主义文学大师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 1880-1934), 其作品《亚伦 的杖杆(论诗歌中的语言)》(1917)把印度佛教与基督教相融合,讨论文学表 达的深度问题。并且,他的诗歌创作实践把象征主义和印度哲学体系有机关 联起来,字里行间充满着神秘主义。如此诗学,甚至影响到了《彼得堡》、 《莫斯科》和《银色的鸽子》等经典文本。人们可以感受到,它们主要的叙 述动力在于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基督教和佛教信仰之间的博弈。诸如此类 现象皆表明, 若是缺乏了印度文化的滋润, 白银时代文学会失色很多。

其实,印度学及其引进的印度文化和佛教,在促进白银时代语言艺术的繁荣之前,就已激励了绘画艺术。那位威尔沙金之所以成为赫赫有名的战事画家,得益于其曾经游历中亚、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并在孟买和德里等地生活了四年,深受印度学启示(在他看来,西藏和印度是一体的),对印度文明的原创性和文化高度叹为观止。由此,创作了150幅与印度—西藏题材相关的油画,如《阿格拉附近的泰姬陵》(1874)、《阿德里努尔的婆罗门教僧侣庙》(1874-1876)、《喜马拉雅主峰》(1875)、《斋普尔的骑兵》(1880)、《北印度拉达克峭壁上的庙宇》(1975)、《北印度:从克什米尔到拉达克沿路上的冰川》(1877)、《在印度:喜马拉雅山的积雪》(1874-1876)等。威尔沙金的绘画,除了在创作题材上为印度文化所丰富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一系列战事题材之作,因画家本人被佛教所浸染、被印度文化所感化,在审美意境上超越了写实主义,渗透着空灵与神秘,如著名画卷《战争颂歌》

(1871),直入观众眼帘的是,在空旷苍凉的荒野上,突然出现一群乌鸦盘旋其上的一堆人头盖骨垒成的白色小山。

受惠于印度学,俄国艺术界受印度文化滋养的情形在白银时代更为兴盛。对著名艺术家萨利扬(Мартис Сарьян, 1880-1972)和库兹涅佐夫(Павл Кузнецов, 1878-1968)而言,印度不是简单的新艺术形式的起源,而是人类没有被现代文化所污染的所剩不多的原生态古老文明之一。由此,他们以诗人、艺术家、智者、骆驼、鸟的眼光,描绘了儿时就熟悉的故土风光,——但不是透视学的自然景观,而是渗透着藏传佛教神秘感的故乡感。此外,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诸多剧作,与熟悉东方戏剧(包括泰米尔剧和京剧)的剧作家梅耶霍德(Всеволод Мейерхольд, 1874-1940)的戏剧创作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更令人惊奇的是,印度元素经常出现在彼得堡一些著名建筑的内部设计和装饰中。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印度的文学艺术、藏传佛教,在白银时代之前就已扩展到印度学界之外,深入到俄罗斯文学艺术。白银时代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画家、批评家等,他们的审美活动,充满着强烈的印度式东方意识。印度学及其引进的印度文化帮助俄国文艺界理解生活变革,使这期间的文学艺术创作有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形式,使所谓白银时代文学的发达和繁荣有了重要的基础。。

实际上,经由印度学而来的印度宗教和哲学,不仅给白银时代文学艺术发展以启示,也给俄国学术界提供了提升学术质量,以及与西方学界对话的文化资源。受益于印度学成果,俄国比较文学大师维谢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еселовский, 1848-1918)院士在彼得堡大学开设的东方史讲座(1910),就正视印度文化史的辉煌,大胆建构不同于西方学界的东方审美历史,并且在涉及印度历史和文化问题时,有意识地彰显其在东方文明中的地位,进而也使其比较诗学研究范围,能从习以为常的欧洲界域扩展到亚洲,奠定了历史诗学的国际学术地位。当然,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趋势:在俄国历史诗学中,印度文学艺术有着东方其他国家无可企及的地位。而著名形式主义学派语言学奠基人、莫斯科大学印欧语言语法比较教研室教授福尔图纳托夫(Филипп

① Махлина С., Новиков 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СПб., 1999. С.178.

Фортунатов, 1848-1914),借助在德国和法国研究吠陀语言的经历,有意识地强化在梵文和印地语研究上俄国和欧洲的差别,确立了在印欧语、波罗的海语言和斯拉夫语比较研究上的俄罗斯立足点。其力作《立陶宛—斯拉夫语言中的重音学比较》和《论波罗的海沿岸诸语言的重音和音长》等,显示出这种研究优势。福尔图纳托夫以其研究梵文的"词形变化"和"形式变化"、"词法学"和"新词法学"等,被公认为"新语法"的代表,1902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至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的希尔菲尔德林格(Александр Гильфердинг,1831-1872),则因卓越的斯拉夫学和印度学之关联性研究的显著业绩,如代表性成果就包括《论斯拉夫语与梵文的亲和力》(1853),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艺术史家和批评家斯塔索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асов,1824-1906)的《俄罗斯勇士歌的起源》(《欧洲通报》1868年第1-4期合刊),则研究俄国民间文学中可能具有的印度文化之根源问题。

这种情形在苏联和后苏联得到了延续。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别尔德尼科夫(Г.Бердников)和维别尔(Ю.Виппер)在 1983-1994年间主编的八卷本《世界文学史》,之所以在国际文学史界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在其庞大的体系中,东方文学占有较大的比重。而这种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行动与苏联的印度学不无关系,如前四卷各有不少篇幅触及印度文学。这样改变世界文学史结构,很明显是受到了印度学成果的启示,包括苏联科学院讨论集《东方民族文学的不朽经典:法句经》(1960),托波罗夫(Владимир Топоров,1928-2005)院士发表的《法句经》俄译本(1960)、著作《梵文》(1960)和《法句经与佛教文学》(1970)等,帮助文学史家澄清了印度文学发展史上的诸多复杂问题。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印度学及其影响力,促使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细化。较早提出欧亚主义的思想家特鲁别茨柯依(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公爵,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了布拉格,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印度的宗教和基督教》(1922)。在此,他承认东方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的矛盾,困惑于俄国有些人继续沿袭英国那种企图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主张,"有人考虑对基督教与东方宗教进行某种综合。这种趋势早已存在,但产生于西方,最主要是英国,这里的基督教没有统一的教会,早就没有某种

伪善的教条。并且英国对神智学的兴趣影响了我们,在远离教会的俄罗斯知 识分子氛围中,因对东正教并不很熟悉,习惯于在自己宗教需求中寻找满足, 但就不是在东正教那儿,因为他们预先已经声明东正教根据不足";更重要 的是,因为他熟悉印度文明的复杂性,看到印度教、婆罗门教、佛教的诸多 差别,推断东方宗教信仰的差异,认为"远东一些民族的宗教很少吸引信众。 立足于崇拜先人、崇拜恶魔和自然力的中国宗教,与我们的宗教心理是格格 不入的。我们惊奇中国人如此沉稳,他们对死亡没有恐惧,有时候我们甚至 羡慕他们宗教心理中的这种特性,但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是极为生疏的,我们 知道,此乃几千年来精神发展的结果,和我们没有任何交集,因此没有人打 算成为中国人","我们钦佩穆斯林世界的精神规训,它高度一致的团结、 世界观呈现出唯一趋向,法律、宗教、日常生活在其中混合成一个不可分的 整体。但是,我们以满足于自己宗教需求的目的去阅读《古兰经》时,我们 就会体验到失望。伊斯兰教义原来是苍白、平淡无味、平庸的: 道德上是粗 糙和肤浅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从根本上成为正统的穆斯林。"就是在这 样的差别中,他推崇宗教在印度古典文明和东方文明中的重要性,如《梨俱 吠陀》所涉及的天空、大地、水、太阳、风等自然现象被赋予了神明之功, 朝霞、风、火、身体等成为祭祀的必需品,它们在印度婆罗门教意识的形成 中占有重要位置,认为"在吠陀教众神庙里的诸神中,最突出的两个神是掌 管律法的伐楼拿(Varuna)和主神因陀罗(Indra)。他们彼此不同,伐楼拿是天 空、大地、雨水及天海之神,亦是掌管法规与阴间的神,在大地上开出河道、 为天空注入阳光、在空气中注入风,是《梨俱吠陀》中记载最突出的阿修罗 神,阿底提耶众神之首。"他们都和恶魔相关联,由此"试图把上帝和恶魔 联系起来,对于基督教而言,始终是亵渎神明的,我们也不会承认的,但转 向东方则不然。东正教作为真正的基督教,能阻止世俗统治者的撒旦诱惑, 战胜天主教,抵御新教那种反对权威的人之智慧和暴力的强烈诱惑。"①这 样具体区分东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并强调印度宗教具有东方其他国家的不可 替代性,以及较之中国人信仰的优越性,显示出俄国印度学对东方细致、深

① 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 Религии Индии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чеба. 1991г.,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С.131-144. 原文载论文集《在不同的路上:若干欧亚主义者主张》(На путях: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1922)

入的认识。也正是这种对东方文化内部的区分,为俄国区别对待东方的战略 提供了理论根据。

可以说,在欧洲印度学的启示之下,尤其是在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展 开殖民地争夺的大趋势的推动之下,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俄国却未能在印度 抢得先机,这一状况反而成就了俄国印度学的特色——政府以建制方式在大 学和科学院大力推动印度学研究。在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形成彼得堡学派, 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印度学家。他们广泛地讨论印度古代史、梵文和印地语、 佛教等国际印度学界公认的重要论题。这些论题的研究演变成了对古印度文 明的肯定,同时唤起了俄国社会对被英国殖民后的印度现实问题的关注。当 局也热心于推动俄印关系。这样的印度学,产生了积极成效:受益于印度学 家及其译介的印度文化,19-20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在面对俄国日益成为大国 后随之而来的日趋复杂的俄罗斯问题,从印度文明和佛教中寻求认识国家和 解决俄罗斯问题的精神资源,以图抵消那种已呈现衰退之势的欧洲理性主义 文化的影响力, 并把印度智慧和斯拉夫文明关联起来, 由此成就了白银时代 的文学艺术和宗教哲学,并为俄国选择走超越西方文明的强盛之路提供了思 想资源。这种由政府推动的体制性的印度学研究格局,在苏联时代得到了延 续,科学院东方所和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成为苏联印度 学的中心。

相应的,俄国印度学及其所推动的切实关注印度的活动,对印度产生了积极成效,促成了印度人对俄国的普遍认同感。早在 1857 年,领导印度民族起义的领袖萨哈比(Nana Sahib,1824-1857)之侄、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巴拉伊(Ramchandra Balaji,1850-?),在柏林大学遇到对印度和佛教颇有研究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后者向他推荐俄国梵文专家科索维奇。他因此于 1881 年来到莫斯科,其举动得到俄当局的重视(皇帝赏赐他 1000 卢布),而科索维奇则因此而更热衷于推动印俄关系。尤其是,印度人热衷于阅读和收藏俄国文学作品,如为纪念托尔斯泰诞辰 150 周年,印度国家图书馆举办"托尔斯泰图书展"(1978)活动,这一活动显示印度很早就搜集到了伦敦1884 年、1886 年、1888 年出版的英文版托尔斯泰之作《我的宗教》、《童年、少年、青年》、《战争与和平》等。而泰戈尔也很早就阅读过英文版的

《安娜·卡列尼娜》。这种相互欣赏也使印度对印俄关系的信心不断增强。可以说,由印度学所推动的俄印互动关系,确实有助于俄国实施其东方战略,对俄国和印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使俄国印度学的特色得以保留、延续。

苏联印度学: 融合国家东方战略和(超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术行为

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政权诞生伊始,就与西方和周边国家冲突不断。 不可否认,为稳固政权、实现布尔什维克建国理想,1920-1930年代尝试和 平外交,整体上没有改变对外关系紧张的趋势,如 1929-1932 年中华民国就 与苏联中断了外交关系。在美苏冷战时代,苏联与盟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 关系,也并非完全服从于共同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因而往往纷争不断,甚至 出兵匈牙利、压制南斯拉夫、跟中国之间爆发意识形态之争和军事冲突、发 动阿富汗战争,等等。但是,苏联与印度则始终保持和谐状态: 1927 年, 苏联邀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苏,并促使他痴迷于苏俄共产主义,确信此 乃人类的伟大试验,他由此主张印度作为亚洲大国、苏联作为横亘亚欧大陆 的强国,可以且必须和睦相处。1946年9月,尼赫鲁就任印度临时政府总 理后,尚未正式独立的印度就与苏联交换外交代表。1947年,当印度成为 南亚第一个独立国家时,苏联当即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苏联 对印度的倾心,不仅限于地缘政治本身,还把文化和教育的交流也纳入其中。 1924年5月, 正在中国访问演讲的泰戈尔, 在北京会晤了苏联政府驻华代 表加拉罕(Лео Карахан, 1889-1937),后者积极推动泰戈尔访苏,因为他意 识到此举具有战略意义。果然,其建议奏效,第二年苏联政府便邀请泰戈尔 和印度其他著名学者参加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庆典。只是由于泰戈尔当 时身体欠佳,未能成行:后来也是由于健康原因,耽误了出席十月革命十周 年庆典。但这些皆没妨碍苏联政府成立了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主席的接待泰戈 尔委员会。该委员会耐心地等到1930年9月,泰戈尔终于踏上了苏联大地。 虽然这次苏联之旅不足一个月,而且在离开之际接受《消息报》访谈中,泰 戈尔还批评苏联以暴力手段强迫人们认同国家和政权之举,认为这是沙皇遗 产的延续, 若持续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但苏联政府并未如批评同样在访苏

之后批评苏联的法国左翼作家安德烈·纪德那样指责泰戈尔。其实,即便是苏维埃早期的动荡岁月,苏联当局仍然关注印度的古典文化传统,如列宁格勒当时就举行过印度佛教艺术展,德裔俄籍印度学家梅尔瓦尔特(Александр Мерварт, 1884–1932)的著作《当代印度博物馆作用》(1926)、《印度民族志学的成就与问题》(1927)等也相继获得出版。

1949 年印度获得充分独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苏联 的扩张主义战略不一致。但面对印度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 苏联积极调整苏 印关系。1955年尼赫鲁和赫鲁晓夫实现互访,苏联支持尼赫鲁在1955年亚 非 29 国会议上扮演领导者角色。而且,为了抵御西方对印度的影响,苏联 动用经济援助、贸易往来和外交支持等手段,大力发展和印度的关系。1971 年,印苏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以及涉及军事、防务、能源、贸易、生 产设备供应、派遣技术专家等方面合作计划, 更是把双边关系提高到实质性 的战略合作高度。期间有些行为, 甚至影响到印度国大党试图在印度建立苏 式社会主义社会。正因有这样的基础,1962年中印发生冲突时,苏联在"兄 弟中国"和"朋友印度"之间并非保持中立,而是加紧援助印度。除向印度 出售先进战机外,还促使发生军事冲突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在塔什干签署 和平宣言,以减轻印度的压力。苏印之间的超常关系,造成了地区和世界局 势的紧张。1971 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就与苏印的军事同盟性关系对 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无关系: 1971 年底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由于苏联的暗 中支持,印度得以成功肢解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孟加拉国)。苏 联这种全力支持印度的战略,使得南亚成为冷战的重要场域(幻想依靠苏联、 以武力构建在南亚霸主地位的印度,自然促使美国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主张不结盟的印度却强化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 末期,印度成为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后的首访之国,并在这次访问中 签署了《德里宣言》,声称两国的全球利益空前一致。而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 执政后则把印苏关系置于外交首位,还接见长期侨居印度的俄侨学 者和艺术家勒里希家族,确定建立国立勒里希博物馆。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 印度视苏联为安全战略和对外关系的首选靠山,苏联则把印度视为发展中国

家中最重要盟友和东方战略的支点,双方在冷战时代开展了多方位的战略协作。

如此友好的苏印关系(在冷战时代表现得更不一般),在理论上是令人疑惑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俄国与欧洲》(《欧洲通报》1882年第2、4期)的结尾处断言,欧洲视俄国为威胁,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拥有愚昧而神秘莫测的自发力量,这种力量根源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试图摧毁土耳其、奥地利、德国,夺取君士坦丁堡,有可能还要夺取印度。在苏联时代,"民族主义"概念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学说,然而"苏联"的形成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索洛维约夫所批评的这种民族主义扩张的结果。到了战后,这种扩张当然要触及到如何把一直没有脱离英联邦的印度纳入到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框架的问题。在冷战时代,美苏分别热衷于结盟,以武力与对方阵营相对峙,但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因此从理论上说,苏联不应该是印度需要与之亲密的国家。

而与印度结盟,对于苏联来说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苏维 埃政权初期,布尔什维克为因应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其政权的不信任,被 迫积极处理同中国、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睿智地把中国和印度的反殖民 主义运动纳入其国际共运的范畴,延揽了中国和印度许多追求民族解放和民 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德国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 查托(Virendranth Chattopadhyaya, 1880-1937), 是印度的著名革命家, 曾在 伦敦编辑《印度工业评论》、在柏林编辑《反对帝国主义评论》。苏俄布尔 什维克看到了他的战略价值,便积极召唤他,而后者则于 1921 年经由斯德 哥尔摩来到莫斯科, 任职于苏联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编辑了六卷本英文版 《列宁文集》、翻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而印度革命党成员、后来成 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穆凯吉(Abani Mukerji, 1891-1938),被苏联安排 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印裔苏共党员卢佳尼(Gulam Lugani,1892-1938), 则被苏共安排在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委员会工作(任翻译)。然而,1920年代 末以后,尤其是 1930 年代的大清洗,苏共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殃及这些印 裔革命者,就像当时中山大学的许多师生无辜被怀疑、惨遭不幸一样, 1937-1938 年他们先后被当做间谍,受军事法庭审判,死于集体枪决,直到

1957年才被宣布平反。这种政治动荡也波及苏联的印度学领域。1930年代,东方学领域对唯心主义展开大批判,时任佛教文化学院院长、科学院东方所印度—西藏研究室主任谢尔巴茨柯伊(Фёдор Щербатской, 1866-1942)教授也难以幸免。他 1888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之后就留校师从米纳耶夫,此后赴维也纳和波恩研究印度诗学与哲学、佛教,回国后致力于研究佛经手稿,发表了许多被国际印度学界所赞赏的成果,如 1923年用英文出版的《佛教的中心概念和与达摩术语的意义》(加尔各答, 1955年再版)。这种政治批判还殃及他的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如 1937年初才被任命为科学院东方所西藏研究室负责人的沃斯特里科夫(Андрей Востриков, 1902-1937),4月初就被捕。很快,这位以研究印度佛教哲学和藏学而著名的青年东方学家就被处决了(生前发表过俄文和英文关于西藏和印度的语言、文学、宗教研究论著 20余种)。

然而,即便如此,印度学在苏联仍然步履维艰地发展着。苏俄发现,印度作为具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国家,被英国殖民两个多世纪,却未能成为发达国家,仍然处于落后状态,这样的情势是能用来证明殖民主义原罪的,"印度"也因此成为苏联用来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资源。这意外地促成了印度学在苏联的再度复兴。这样一来,苏印关系的超常稳定发展,并非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性考量,还有着强大的印度学基础。或者说,借助印度学的描述,在和西方争夺第三世界话语权上苏联取得了相当的优势,也提升了印度在苏联的国际战略构想中的地位。从帝俄时代开始的印度学传统,因此而得以接续并扩大,其成果也丰富了其他相关学科。[©]

当然,印度学在希望追求崭新文化的苏联能得到重新复兴,与尼古拉·勒里希及其家族在苏印关系上扮演的特殊角色不无关系。这位出生于俄国政治和文化世家的艺术家,1897年从印度学文献上知道了神奇的印度,就对印度文化痴迷不已,"经由拜占庭我们梦见了印度,我们向此地走去。勿须预言,研究印度及其艺术、科学、日常生活,是最切近的意向。毫无疑问,这些探索产生了最好的结果。"[©]于是,在结束了彼得堡艺术科学院的工作之

① Рерих Н. Русь - Индия// Весть: Книга советско-индийской дружбы. М.; Дели, 1987. С.64-65.

② Рерих Н.К. Собр. Соч. Т.1. М., 1914. С.259.

后,他就借担任艺术评审委员会秘书、主持"艺术世界"联盟工作(1910-1915) 的机会,大力引进印度文学艺术。他于十月革命前去欧洲旅行,1923 年绕 道来到印度和西藏, 1928 年举家到了旁遮普。这样的经历, 不仅意外逃避 了国内的政治灾难,而且作为曾是白银时代文化的参与者,原本就钟情于印 度艺术和东方文化,到印度后就更喜爱创作有关喜马拉雅山自然风景、佛教 生活主题的艺术作品,推出了大量关于印度题材的油画、诗歌、哲学和文学 批评论文。不仅如此,还身体力行甘地思想,创立"经由文化走向和平(Mup через культуру)"的国际文化运动。这种印度情怀,成就了其《神学之路》 (1924)、《亚洲的心灵》(1929)、《未来的大门》(1936)、《喜马拉雅— 光明之所》(1947)等充满着钟情佛教信仰的力作。如此情形,提升了印度知 识界和文艺界对苏俄的好感, 使苏联推动印度学发展和接纳印度文化获得了 另一个基础,为苏俄的艺术发展增添了新元素。其中,著名电影艺术大师爱 森斯坦 (Сергей Эйзенштейн, 1898-1948) 就深受其启发, 声称东方文化的关 键价值是其艺术和哲学表达了全人类性的诉求;并且,在自己的电影实践中, 他经常利用包括印度佛教在内的东方素材。有意味的是,长期侨居印度的勒 里希家族,有难以忘怀的俄罗斯帝国情怀,对印度的描述和认知既不同于西 方,也异于印度本土。这种情形在其长子尤里•勒里希(Юрий Рерих, 1902-1960) 和次子斯维亚托斯拉夫 (Святослав Рерих, 1904-1993) 的艺术和 学术活动中同样有明显的表现: 俩兄弟都曾在伦敦大学和哈佛大学受业东方 学,长期旅居印度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受到印度政府的特别尊重。 1957 年冷战正酣之时,他们满载声望回到苏联。尤里的《西藏与中亚》、 《中亚之旅》和《佛教与统一的亚洲文化》等构建了西藏、佛教和印度的战 略意义。苏联官方印度学家沙波什尼科娃(Людмила Шапошникова, 1926-) 在《勒里希遗产》(1990)中说: "不要忘记,勒里希遗产是很有价值的,而 且是巨大价值"。^①由此,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 1960 年 5-6 月, 国立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和国立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举行 了勒里希家族艺术展: 1974 年, 苏联和印度合作举办了纪念尼古拉•勒里 希纪念活动(包括艺术展); 1984 年, 苏联举办了纪念尼古拉·勒里希诞辰

① Наследие Рериха. Интервью//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30 мая 1990.

110年的多项活动(包括关于该家族对世界文化史贡献的学术研讨会);即便 到了放弃冷战意识形态的苏联末期(1989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仍然决定 成立"苏联勒里希基金会(Советский Фонд Рерихов)"和勒里希博物馆(1991 年,基金会创建了国家勒里希研究中心。后苏联继续了这一传统,1993年 俄联邦政府决定成立国立勒里希东方艺术博物馆,2004 年为纪念斯维亚托 斯拉夫·勒里希诞辰百年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而能出现这样的情形, 又与后来成为勒里希博物馆馆长、国际勒里希研究中心第一副主席、勒里希 慈善基金会董事长的沙波什尼科娃的诠释和推动有关。沙波什尼科娃在南印 度马德拉斯大学教授俄语、并在苏联对外友谊和文化协会马德拉斯分会工作 期间,受邀访问过斯维亚托斯拉夫•勒里希,实地体验了勒里希家族。 1974-1980年,她沿着尼古拉•勒里希的中亚之旅路线,重访了阿尔泰、蒙 古、西藏、印度等地,看到了这个家族的印度学成就及其对苏联的意义,于 是决定要彰显这一业绩。她和基辅科学电影制品厂合作拍摄电影《尼古拉·勒 里希》(1976),出版《从阿尔泰到喜马拉雅:尼古拉·勒里希的中亚考察之 路》(1987)等,广泛地描述了勒里希家族在苏印文化交流、印度学研究、艺 术创作等方面成就,使勒里希家族的声望进一步提升。正因为有这样的贡献, 她得以参与苏联东方博物馆勒里希文化艺术遗产委员会的工作, 1989 年当 选为苏联勒里希基金会主席。她还出版了《来自宇宙的支配》(1995)、《几 个世纪的智慧》(1996)、《美的荆棘之路》(2002)、三卷本《了不起之旅》 (1999-2006)和两卷本《勒里希家族之国》(1998-2009)等,从而使勒里希家 族在后苏联持续享有崇高的声誉。这些也为印度学之壮大,铺垫良多。

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总体上却未阻止印度学研究的开展。列宁格勒大学继续成为印度学中心,而科学院东方所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各自加强了印度学研究。并且,这些机构不断整理帝俄时代重要的印度学研究成果,如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米纳耶夫的《印度和缅甸旅行日记,1880、1885-1886年》(1955)、《印度民间故事集》(1966)等经典之作。许多专家接力翻译《摩诃婆罗多》等印度文化经典。尤其是,科学院整合全苏印度学研究队伍——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出版全方位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丛刊《印度

年鉴》(Ежегодник Индия)(后苏联时代刊行《东南亚:发展变化中的重要问题》)。这些作为,使得在延续印度学传统基础上的苏联的印度研究,形成了有别于帝俄时代印度学的新格局。

首先,近现代印度史研究,成为苏共第三世界理论和国际主义意识形态 的践行领域之一,出现了大量使用"无产阶级"、"资本家"、"殖民主义"和 "国际主义"等概念来解释印度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奇特景观。上述著名印度 史学家沙波什尼科娃,其顺利通过答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印度工人阶级在 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战中的领导作用》(1954)就充满着这类话语。她于 1957-1985 年任职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借助其间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交 流和以苏联对外友协马德拉斯分会主席的身份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发表了 《印度无产阶级为统一行动而战(1934-1939)》(《历史问题》1957 年第 2 期)、《印度人民为国家自决和各邦改造而奋斗》和《印度无产阶级和工人运 动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状况》(论文集《印度和阿富汗斯坦》1958 年)、 《克拉拉邦共产党活动的若干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学》1960年 第 9 期)、《1934-1936 年的印度工人运动》(论文集《东方国家历史和文学 问题》1960年)、《1934-193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演讲报告集》1960 年)、《论印度工人运动史》(1961)等。这些在当时有过不小影响之作,透出 意识形态对现当代印度史研究的作用力。而现任俄罗斯东方学会主席雷巴科 夫(Ростислав Рыбаков, 1938-), 1963 年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毕业后, 就在科学院东方所工作,一直按苏联官方要求研究印度问题。其论著《对维 韦卡南达宗教哲学著作因果报应概念之阐释》(1970)、《佛教进行资产阶级 改革的基本特征》(1973)、《印度教的资产阶级改革》(1981)、《印度教的社 会基本特征》(1985)、《印度政治发展中的宗教因素和印度教共产主义的角 色》(1991)等,明显套用苏联社会学研究方法去解释印度问题。同样,后来 成为科学院院士的彼得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安纳尼奇(Б.Ананьич, 1931-)的诸 多研究,以及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任职于科学院东方所的列文(Cepreй Левин, 1930-1984)的《上流社会的商贸: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商贸 史》(1964)、《巴基斯坦大资产阶级的形成》(1974)等,还有列伊斯涅尔 (Л.Реиснер)教授的《莫卧儿时代的印度农民》(1927)、《锡克族的土地运动》

(1928)、《17-18 世纪的印度民众运动》(1951)等,在论题和表述上都有演 绎苏共意识形态的痕迹。这种情形在冷战时代尤为时兴, 如帕夫洛夫 (В.Павлов)的《印度资产阶级的形成》(1958)、《印度资产阶级: 历史研究》 (1964)、《在为争取自由而战中的印度民族革命组织,1905-1930》(1970)、 《现代印度的意识形态问题》(1970)、《印度国民大会:论意识形态和政治》 (1978)等,科学院东方所安东诺娃(К.Антонова)教授的《十八世纪英国对印 度之侵占》(1958)、戈利德别尔格(Н.Гольдберг, 1891-1961)的《印度史概 论: 民族解放运动和新时代》(1965)、乌里扬诺夫斯基(Р. Ульяновский)教 授主编的《为了东方的社会进步而战:历史与当代》(1990)等,皆充满着冷 战时期苏式意识形态话语。更有甚者,沙斯齐特科(Пётр Шаститко, 1923-2009) 在苏联的声望,靠的是用印度社会案例演绎列宁的民族主义理 论;长期致力于编纂印地语—俄语词典的别斯科洛夫内依教授,在冷战初期 就发表《"战斗": 普列昌姆德的社会戏剧》(1947) 和《普列昌姆德, 1880-1936》 (1949) 等论文, 研究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Mushi Premchand, 1880-1936) 的文学作品是如何描写英国殖民主义破坏印度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承、导致 印度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等问题; 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的古谢娃 (Наталья Гусева, 1914-2010),在古印度文学研究上卓有成效,却不妨碍她 也研究印度政治问题,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拉贾斯坦邦:民族和问题》(1989) 等。同样,科学院东方所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Игорь Серебряков, 1917–1998) 以研究古印度文学著称,其实他曾是《真理报》驻印度的记者,发表过大量 有关当代印度文学和苏印关系的作品,如《印度的人民作家》(1947年第1-3 期)、《论印度文学的民主精神》(1947年第7期)、《苏联文学艺术中的印度》 (1951 年第 2 期) 等。这种情形正如加马尤诺夫(Л. С. Гамаюнов) 在《苏印友 谊的生成和加强》(1956)中所说的, 苏印关系的基础之一是共同反对西方殖 民主义。其本人之作《我国和印度文化关系发展史》(1955)和《论在变成西 欧诸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前东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1960)等给出了证 明这一论点的历史证据。要特别说明的是, 苏联当局鼓励这种研究: 二战中 曾是苏军尉官的科托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Котовский, 1923-2001), 战后在莫 斯科大学东方学院学习和研究,1971年以莫大印度和南亚教研室主任的身

份访问印度,凭借《印度简史》(1973 年初版、1979 年再版)的学术功底,出版了高度赞誉苏印关系的《苏联和印度》(1987),轰动一时(在后苏联他转向近现代印度史研究,参与《东方史·新时期的东方(18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撰写)。可见,苏联时期印度学界对印度近现代史和当代现实发展诸问题的研究,深受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波及到中国和东欧学界。

当然,苏联时期印度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延续帝俄时代的传统,把印度研究纳入东方战略框架,并随着苏联的国际境遇之改变而调整。从前述谢尔巴托斯柯伊教授的命运变化,就可以看出印度学研究是如何为俄苏的东方战略服务的:他于1918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不仅是因为其在佛教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而且还与其政治影响力相关——他在任彼得堡大学教授期间,曾出使西藏,并与达赖喇嘛会谈过,从而被认为对苏印关系有特殊贡献。因其熟悉印度事务(1910-1911年访问孟买等印度多个城市),1924年还受苏联当局委派,去布里亚特进行"科学考察"——实际上是要建立布里亚特人与达赖喇嘛的精神联系。1930-1942年,他出任科学院东方所印度—西藏研究室主任;二战开始后,当局停止了对他的批判,并把他列入疏散名单。冷战时代,为了彰显同天主教、新教对抗的力度,在整体上推行无神论政策的前提下,苏联当局对其两卷本《晚期佛教徒学说的知识论和逻辑》(1903-1909)特别推崇,科学出版社还再版了他的两卷本英文论著《佛教逻辑》(1958、1962)和《佛教研究论文选》(1988)等。

冷战时代,俄印关系成为印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成果量在印度学研究中占很大比重。在这一领域,安东诺娃(К.Антонова)的《十七一十八世纪的俄印关系》(1963)、巴伊科娃(Н.Байкова)的《俄印商贸联系中的中亚角色(16世纪初到18世纪)》(1964)、柳司捷尔尼克(Е.Люстерник)的《19世纪俄印经济、科学和文化联系》(1966)等,在当时对强化苏印关系皆产生了现实意义。而且,随时代的变化,俄印关系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文学接受和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了更多论述俄印文学关系的论著,如什甫曼(А.Шифман)的《托尔斯泰与东方》(1971)、拉林(Б.Ларин)的《因为俄印相协调:与古罗斯相对应的印度文本》(1977)、谢列波廖可夫(И.Серебряков)的《普希金

的文学创作和印度》(1979)、加邦加尔德—列文等人的《印度形象: 苏联的古印度文明研究》(1984)、维加辛(A.Вигасин)的《18 世纪俄国对印度人的研究》(1985)、绍欣(В.Шохин)的《11-15 世纪古罗斯文化中的古印度: 历史问题》(1988)、利特曼(A.Литман)的《圣雄甘地对俄国和苏联的兴趣》(1989)等。它们高度肯定印度文明,赞赏俄苏文学受惠于印度文化,期许俄印文化互动等。这种现象在苏联汉学研究中罕见(少有触及俄罗斯思想如何受益于中国文化)。这类论述在冷战时代很好地配合了苏印关系的进程。

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继续帝俄时代把印度研究和藏学关联在一起,切 实推动西藏问题研究和印度问题研究一体化,这就使印度学研究不再仅仅是 **学术行为了**。1919 年,前述德尔智去卡尔梅克时,国内战争正酣,神职人 员处境危险,但他带有列宁亲笔签名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致卡尔梅克人民 书》,一路畅行。1920年,他被邀请列席共产国际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向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汇报卡尔梅克人与布里亚特蒙古人自治的问题, 列宁和 人民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等都接见过他。尤其是,1922年创建了布里亚 特学术委员会(Буручком),主席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西藏人、布里 亚特著名学者巴拉金(Базар Барадийн, 1891-1937)。因其谙熟西藏事务和 其特殊地位(1906-1907 年受命在科学院中亚和东亚研究所派遣赴西藏,担 任达赖喇嘛十四世陪读,同时也借机更深入地研究西藏文化、语言和习俗), 第二年受命组建布里亚特一蒙古自治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担任主席: 1925 年布里亚特一蒙古学术委员会创立后,他担任主席: 1929 年该委员会升格 为国立布里亚特—蒙古文化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期间还兼任布里亚特— 蒙古师范学院布里亚特—蒙古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巴拉金于 1937 年在大 清洗中被处决,1958 年被平反昭雪。因为有这样的学术和政治一体化的历 史, 苏联政府一直强调要尊重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 克人。上文提及的尤里•勒里希后来得到苏联当局的重视,也与他艺术中的 西藏因素有关。他曾深入西藏实地考察,1949年在东喜马拉雅领导印度— 西藏研习班,他的《西藏绘画》(1925)、《当代西藏语音》(1928)、《中国西 藏收藏品》(1930)等著作模糊了西藏和印度的界限。1957年回到苏联后, 当局为其提供科学院东方所印度宗教史和哲学史教授的职位, 创造条件让他 留下了许多藏学遗产,如在后苏联整理出版的《藏一俄一英词典》(1993)、《西藏语》(2001)、《亚洲的佛教和文化之统一》(2002)等。从事同样性质"学术活动"的还有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拉彼诺维奇(Израиль Рабинович, 1917-)。在苏联时代,他主要在科学院东方所西藏研究室从事藏印关系、藏俄关系研究,为俄苏把西藏作为和印度相关联的"独立国家"提供理论和历史根据。其编纂的巨著《俄语—北印度语词典》(1957)收录了不少藏语词汇;其著作《四千年来印度文学简史》(1969)也涉及西藏的文学作品。这种在帝俄时代印度学和藏学合一基础上,把佛教、蒙古学、藏学研究与苏俄内部治理一体化的做法,为后来苏联当局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学术依据。1979年苏联当局同意达赖喇嘛十四世非正式访苏,其后又同意他两次秘密访苏,1991-1992年达赖公开访问苏联和俄罗斯,访问团成员皆为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印度学这种学术政治化和政治学术化的传统,在俄联邦仍得到延续:

1993 年,在莫斯科成立了西藏文化和信息中心,负责人为格舍·扎巴·京雷(1962-)。此人出生于印度米索尔的西藏流亡政府成员之家,在流亡的中央西藏学院毕业。这个中心是他受达赖喇嘛十四世之命创办的,借此在莫斯科大力推介与印度相关的西藏文化。此举也得到了俄有关方面的积极呼应。他本人作为宗喀巴喇嘛佛教中心负责人,有意识地推动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与西藏的文化联系,为达赖喇嘛赴俄活动提供"合法化"的根据。^①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俄国并不罕见,它反映了俄国对西藏一印度认知的常态。例如,作为国际著名的印度学一藏学研究期刊,《俄国的佛教》1996年(总第25期)开篇就这样说:"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西藏以后,4000座寺庙被毁,600万藏民死亡,以达赖喇嘛为首的10万佛教神职人员逃到在印度才幸免于难。今天几十万中国人迁居到西藏,西藏佛教文化面临着完全消失的危险。在全世界都害怕中国,或者热衷于和中国贸易时,如何帮助西藏呢?"紧接着的诗篇《西藏和俄国》如是咏叹道:"西藏和俄国。由同一个天空所连接,/被同一阵风所吹拂,被同一种标准所环绕,/西藏和俄国,正如过去同一片草原上/到处都有星星、温泉、佛像。/西藏和俄国。

①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 10. 1998. С.40.

有着彩虹般的黎明、电光、晚霞。/它那纯净的水和喜马拉雅山·····"。而这样的情怀,在苏联解体后又得到了学术的支撑:苏联—俄联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印度研究中心教授沙乌米安(T. Шаумиан, 1938-)的著作《西藏:大游戏和沙俄》(2000),就把西藏视为和俄国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他在《俄国对英国的印度之"威胁":西藏维度》中声称: "西藏的命运在 19 世纪后期以来是被预定的。英国殖民主义当局趁西藏这个国家衰弱和不备之际,去抵抗印度的主人——英国人所认为的强势且经验丰富的邻居中国。而中国由于长久以来的情势而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其藩属。但远东局势的加剧恶化使俄国无暇顾及印度,许可印度进军西藏······"。而这样的言行很难解释为某些学者的个人行为,如 1997 年俄科学院成立了蒙古学、佛学和藏学联合研究所,这种藏学—印度学—蒙古学研究和俄国社会治理、外交政策—体化的机制,是导致中俄关系总体良好但仍存在某些微妙之处的内在根源之一。

不过,因要在有关印度研究上有意识地突出与西方认知之区别,以及显示印度文化在东方文明中的优势,意外地导致印度古代史研究成为苏联印度学中最有实绩的领域之一,且这种实绩影响到对印度通史的建构。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邦加尔德一列文(Г.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1933-2008)院士,与安东诺娃教授以及克托夫斯基(Г.Котовский)教授合作的《印度通史》(1973),成为国际学界公认的力作(很快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和孟加拉语),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作者具有从文明史构成角度深入研究印度断代史的扎实基础:邦加尔德一列文以《孔雀帝国之教育和管理体系史》(1961)和《孔雀时代的印度:社会、国家和文化》(1970)获得副博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很早就显示出对印度断代史研究的功力。借助这种学术功力,又有苏联民族学理论和东方史学观的指导,所以其在印度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如《古代印度文明:历史概论》(1969年,和伊利因合作,1985和2001年两次再版)、《孔雀时代的印度》(1973)、《从西徐亚到印度。古抒情诗:神话与历史》(1974)、《斯里兰卡古代和中世纪艺术》(1974)、《古印度的先贤和哲学家:古代文化遗产若干问题》(1975)、《古印度文明:哲学、科

① Буддизм России. № 25. 1996. С.57.

② Eugenia Vanina (ed.), Indian history: a Russian viewpoint, Delhi: Pragati Pub., 2003, p.44.

学、宗教》(1980年初版,1993年再版《古印度文明》、2001年再版《古 印度文明: 历史、宗教、哲学、史诗、文学、科学、文化相遇》)、《古印 度综合研究: 多元方法》(1986)、《佛之沉默》(1989)等,至今仍被广泛引 用、再版。正因为如此,作者能升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和南亚教研室 主任,获得国家奖(1988),成为科学院院士(始于 1990),担任国家《古代 史通报》主编等。这种效应,也促使他在后苏联时期继续这一研究,出版了 《古印度:历史与文化》(2001)、《印度与古希腊世界》(2002)、《印度: 民族语言学史、政治文化结构、书面语遗产和古迹文化》(2003)等。而从文 明史角度研究古印度历史,是苏联印度学界的普遍做法。1976 年毕业于莫 斯科大学历史系的罗曼诺夫(Владимир Романов, 1947-), 先后任职于科学 院东方所、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所、人文大学东方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研究所, 他的《古印度关于皇帝和王国观念》(1978)、《古印度文明起源的若干特性》 (1985)、《<摩诃婆罗多>的结构之观察》(1985)等, 在后苏联时期仍然是重 要的参考文献。由于古印度史和古印度文明浑然一体,古印度人对世界的认 知就是印度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苏联对印度哲学也特别在意,如马 梅多夫(Ш. Мамелов)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印度哲学作品选》(莫斯科思 想出版社, 1969)等这类基础性读物,就彰显印度哲学的丰富多彩。

更重要的是,古印度文明史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些所谓文学经典的文本。苏联印度学队伍不断扩大,使其完全有能力强化帝俄时代开始的翻译印度经典名著的传统。在科学院院士巴兰尼科夫的倡议下,从 1939 年开始,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卡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 Кальянов, 1908-2001) 领衔俄译《摩诃婆罗多》全本的工作,科学院东方所两位教授瓦西里科夫(Ярослав Васильков, 1943-) 和涅维列娃(Светлана Невелева, 1937-) 参与其中。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包括二战时期,都未完全停止翻译工作。科学出版社在苏联时代先后推出俄译本前五篇(《初篇》、《大会篇》、《森林篇》、《毗罗吒篇》、《备战篇》) 和第 8 篇《迦尔纳篇》,其他 12 篇,包括第 6-7 篇《毗湿摩篇》、《德罗纳篇》,和第 9-18 篇,即《沙利耶篇》、《夜袭篇》、《妇女篇》、《和平篇》、《教诫篇》、《马祭篇》、《林居篇》、《杵战篇》、《远行篇》、《升天篇》等,在 1993-2005 年间陆续出版。这套译本,

堪称世界同类译作中的精品,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就得到印度方面的赞扬[®]。它连同斯米尔诺夫翻译的该作中八卷哲学韵味浓厚部分(1955-1982)、罗巴诺娃(Нина Лобанова, 1904-1976)和利帕金(Семён Липкин, 1911-2003)等翻译的部分章节,以及巴兰尼科夫教授翻译的《罗摩衍那》(1948)等,共同显示出苏联印度学研究在国际学界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实际上,对这些史诗,苏联印度学界不仅持续地精心翻译,而且还不断 深入研究。涅维列娃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后(1957),一直任职于科 学院东方所列宁格勒分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除上述翻译实践和成果 外,她还开设"史诗导论"、"古印度文学和文化"、"古印度史诗"等课程, 同时发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摩诃婆罗多〉语言的形动词之有限 使用》(《语言学》杂志 1964 年)、《〈摩诃婆罗多〉的名字》(《印度文学》 1973年)、《印度教的起源》(《印度年刊: 1984》, 1985年)、《论和古老仪 式概念相关联的古印度史诗文本之结构》(论文集《民俗学和早期文献中的 古老仪式》1988年)等论文,和《〈摩诃婆罗多〉:古印度史诗研究》(原为副 博士学位论文,1991 年修订成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摩诃婆罗多〉: 古 印度史诗的艺术语言》(2010)等著作。她的合作伙伴瓦西里科夫也发表了不 少成果——《〈摩诃婆罗多〉与口头史诗》(《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古 印度的 12 年轮回》(《印度最早文本研究通报》1972 年)、《〈摩诃婆罗多〉 的口头诗学元素》(《文学印度》1973年)、《〈摩可婆罗多〉中朝圣主题的意 义》(载《印度文学》论文集收录,1979年)、《印度史诗与欧洲骑士罗曼司: 相似的主题》(《印度 1985-1986 年年鉴》收录, 1987 年)等。这些都显示 出苏联在印度史诗研究方面的超群实力。同样,上文提及的古谢娃、半个多 世纪都在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古印度宗教文化和古罗斯文化, 关注经典文学现象,出版过《丰富多彩的印度》(1971)、《摩诃婆罗多:儿 童读本》(1984)等力作,把古印度文化和社会风貌生动地推向社会大众。而 195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的埃尔曼(Владимир Эрман, 1928-), 先留系在印度学教研室工作四年,后在科学院东方所列宁格勒分部研究古印 度文学,主要是翻译和研究《摩诃婆罗多》,发表《〈摩诃婆罗多〉,抑或关

① Джавахарлал Неру. Открытие Индии. М.: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5. С.108.

于婆罗多子孙的大会战之传说: 古印度史诗》(1963)、《罗摩衍那》(1965)、 《古印度的三部伟大传说(〈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薄伽梵歌〉)》(1978) 等通俗论述这些经典的成果,扩大了这些作品在苏联的影响力。不仅如此, 他在古印度剧作家迦梨陀娑及其剧作《沙恭达罗》的研究上卓有成效, 出版 了《迦梨陀娑: 创作概论》(1958)、《迦梨陀娑》(1976)、《吠陀梵语文学史 概论》(1980)等著作,发表长篇论文《古印度古典文学中的戏剧理论》(载 上述《印度的戏剧和戏剧演出》1961)等。也就是说,对印度其他古典文学 的翻译和研究,也是苏联印度学界的重要工作。196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东方学院的杜宾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Дубянский, 1941-), 一直在该学院从事古 泰米尔语言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翻译有《棕榈树叶上的诗歌:古典泰米尔语 抒情诗》(1979)、《泰米尔语文学》(1987)、《古泰米尔语抒情诗的仪式和神 话之资源》(1989年初版俄文版,2000年英文版)等。1971年毕业于莫斯科 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苏沃洛娃(Анна Суворова, 1949-),借助五年大学期间 打下的专业基础(乌尔都语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文学),在科学院东方所亚洲人 民文学部从事印度和巴基斯坦文学艺术的翻译研究工作,出版了《乌尔都语 小型史诗达斯坦的诗学问题》(1979)、《新印度戏剧的起源》(1985)、《戏剧 起源考:二十世纪印度和巴基斯坦戏剧》(1988)、《印度受读者喜爱的长篇 史诗》(1992)等力作。英年早逝的谢缅佐夫(Всеволод Семенцов, 1941-1986), 其《婆罗门教叙事文之阐释问题(仪式的象征)》(1981)、《在 传统和当代学术讨论中的薄伽梵歌》(1985)、从梵文翻译的《薄伽梵歌》(后 人整理,1999年出版)等,堪称对印度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并且,正是得 力于对这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深入研究, 苏联在印度文学史及其重大问题上取 得了西方所不及的成就,出现一大批功力扎实、视野开阔、并有方法论创新 价值的作品,如人文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谢列勃廖内伊(Ceprex Серебряный, 1946-), 在苏联时期发表的诸多成果, 如《论印度文学史中 的"作者"和"作者身份"概念的若干观点》(1979)、《新印度长篇小说中 的"自我"与"他者"》(1980)、《印度和蒙古若干民族的环形叙事作品》(1981)、 《印度和其他民族的"环套小说"》(1981)、《对"印度文学"概念之分析》 (1987)、《从印度学观点看"独特的文学一般性"概念》(1987)等(后苏联时

代继续这种研究思路,发表《泰戈尔的宗教和文化认同》1996 年英文版),都具有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价值。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职于外国文献图书馆的萨扎诺娃(Наталья Сазанова,1932-2006),长期研究印度文学史问题,其《关于印度文学分期的意见》(1968)、《16 世纪宗教诗歌的某些特性》(1978)等,是显示苏联的文学史观之力作。科学院东方所佐格拉夫(Г.А.Зограф)教授主编的两种《印度的古代和中世纪文学与文化》(1979、1987),展示了苏联学界对印度文学之文化根据的探索水平。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出苏联建构印度文学史的宏观能力,为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世界文学史》提供了基础,使之能包容更多的东方文学,在冷战时期尤其表现出与西方学界忽视和贬低东方文学的不同。而如此强化印度文学在东方文化的重要地位,也为苏联把印度在国家的东方战略中区分开来提供了学术依据。

更有意味的是,这种显示苏联印度学实力、彰显学界对印度文明重视的 **情形,得到当局的支持。**因主持《摩诃婆罗多》全译本工作,卡里扬诺夫在 二战刚开始时就被苏联政府疏散到塔什干,战时还继续主持东方所印度研究 室的工作。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学士、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格林采尔(Павел Гринцер, 1928-2009), 1957 年以来一直在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事印度 经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因先后出版《古印度散文》(1963)、《〈摩诃婆 罗多〉和〈罗摩衍那〉导读》(1970)、《印度史诗:起源和类型学》(1974年答 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古典印度诗学基本范畴》(1980)等力作,获 1990 年 度苏联国家奖。这种学术体制,形成了重视译介和研究古典史诗的传统,在 后苏联时期依然得到了延续。如瓦西里科夫继续推出《再论〈摩可婆罗多〉 的类型化阐释》(《印度-伊朗杂志》英文版 1995 年第 3 期)、《第一部译自 梵文的俄语译本:列别杰夫•斯里兰卡经典俄译本》(《印欧语言学和古典 语文学》2007)等重要论文。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格鲁什科娃 (Ирина Глушкова, 1952-), 1991 年就任职于科学院东方所印度研究中心, 负责《在南亚天空下》项目组,先后出版了《印度的朝圣:运动的隐喻和隐 喻的运动》(2000)、《来自印度的篮子:历史诠释》(2003)等著作,还出版 了《印度的妻子》(1996)、《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家和房子》(1998)、《〈摩诃

婆罗多>的家和家园》(1999)、《〈摩诃婆罗多>的家、家庭和血缘关系》(1999)、《佛教之树》(1999)、《传到印度的语言》(2008)、《死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想象、感觉、具体表现》(2012)等重要论文集,并发表了《原始印度宗教》、《古典的三位一体:梵天、守护神毗瑟挐、湿婆神》等很有深度的论文。同样,在苏联因研究古印度文学而获国家奖的格林采尔,在后苏联继续其研究,出版《〈梨俱吠陀〉的神秘语言》(1997)和《古希腊和印度的文学理论之形成》(2000)等,古谢娃推出《古吉拉特邦》(1998)、《旁遮普》(1999)、《这些令人惊异的印度人》(2007)、《古印度的传说和神话》(2008)等扎实研究印度内部具体问题的力作。这些分别显示出苏联印度学的巨大影响力和后苏联学界对传统印度学的有序承续。

其实,得益于奥尔登堡等人创立的彼得堡学派及其扎实基础,苏联对古 **典印度学的研究,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关于印度语言的研究。**作为苏联比较印 度语言学的创始人、毕业于基辅大学的巴兰尼科夫(Алексей Баранников, 1890-1952), 1922 年成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 49 岁成为科学院东方所院士, 战前任东方所所长。其文学业绩,如译作《罗摩衍那》(1948)、著作《印度 语文学:文学研究》(1959)等,就仰赖其对印度语言研究的基础——两卷本 《印度斯坦语言(乌尔都语和印地语)》(1934)、教材《新印度语言的曲折变 化和分析》(1949)等,显示出苏联学者研究印度语言的扎实功底。毕业于莫 斯科东方学院的安德罗诺夫(Михаил Андронов, 1931-2009), 既在泰米尔 语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出版过《泰米尔口语及其方言》(1962)、《俄语—泰 米尔语词典》(1965)等,又在印度西南部沿海居民讲的接近泰米尔语的方言 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出版有《马拉雅拉姆语—俄语词典》(1971)、《马拉雅 拉姆语》(1993)等,在后苏联继续这种研究,出版了《达罗毗荼诸语言的语 法比较研究》(1994)、英文版《对马拉雅拉姆语的历时性研究》(1996)和《达 罗毗荼诸语言的历史语言学》(1999)等震惊国际学界的力作。1930 年毕业 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的别斯科洛夫内依(Василий Бескровный, 1908–1978), 先后任职于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等,其编纂的《乌尔都语 一俄语词典》(1953)、《印地语一俄语词典》(1953)和《俄语一印地语词典》 (1957)等很见功夫的词典,得到奥尔登堡和巴兰尼科夫院士的高度赞赏。沃

洛彼约夫-杰斯亚托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оробьёв-Десятовский, 1927-1956) 这位战后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成长起来的印度学家,在巴兰尼科夫指导 下完成的学士学位论文《中部印度语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历史发展》 (1951),居然能发表在当年的《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 副博士学位论文《印欧语言的人称代词之发展》(1954年通过), 堪称国际 印度语言学的重要成果(1956 年出版)。毕业后,他在东方所教授梵语、印 地语、巴利语、古印度帕拉克利语、波斯语、泰米尔语和藏语等。如此多门 语言课程,在国际印度学界罕见。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梵文等中亚语言手 稿描述"、翻译《梵文语法》等未出版的手稿之外,他还发表了《论印欧语 言中的指示代词的若干发展规律》(1958)、《论印欧语言发展中的本质性作 用》(1956年第1期《苏联东方学》)、《论印度北部居民各语言形成的初期》 (1954 年第 12 期《列宁格勒大学学报》)、《苏联科学院东方所的印度手稿 汇编》(1954)、《印度铭刻学札记》(1954)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一直在列宁 格勒大学受业的古洛夫(Никита Гуров, 1935-2009), 在苏联时代长期致力 于研究印度东部泰卢固语和达罗毗荼诸语言,出版有《泰卢固语简明语法》 (1972)和《原初印度语文本之语言学阐释的若干问题》(1971)。他在后苏联 时期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1999-2009 年担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印度语文学 教研室主任)。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任职于科学院东方所的叶利扎连 科娃(Татьяна Елизаренкова, 1929-2007) 教授, 致力于研究国际印度学界公 认的难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出版《古印度语的动词分类》(1955)、 《巴利语》(1965)、《印欧语言中的历时性音位学研究》(1974)、《吠陀语的 语法》(1982)、《吠陀经语言》(1987)等杰作。在后苏联,他继续出版《梨 俱吠陀》俄文译本(1989-1999)、《阿闼婆吠陀》俄译本(2005)、《〈梨俱吠陀 >的名与实》(1999)等延伸成果。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任职于科学院东方 所列宁格勒分部的佐格拉夫(Георгий Зограф, 1928-1993), 出版有《新印 欧语言的形态学结构》(1976)、《南亚语言》(1990)等,成为苏联著名的印 地语和乌尔都语专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萨维丽耶娃 (Людмила Савельева, 1933-), 一直研究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语言, 出版《古吉拉 特语》(1965)和《古吉拉特语—俄语词典》(1990)等专业性力作。诸如此类 的成果显示,苏联持续对印度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冷战时期 更加大了研究力度,取得了能与西方印度学相媲美的成就,从而使印度文学 的译介和研究有了扎实的基础,超越了原本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研 究,意外地成为印度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领域之一。

需要提及的是,在印度古典文明中,文学和语言还负载了印度宗教信仰 **的信息。**因此,苏联印度学又一重要领域是对印度宗教的研究。前面提到的 古谢娃教授,不仅研究古印度文学经典,还深入研究印度的古老宗教——比 释迦牟尼出生更早的笩駄摩那(Vardhamana,公元前 599 年-前 527 年)所创 立的耆那教(Jainism), 出版了让当时苏联读者深感新奇的著作《耆那教》 (1957)。论及苏联对耆那教的研究,最有业绩者当属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获 得学士、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森科 (Виктория Лысенко, 1953-), 他致力于研究耆那教,发表了《耆那教的原子论与德谟 克利特的原子论》(论文集《古印度:历史文化关系》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 社,1981)、著作《印度的滋润哲学:耆那教学派的原子论》(1986)等,在 后苏联出版了《印度思想史上的延续和断裂:语言学传统和耆那教》(1998)、 《耆那教的普遍性》(2003)等,深入讨论流行于恒河流域的耆那教,指出耆 那教否定婆罗门教所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种姓制度、 神灵崇拜等,强调苦行和戒杀,推崇灵魂解脱、业报轮回和非暴力等,以及 主张不杀生、不妄言、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等五戒,以求获得"解脱"。 这样的论述,显示作者对耆那教之研究的深入。当然,**佛教是最受重视的。** 前面谈到的许多印度学研究成果已经涉及对佛教的探索。而那位谢尔巴特斯 柯伊之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与他对佛教研究的业绩不无关系,先后出版了 《佛教中心概念和"印度教规训"术语的意义》、《佛教涅槃概念》、《佛 教逻辑》等著作,成为国际著名的印度佛教研究学者。同样,毕业于列宁格 勒大学东方学系的鲁多伊(Валерий Рудой, 1940-2009), 1962 年以来先后 在科学院远东所和东方所从事古印度佛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出版了《论印 度古典宗教哲学体系之研究的历史哲学进程动力》(1987)等著作。在后苏联 时期,推出的成果更多,如《佛教看世界的观点》(1994)、《佛教导论》(1999)、 《古典印度哲学》(1999)等,还有译作《瑜伽经》(1992)和《翻译中的佛教》

(1994),以及教材《印度古典哲学中的历史时间和社会之学说》(2002)。这些学者的成果显示出苏联时期东方宗教研究的雄厚基础及其后续效应。当然,有关研究也触及了印度成为殖民地以后出现的基督教问题,如维杰尔尼科夫(А.Ведерников)的《印度的基督教》(1955)。这些成果表明,苏联印度学界能超越无神论意识形态,遵从国家东方战略,对印度宗教展开切实研究。

上述各项研究意味着,苏印关系远比同时期的苏中关系稳定,没有出现过恶语相向(尽管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曾支持印度共产党反对政府,冷战时代又对印度愿意留在英联邦有所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和苏联的印度学研究有关——受帝俄时代留下的丰富的印度学遗产启示,苏维埃政权看到了与印度友好相处的重要性。而持续加大对印度问题研究的力度,又为斯大林时代和冷战时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合法理由,并给苏联重新争夺在南亚的战略利益以信心,尤其是为苏联在南亚和东方展开冷战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或者说,凭借印度学提供的理论根据,苏联大胆地在印度实施东方战略。例如 1953 年签署《印苏贸易协定》,1955 年签署《印苏钢铁协定》和《印苏航空商务合作协定》等,1956 年签署《印苏关于在苏联训练印度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协定》等,这些合作项目促进了印度的现代化发展,帮助印度建立了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同时也加大了印度对苏联的依赖程度[©]。

同样重要的是,纳入东方战略的印度学,在苏印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数十年来,印度对苏联的信赖有增无减,友好的热度从未降低。泰戈尔故居把 1963 年苏印文化关系协会赠送的泰戈尔塑像置于最显眼的位置,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苏联,勒里希家族也备受推崇。列宁格勒大学著名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 1912—1992)从孟加拉语翻译《泰戈尔抒情诗集》(1961),深受苏联读者青睐。1961 年苏联出版 12 卷本直接译自孟加拉文的《泰戈尔全集》——百年纪念版,被视为苏印文化界的大事。苏联末期社会思潮纷纭杂乱,却未影响到印度学研究的开展,对印度重要文化现象的研究照常有序展开。在这期间,推出了《非理性传统与当代:印度》(1987)、

① 到 1975年,苏联对印度进出口贸易总额、范围、质量等,位居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最前列; 1980-1985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近 130 亿美元武器装备(参见《苏联对外贸易基本统计》,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古代和中世纪印度的文学与文化》(1987)、《孟加拉的民间故事和传奇》 (1990)等重要成果。印度学研究的成果也大大充实了相关学科的论述,如彼 里耶夫(M.Блиев)和杰戈耶夫(B.Дегоев)的《俄国外交政治中的东方问题: 18 世纪末-20 世纪初》(1978)和《俄国外交政治史》(1997)、季良平纳(H. Киняпина)的《19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对外政治》(1974)和《俄罗斯帝国的民 族边疆区》(1997)、波斯图诺娃(И. Ростунова)主编的《俄罗斯—土耳其战 争, 1877-1878》(1877)、普林采夫(Г.Принцев)的《19 世纪俄国的文化和 艺术》(1985)、斯杰尔宁(Г. Стернин)的《世界图景中的 19 世纪后半期俄罗 斯艺术文化》(1991)、舒里金(В.Шульгин)的《9-20世纪俄国文化》(1996) 等,都因有印度学提供的史料和接触而大大提升了论述水平。这种全方位的 互动现象表明, 苏印关系表面上是因苏联比西方更拥有和印度直接交流的便 利,俄国文明中包含着东方文化的因素,而印度有被西方殖民统治的记忆, 难以接受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傲慢论述,但必须承认,是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学 的苏联印度学, 使苏联接纳印度作为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中间 人的角色有了理论支撑,使苏联人更愿意接纳印度而不是中国,同时重新强 化了俄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力。

作为体制性学术行为的苏联印度学,整体上却没有因制度更迭而大起大落,依然推出了大批直接作用于苏联东方外交和帮助苏联社会认识印度的优秀成果,也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印度学家。当然,印度是个历史悠久的复杂国家,俄印关系又极其复杂,许多论题是体制性研究所难以包容的,更何况体制性研究难以避免的选题集中、论述缺乏生气、理论根据单一、缺乏全球共识等不足,以及完全排除个人兴趣的研究,造成不少坚持个性的印度学家被追流寓国外。例如,对《吠陀经》颇有研究的奥金别宁(Борис Огибенин/Boris Oguibénine,1941-),1974年被迫流寓到西德,后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梵文教授,用英文和法文发表了大量有关佛教、梵文、印欧语等研究论著;为《苏联大百科全书》(1972)撰写"文化"、"印度哲学"和"瑜伽"等条目的吉里别尔曼(Давид Зильберман,1938-1977),因是犹太人,被苏联当局限制接受文科教育,所学专业和印度学并无关系(奥德赛大学水文气象学专业),所从事的工作也与印度学毫无关联(在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的

机场从事机场气象工作),因师从《摩诃波罗多》俄译者斯米尔诺夫(Борис Смирнов, 1891–1967)院士(苏联土库曼斯坦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学习梵文并受其感染,对印度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虽有幸成为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生,专攻方法论问题,但学位论文《论对文化传统之理解》未能通过答辩,许多文章遂被迫发表于地下出版物,最后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1973年流寓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很快发表了多种著作。应该说,诸如此类情形对苏联印度学研究是巨大的损失,也是在后冷战时期俄国印度学成果难以被国际印度学界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

总之, 受西方印度学启发而成长起来的俄国印度学, 因为和俄国东方战 略一体化,发展出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的论述。帝俄时代的印度学传统,在苏 联时期依然得到延续和发展。根据米罗诺夫长达 280 余页的《俄国图书馆藏 印度手稿目录》^①(彼得格勒:科学院出版社,1918)所提供的数据,俄国印度 学成果数量巨大, 而不少论著可谓功底扎实之作, 抓住了印度宗教和世俗文 化之间的矛盾, 也正视俄国社会发展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事实。彼得堡大学 教授、著名东方学家巴尔托里德 (Василий Бартольд, 1869-1930) 院士在《东 方和俄罗斯科学》(1915)中证实,看似比印度要发达得多的俄国科学技术, 也不是没有印度的影响。而印度学在俄国的出现、在苏联的发展, 在相当程 度上呼应了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对印度——西藏——蒙古——中亚的战略:印度被 纳入反对西方的框架, 俄国得心应手地处理和英属印度的外交关系, 同时提 升了俄国在印度的文化形象,切实发展了俄印文化关系。这种今天看来属于 人为的关联,却因俄国民主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印度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 参与,反而使俄印关系得以不断扩大和稳固。俄印互动关系,又密切了俄国 印度学者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使俄国印度学能在印度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也保证了俄国能睿智地对待南亚地区,俄国许多的音乐、绘画、文学等 作品能受益于印度学成果和印度作品所提供的灵感。

① Николай Миронов (1880-1936). Каталог инди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Петроград: Акдемия Науки, 1918.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建制的印度学也有其不足。在斯大林时代,对印度早期、中世纪和现代化初期的历史,以及对印地语、乌尔都语和梵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顾及不多,错失了对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前夕印度社会变革、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转型,以及同西方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深入观察和研究,苏共意识形态的干预了印度学诸多论题的确立、研究的立足点,所幸没有全方位影响具体的研究过程,所以俄国能够推出一批又一批今天看来仍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当然,苏联印度学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学术坚守的,那些真正研究印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的学者,普遍能超越意识形态,在后苏联时期也不放弃学术立场。这种状况,相较于美国的苏联学变成智库行为,学术探讨让位于冷战意识形态,要成功得多。此外,帝俄一苏联的印度学,给俄联邦外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扎实基础,普京时代的俄国人由此认识到,俄联邦若要在亚洲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力,不能没有印度这样的老朋友,俄印不仅仅是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而且是"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

【Abstract】 Compared with Russia, India is not only a strategic hinterland competing with the West for Central and South Asia,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in constantly rebuilding "Eastern civilization". As a result, India, either weak during British colony or underdeveloped in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economy during the Cold War ear, had been highly valued by both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all social fields in addition to diplomacy.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Russia has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ndian studies, which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Indian studies in Russi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ritish colonialism, evoking Russian intellects' sympathy on Indian reality. Their reverence for classical India also won the favor of India; Sticking to this tradition and even making more researches on Indian classical civilization; the Soviet Union yielded great related results and received more active responses in both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is just the result of

① S.Kapila, "Russia Rekindl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Papers (SAAF)*, No.1180, 7 Dec, 2004.

imperial Russian and Soviet Union's cognition and position including India into its eastern strategy. Moreover, India is regarded more credible and more respectable than China.

Key Words Indian Studies, Imperial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Инд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 только территорию с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значением в регио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жной Азии, за которую ведётс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с Западом, но 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ресурсом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воссозд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удь-то слабая Индии под британским колониальным гнётом, или Индия с неразвит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и слаб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щью в период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на не была обделена внимани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идавали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ндии не только в област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о также это касалось и всех сфер и уровней общества. Такое явление эффективному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ю в России внедрённой с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Запада индологии: индология в Росси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британского 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пробуждает сочув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 реалиям Индии, почтение к индийским традициям и классике, а также вызывае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чувства к Инди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должил эту традицию индологии, и в период СССР даже углубилось изучение инди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чём СССР добился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что был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воспринято как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так и в Индии. Трудно вообразить, что это и стало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онима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положения Инди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а также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ндия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Китаем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более надежной и достойной большего уважения стран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дология, изучение Индии,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СССР

(责任编辑 陈大维)

No.2, Apr. 2013 Gen. No. 180

1884 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创建 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松里公孝**

【内容提要】1860年前后,《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俄罗斯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新领土,俄罗斯政府开始讨论在远东地区设立新总督区的方案。但直到 1884年,才最终创建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20 多年的拖延和讨论不仅仅因为官僚体制的效率低下,更是由于该总督区的设置涉及到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行政区划的全面调整,势必造成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而且将引发很多复杂且难以调和的问题与矛盾。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和中亚的扩张使得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一条漫长的边境线,任何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领土区划的改革都要在这种中俄全面竞争的背景下进行,俄罗斯政府必须综合考虑中亚和远东领土区划的改革。经过 20 多年的争论与磨合,俄罗斯政府最终决定打破很多旧的传统,对整个亚洲部分领土的行政区划进行全面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于 1884年创建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完成了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关键词**】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 领土区划改革 权力重构 【中**图分类号**】D83/87(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2 -0116-(35)

^{*} 长野大学的冢濑进(Susumu Tsukase)教授为作者介绍了很多关于远东地区中俄关系 史方面的中文著作,特此致谢。本文英文版发表于 The Russian Review 杂志 2012 年第 71 卷第三期,松里公孝教授和 The Russian Review 杂志授权本刊独家刊发中文版,本刊对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遵循我刊编辑标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娜丝佳(Anastasiya Bayok)协助将注释内转写为拉丁字母的俄文书刊名称恢复原状,特别表示感谢。

^{**} 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 教授。

从 1860 年俄罗斯获得阿穆尔河^①沿岸地区到 1884 年设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其中间隔了 1/4 个世纪,这种拖延已经被归咎于官僚体制的惰性。事实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行政区划改革也需要这么长的酝酿期,因为它是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行政区域改革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俄罗斯获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与其在中亚的扩张恰好同时发生,这使得俄罗斯与清帝国之间形成了一条从帕米尔山脉一直延伸到波西耶特湾的漫长边境线。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是在与大英帝国竞争的背景下设计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行政区划改革的。在他们眼中,英国将坚定地支持中国。

根据 1860 年的《北京条约》,清帝国将乌苏里江地区割让给了俄罗斯。二十年后,一位俄罗斯海军高级军官对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过程进行了回顾(他回忆的是由 1847 至 1861 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Николай Н. Муравьёв]组织的远征),并且惋惜地说:"1842 年,英国得到香港,在十年时间内,他们已经建起了一流的港口,巩固了自己在远东的存在,并且垄断了中国南部的全部的批发贸易。但俄罗斯(在十年时间里)什么也没得到。"。由于穆拉维约夫的远征,俄国人"已经弄清了海岸和河流水系",而且意识到"在长达 250 英里的海岸线上有大约 20 个良港,足以隐藏最大型的军舰,其中有一些还是全年不冻港。这些领土的获得恰好就在克里米亚战争刚刚战败之后,战争的失败使俄罗斯失去了在黑海部署舰队的权利。"。然而,除了建立阿穆尔州和滨海州(见图 1),并且将其置于东西伯利亚总督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ёв-Амурский)管辖之下(他自己还不愿意管理滨海州的事务)这种微不足道的行政区划调整之外,俄罗斯"什么也没有做"。在《北京条约》签订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俄罗斯才设立了独立于伊尔库茨克东西伯利亚总督区的远东(阿穆尔河沿岸)总

① 俄国所称的阿穆尔河,中国称为黑龙江,本文为叙述方便统一称为阿穆尔河,特此说明。——译者注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РГИА).ф.1604 (Делянов, Иван Давыдович). оп.1. д.768 (Записка бывше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Главн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а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сил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О положении и нуждах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л.2. 因为该档案资源是一本印刷的小册子,下文引用该档案文献时只列页码,不再详列其全称。在与清帝国签订《瑷珲条约》之后,亚历山大二世授予穆拉维约夫阿穆尔伯爵的称号。

③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8. лл. 2–3.

督区。①

上文所引述的俄罗斯海军军官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在 1884 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设立前夕,俄罗斯军队和政府的领导人普遍都对 19 世纪 60-70 年代将十多年时间浪费在官僚体系喋喋不休的争论中感到遗憾。^②这种"失去 20 年"的观点看上去也给历史学家的判断蒙上了一层阴影。例如马克•巴辛(Mark Bassin)、安纳托利•列姆涅夫(Anatolii Remnev)和西尼琴科(V.V.Sinichenko)等研究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问题的专家都对俄罗斯远东政策不同时期的划分有着几乎相同的看法: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对于远东充满热情的时代;1865-1878 年,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几乎遗忘了远东事务(如果不是厌恶远东事务的话)的时代;由于柏林会议(1878 年)后国际局势再度紧张,远东事务重新获得热切关注的时代。^③这种分期很容易获得理解,因为巴辛和列姆涅夫都通过考察大众对于远东看法的方式分析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对于获得的新领土所产生的影响。为了这一目标,他们

① 关于俄罗斯总督在帝国边缘地区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参见我的研究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От этнического 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му подходу. в Новая импе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ед. И.Герасимов и др.Казань, 2004. С.427-458. 总督区的建立就是对边缘领土成为帝国正式领土的认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远东"诞生"于1884年。例如可参见Дубинина Н.И.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 Н.И.Гродеков.Хабаровск, 2001. С.53.

② Анатолий Ремнев. Росс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мпер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ласти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Омск, 2004. С.269-270, 275-276. 推迟在远东地区建立独立的总督区是非常奇怪的,不仅与大英帝国积极的东亚政策相比较是如此,而且与俄罗斯帝国自己的中亚政策相比较也是如此。在1860年代中期扩张到突厥斯坦以后,俄罗斯军事和行政领导人拒绝了奥伦堡总督亚历山大•别扎克 (Aleksandr P. Bezak) 和他的继任者尼古拉•克雷扎诺夫斯基 (Nikolai A. Kryzhanovskii) 所提出的由遥远的奥伦堡来管理这一地区的设想,而是早在1867年便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

③ Mark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Ремнев. Росс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idem,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the Imperial Geography of Power", in Russian Empire: Space, People, Power, 1700-1930, ed. Jane Burbank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16; Синиченко В.В.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ередина 50-х гг. XIX века-1884 г). 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Ирку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8.在这些历史学家中,列姆涅夫不知什么原因比较赞赏这种各部之间进行的讨论,认为这是推动领土行政改革的"科学路径",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那种武断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参见 Ремнев.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Сибирь: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Омск, 1997. С.80-83.

采用了多种假想地理学方法(methods of imaginary geography)。他们不仅利用官方文件,而且使用文学作品、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记录以及大量的新闻报道开展研究。这些的研究对那种集中关注俄罗斯官僚体系内部政策制定者之间争论的传统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其主要的结论是:他们所推动的行政改革是在俄罗斯亚洲部分整体重构的背景下进行的,涉及的区域从海滨一直延伸到奥伦堡,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花了 20 年的时间来实施改革的原因。^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有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关注—遗忘—关注"模式的分期方法:1860 年代初,俄罗斯扩张的步伐到达远东,也刺激了关于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区划改革的辩论;从 1863 到 1878 年,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和持续的军事行动使得关于远东领土区划改革问题的讨论始终活跃;而从1878 年到 1884 年,柏林会议后出现的紧张军事局势促使覆盖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的综合领土政策出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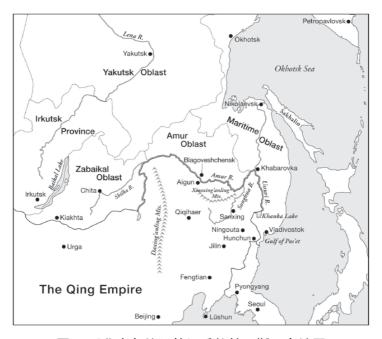


图 1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① 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奥伦堡并不代表俄罗斯现在的奥伦堡州,而是包括西哈萨克斯坦、南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奥伦堡总督区。

约翰•莱顿尼(John P. LeDonne)是地理历史学的前辈,他将俄罗斯的"东方战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分析。例如,他将伊犁危机[®]的爆发部分归咎于俄罗斯为抵消"他们在阿穆尔河河谷的脆弱性"而采取的行动。一旦俄国决定从喀什噶尔撤退,他们就会努力让清政府相应在东北边境地区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以便提高他们在那里的"攻击力"。[®](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1880年代初,在吉林军事长官吴大澄所推动的吉林省军事和行政改革就是对伊犁危机的反应,尽管那里距离吉林的距离超过5000公里。)虽然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莱顿尼的观点,但他将他所说的"东方战区"的范围扩得太大,将高加索地区也纳入其中了。至少在研究重点关注的这段时期内,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显示俄国政界在辩论远东行政和领土区划改革时与高加索政策有任何关联。很可能作为可识别实体的俄罗斯帝国"东方战区"的边界止于乌拉尔哥萨克和布克依部落的领土(Bukei)(即所谓的下伏尔加地区),[®]而高加索地区属于另一个"黑海战区"(即莱顿尼所谓的南方战区),它由高加索地区延伸到多瑙河公国以及保加利亚,它所面对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

这些俄罗斯亚洲部分行政改革具体的决策细节证明了他们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机构内部的辩论。在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境地区,获得新领土时总会 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领土和法律传统以及强大的非俄罗斯精英一并纳入帝

① 1871-1881 年,在突厥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冯·考夫曼(Konstantin von Kaufman)的倡议下,俄罗斯占领了清王朝治下的喀什噶尔地区(今喀什地区)。

② John LeDonne, "Building an Infrastructure of Empire in Russia's Eastern Theater, 1650s-1840s,"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47, No.3, 2006, pp.581-608; idem,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9-190.

③ 布克依汗国即内帐汗国(Inner Horde),原为小玉兹一部。——译者注

④ 乌拉尔哥萨克军是16世纪在雅伊克河盆地与诺盖人的斗争中形成的。随后,雅伊克哥萨克失去了自治权,被重新命名为"乌拉尔哥萨克",并且被纳入了奥伦堡沿线政府的军事系统。参见Алексеев В.В.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азиа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х т. Екатерин -бург, 1995. С.22-25. 1799年,由布克依领导的一些小玉兹(Lesser Juz)部族,由于在争夺可汗地位时被打败,奏请沙皇保罗一世准许他们迁往1771年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部)返回突厥斯坦后所放弃乌拉尔河左岸地区。两年后,他们的请求被批准,从而开始了"游牧部落从亚洲向欧洲的最后一次迁移"。1847年,布克依部落的可汗地位被取消,从此隶属于奥伦堡军事长官(总督)。1876年,部落转归阿斯特拉罕州长管辖。参见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 и Ефрон.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1. 4а. С.870.

国,例如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波兰的大贵族(szlachta)、罗马尼亚的波雅尔(boyars),更不用说那些在边境地区现有的行政体系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世俗和文职的官僚机构。所有这些因素都阻碍着领土改革的进行。^①与此相反,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划归战争部管辖,他们与其他官僚机构,例如外交部、地方总督以及临时的各部联席委员会分享决策权。结果,少数的军事和民政官员便决定了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领土设置。甚至在俄罗斯亚洲部分的一些地区,例如中亚,政府发现,尽管政治和种族的边界有些模糊不清,但还是可以依赖行政部门所决定的领土区划。然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不在此列,根据列姆涅夫的观点,(在远东地区)行政划界的方法并不是为了确认现存的各个地区(因为他们事实上并不存在),而是在创造这些地区。"创造者"便是那些总督和省长们,他们从帝国中心获得**全权委托**(carte blanche),组织地理学的探险并且试图通过促进移民和设计各种具有俄罗斯属性的象征性"证据"等方式来驯服远东地区。^②

通过质疑在那个时代的人和后世历史学家中广为流传的"失去 20 年"的观念,我们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需要对《北京条约》签订之前在远东地区的中俄关系史前史,以及条约签订后乌苏里江流域的中国人与朝鲜人的问题进行简要概述。只有在这些初步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回到官僚体系内部围绕着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区划改革展开的辩论上来,这也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_

① 其中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为了消除对立陶宛大公国的所有的历史记忆,从第二次波兰起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政府都在系统地削减西北总督区的管辖范围。参见Darius Staliûnas, *Making Russians: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after 1863*, Amsterdam: Rodopi, 2007, chap.1.

② Анатолий Ремнев, "From the Okhotsk-Kamchatka region to the Far Eastern viceroyalty: Administrative games in the Far East space of the Russian Empire", News Letter: 近代東北ァジア地域史研究会, no.19, 2007, p.4.

根本性领土改革的障碍

迟迟没有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设立独立的总督区确实值得批评。符拉迪沃 斯托克(海参崴)离伊尔库茨克的距离有 4512 公里,比圣彼得堡到伊尔库 茨克的 6130 公里少不了多少。如果考虑到伊尔库茨克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之间通信联系会出现季节性崩溃,这种联络不便的情况甚至会更加糟糕。 总督被认为是在遥远地区的国家权力的代表,但是伊尔库茨克的总督不可能 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直接扮演这一角色。除此之外,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新 获得领土的驯化和开发都要求远东地区行政官员具有相当的创造力。这与东 西伯利亚总督区的超级官僚体制(hyperbureaucratic)的特点之间存在严重 的矛盾。1822 年的《西伯利亚法典》(Siberian Statute)是东西伯利亚和西西 伯利亚总督区的法律基础,它是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M. Speranskii)巡查西伯利亚之后通过的。由于对西伯利亚官员的腐败和专制 统治的失望, 斯佩兰斯基通过引入合议制管理方式来限制西伯利亚总督的权 力。^②同时,各州长官又要服从总督。各州州长的执政表现本来应该依靠他 们有效的领导能力,然而,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的州长制定的任何地区发展措 施却都要等待伊尔库茨克的批准。而反过来,东西伯利亚总督则经常要耗费 数月的时间在圣彼得堡试图加快官僚程序以便执行他的各项政策。③

尽管从伊尔库茨克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进行治理有明显的不便,但有几个原因使得根本性的领土区划改革被推迟。首先,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改革不能脱离俄罗斯亚洲部分的整体重构而独自进行,因为政策制定者主要是在俄罗斯与清帝国及其保护者英帝国(俄罗斯人相信二者是这样的关系)展开

①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7. 1.1об.

② 合议制管理方式对于东西伯利亚总督的限制,随着总督个人被授予矿产管理、征收间接税、在伊尔库茨克控制海关、邮政和教育的责任而逐渐削弱。东西伯利亚是一个与高加索很类似的地区,总督也担任这一学区的主任。西伯利亚的主要管理机构在1887年才废除。参见РГИА. ф.1683. оп.1. д.20. лл. 85-86; Дамашек Л.М., Ремнев А.В. ред. Сибирь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осква, 2007. С.123-124.

③ Дамашек и Ремнев. Сибирь. С..

全球性竞争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另一个造成二者不可分割的原因是所 谓的"撞球综合症"(billiard syndrome)。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随即将迫使 总督们的工作和注意力转移到新获得的领土上来,这将导致各总督区之间管 辖地区的重新分配,以及边缘地区军事辖区和内部民政辖区范围的重新分 配。^②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创建一个独立的军事和行政单位的目的是为了减轻 东西伯利亚总督由于管辖范围过大而肩负过重的负担。但只有当新的远东总 督区足够大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对于这项特殊的改革政策的讨论 会反过来激起另一项改革方案——将东西伯利亚总督治下最西边的省份,叶 尼塞省转归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见图 2)。这样一种变动将使西西伯利亚 总督辖区的边界向东移动,特别是这项改革措施还将使不与中国接壤的托博 尔斯克省被纳入内务部的管辖之下。在托博尔斯克可能"内务部化"的情况 下,一些政策制定者还提出完全取消西西伯利亚总督区的计划。而且政策制 定者还提出在可能取消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区的同时相应地创建一个包括奥 伦堡总督区、草原地区(the Steppe),以及新获得的中亚地区在内的巨型的 总督区。这种"巨型狂躁症"的基础是对于米哈伊尔·沃龙佐夫(Mikhail S. Vorontsov) 总督区的浪漫记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总督区统辖整个高 加索地区、南乌克兰 (新俄罗斯),以及比萨拉比亚地区。

推迟领土区划改革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需要确定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 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还是只能作为仰仗外部资源的一个军事前哨。从 阿穆尔河伯爵穆拉维约夫时期开始,就有一部分政策制定者根本不相信阿穆 尔河沿岸地区能够自我维持,并因此计划将阿穆尔州和滨海州从东西伯利亚 分离出来,重组为一个军事总督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有俄罗斯人迅速地

① 俄罗斯建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清帝国放弃传统的附庸体系,将新疆作为一个正式的省份并入自身版图同样都发生在1884年,这并不是偶然的。参见S. C. M.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Sharpe, 1996, p.166. 同年,朝鲜(也是清帝国的附庸)与俄罗斯签订了俄朝友好贸易条约,这是东亚向主权国家体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注释中作者所说的"新疆作为一个正式的省份并入自身版图······在1884年"指的是中国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将新疆转变为一般省级行政区域这一事件发生在1884年。相信本文读者对二者的区别都有足够清楚的理解。——译者注)

② 俄罗斯帝国的一贯做法是将那些不再被认为是边缘地带的地区转由内务部进行民政管理。

在阿穆尔河沿岸进行殖民,并且发展经济,才能够守住这一地区。这一群体的创始人似乎是西西伯利亚总督(1851-1861 年在任)古斯塔夫·加斯福德(Gustav Kh. Gasford)以及阿穆尔伯爵东西伯利亚总督职务的继任者米哈伊尔·科萨科夫(Mikhail S. Korsakov, 1861-1871 年在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新设立的行政单位应该是一个具有广泛民事能力的总督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总督区。^①正是后面这个群体促使"远东"这一概念有了新的地理内涵——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一起纳入了"远东"的范畴。外贝加尔地区过去属于旧(《瑷珲条约》签订之前)西伯利亚,在经济、军事和地理上都是内陆地区。在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设置前夕,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两个州的人口约有8万,而在1897年的统计中,外贝加尔州人口达到66万。毫无疑问,新总督区的特点主要取决于是否将外贝加尔州包括在内。



图 2 《北京条约》(1860年)签订之后的俄罗斯亚洲地区

① 交通大臣康斯坦丁•波西耶特 (Konstantin N. Pos'et) 是这一观点早期的倡导者之一,他甚至认为可以"追随其他国家殖民政策的先例",为远东地区任命一名文职总督,因为"在这一地区如果民政和经济活动取得了成功,它也会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Ремнев. Росс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276.) 波西耶特在努力推动日本放弃历史悠久的闭关锁国政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乌苏里地区最南端的海湾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推迟行政改革的第三个原因来自俄罗斯政策制定者的信念,他们认为当中国和/或英国采取敌对行动时,俄罗斯帝国无法防卫乌苏里江到日本海之间的狭长地域。由于这种我称之为"南乌苏里情结"的悲观情绪的存在,即使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南乌苏里地区很明显地成为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最有价值的战略要点之后,俄罗斯军方和政府官员仍驻扎在位于阿穆尔河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海军据点。①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状态、日本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并且加入国际体系,以及朝鲜局势的不稳定,都使得南乌苏里地区的价值更加凸显。但直到 1880 年以前,尼古拉耶夫斯克都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所在地,也是滨海州的首府。即使是在 1884 年,领土区划改革结束、俄罗斯的太平洋战略方向已经调整南移之后,南乌苏里情结仍然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1895 年之后,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鲁莽政策,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日俄战争。②这种鲁莽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消除南乌苏里情结地理基础的尝试,希望使这一地区不再成为中国东北和日本海之间的狭长夹心地带。③

俄罗斯在阿穆尔河沿岸遭遇东亚

1552 年喀山汗国崩溃之后,俄罗斯开始了向西伯利亚的大规模移民。

① 例如,在186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科萨科夫就认为,想守住乌苏里江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沿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缺乏基础设施和人口,海岸线太长,距离内陆定居点的距离太远。当然,最重要的是,预算不足。参见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РГВИА). ф.38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оп.8. д.62. л.35об.-36.列姆涅夫在他的书中还介绍了关于"南乌苏里情结"的其他例子,参见Росс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205-206.

② 对于日俄战争的原因,学术界存在多种解释,文中说法仅为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刊观点。——译者注

③ 参见Лукоянов И.В. Не отстать от держав...: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8. ос. гл.5, 8, и 9; and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ap.8. 人口方面的压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的南乌苏里情结,1895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谢尔盖•杜霍夫斯科伊(Sergei Dukhovskoi)给沙皇的报告中写到,只有8.7万俄罗斯人和3.5万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而中国东北的人口有1300万。参见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ГИА ДВ). ф.1 (Примор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правление). оп.1. д.1444. лл.5-5об.

克服了动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1598-1613 年)的混乱之后,他们向东迁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632 年,他们在勒拿河沿岸建起了雅库茨克城。1639 年,俄罗斯人"发现"了阿穆尔河,并沿阿穆尔河航行,到达了太平洋。到了 1643 年,俄国哥萨克和移民与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的达斡尔人、尼夫赫人以及其他土著部落发生了暴力冲突。几乎与此同时,1642 年,满洲人征服了中原,^①到 1652 年,清朝的正规部队与俄罗斯人在这一地区发生了零星的战斗。^②在平定三藩之乱(1674-1681 年)并于 1683 年收复台湾以后,清帝国决定给予来自北方的"入侵者"致命一击。清军围攻俄罗斯在阿穆尔河流域建立的主要堡垒雅克萨(Albazin),并最终于 1685 年摧毁了雅克萨城。随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迫使俄罗斯人退回外兴安岭(Stanovoi Mountains)以北。被迫放弃阿穆尔河左岸地区之后,俄罗斯将移民的方向转向东北,跨过白令海峡,并在 19 世纪早期达到了加利福尼亚。^③

直到19世纪40年代,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此时恰逢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并在1845年建立了帝国地理学会,俄罗斯公众又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了阿穆尔地区。 "中国人早在唐朝时就已经知道萨哈林是一个岛,"1809年,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在萨哈林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考察再次"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清政府和江户幕府都没有与世界各国分享这方面的知识,他们非常自然地担心这一发现将大大提高阿穆尔河河口和乌苏里江沿岸地区在西方人眼中的战略价值。1847年,尼古拉•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他派遣海军将领根纳季•涅维尔斯科依(Геннадий Невельской)以非官方的形式考察阿穆尔河口地区。1849年,涅维尔斯科依确定了萨哈林是一个岛屿,大型船只可以穿越间宫海峡(鞑靼海峡)。1850年,当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河口地区建立了以沙皇名字命名的军事据点(尼古拉

① 此处是原文记载有误,清军入关时间应为 1644 年,特此说明。——译者注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两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一卷,第92-116页。

③ По ред. Крушанова А.И. Истор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ССР в эпоху феодализма 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XVII в.-февраль 1917 г. Москва, 1991. С.23-41, 73-91; LeDonne, Russian Empire, pp.155-160.

⁴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chap.3.

⑤《沙俄侵华史》,第二卷,第78-79页。

耶夫斯克)之后,穆拉维约夫立即将堪察加州(从结雅河[®]到白令海峡的沿海地区)从雅库茨克州分离出来。次年,穆拉维约夫又设立了外贝加尔州(在贝加尔湖和波克罗夫卡之间)和外贝加尔哥萨克军(Zabaikal Cossack Host),以此作为征服阿穆尔河流域的工具。[®]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这方面的努力。虽然在 1854 年,俄罗斯击退了英法海军对其在太平洋上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进攻,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无法在下一次的攻击中幸存下来,因此,他们很快将海军基地转移到设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新据点。[®]

1857-1860年,清政府在与英法进行的"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遇严重的失败。由于抽调八旗军队前往南方镇压太平天国造反(1850-1864年),又造成东北地区防御力量空虚。俄罗斯利用这一机会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瑷珲条约》使俄罗斯"收复"了阿穆尔河左岸地区,而《北京条约》则进一步撤回了自己在《瑷珲条约》中作出的妥协,将原本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地区完全变成了俄国领土。®在1858年之前,穆拉维约夫就希望清政府能够将乌苏里江地区割让给俄罗斯,但为了让清政府能够接受《瑷珲条约》,它接受了两国共管的模式。但这种妥协必定是短命的,因为俄罗斯迫切需要获得乌苏里江地区的优良港湾。这里终年不冻,与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海军港口完全不同,那里因为阿穆尔河淡水大量外流而导致每年有长达6个月的冰冻期。®俄罗斯政府在通过《瑷珲条约》获得的从波克罗夫卡到哈巴罗夫卡(即后来的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河上游左岸地区设立了阿穆尔州,而将根据

_

① 俄罗斯所称的结雅河,中国称为精奇里江。——译者注

② РГИА. ф.1683 (Остр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оп.1. д.20. лл. 82-82об.;Козюра А.В. Н.Н.Муравьёв-Амурский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1848-1860гг.).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Ирку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9. С.17-20.

③ По ред. Крушанова А.И. Истор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195-201; Козюра. Н.Н. Муравьёв-Амурский. С.53–54.

④ 关于八旗体系的论述参见 Kiyohiko Sugiyama, "The Qing Empire in the Central Eurasian Context: Its Structure of Rule as Seen from the Eight Banner System", *Comparative Imperiology I*,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10, pp.87-108.

⑤《沙俄侵华史》,第二卷,第125-219页。

⁶ LeDonne, Russian Empire, pp.178-185.

《北京条约》获得的乌苏里地区与 1849 年设立的堪察加州合并起来,设立 了滨海州(见图 1)。[©]本文将俄罗斯通过这两个条约获得的领土,即阿穆 尔州和乌苏里江地区命名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或简称为"阿穆尔河沿岸"。

中国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解释 17-19 世纪远东地区的中俄关系 存在着明显差异。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 阿穆尔河地区的土著部落并没有向 清帝国进贡, 而是具有反对清帝国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容易就向俄 罗斯探险家和哥萨克进贡(iasak)的原因。中国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认为阿穆 尔地区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被纳入唐帝国的朝贡体系。从那时开始, 当地人 一直向历代中原王朝进贡。在与达斡尔人和其他土著部落发生冲突时,哥萨 克的暴行, 甚至包括人吃人的行径, 引发了当地部落的激烈抵抗, 当地部落 也向清帝国寻求保护。^②然而,俄罗斯历史学家却认为,《尼布楚条约》是 清政府凭借在远东地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强加给俄罗斯的不平等条约, 甚至 对俄罗斯外交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他们认为《瑷珲条约》和《北 京条约》并不是不平等条约,尽管当时请政府正面临很多困难,但俄罗斯并 没有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相反,这两个条约巩固了中俄两国之间的联盟 关系, 共同对抗西欧帝国主义, 使他们没有机会对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发动攻 击。中国历史学家则认为,在《尼布楚条约》谈判期间,俄罗斯和清政府代 表团获得的安全保卫是对等的,因此,条约是谈判双方自由意志的结果。® 相反,俄罗斯施加了最大限度的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签署了《瑷珲条约》 和《北京条约》。甚至在这些条约签订之前,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已经开 始驱使大量的哥萨克和罪犯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地区定居,条约仅仅是确

① 换句话说,就是滨海州成为了一个从白令海峡一直延伸到波西耶特湾的庞大地区(见图2),而且这个州被委托给太平洋港口总指挥(海军军官)进行管理,作为一名军官,他自然对民政事务了解不多,这些缺陷在滨海州治理过程中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② 1643-1644年间,在与当地达斡尔人发生激烈冲突之后,瓦西里·波雅科夫的军队在乌姆列坎河河口越冬时遭遇了极其恶劣的环境。为了生存,他们抓住并且吃掉了很多达斡尔人。(《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94页。)(经原文核实,此处页码记载有误,应为《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85页。——译者注)

③ 这不应该被视为是毫无根据的论断。虽然准噶尔从1689年期就要求与俄罗斯联合对抗清帝国,但俄罗斯始终没有回应。如果俄罗斯对于《尼布楚条约》不满,他完全可以联合准噶尔来推翻这一条约。

认了这些**既成事实**。^①《北京条约》允许那些生活在跨乌苏里江地区的中国 本地人——俄罗斯人称他们为"蛮子"(Manzy)——不仅可以继续住在那 里,而且可以享受治外法权。^②蛮子可以自由穿越边境,中国政府的官员也 可以穿越边境,对蛮子收税并组织法庭审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给 当地中国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是清朝皇帝只是暂时委托俄罗斯管理乌苏 里江地区。③在俄罗斯当局看来,这种松散的边界控制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 中国"移民"所从事的掠夺式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乌苏里江地区的环境破坏。 在一份官方报告中,俄罗斯人声称,有4万中国人季节性地居住在乌苏里江 以南地区,他们在那里乱采滥伐,并将木材沿图们江漂流到珲春。他们每年 要砍倒一千棵树以种植蘑菇,致使"兴凯湖西侧和绥芬河盆地"变得光秃秃。 他们抓获了很多赫哲部落的人,并且强迫他们像卡巴拉 (Кабала) 奴隶那样 为其捕猎鹿和黑貂,甚至在动物繁殖季节依旧捕猎,丝毫不注意他们的繁殖 周期。他们忽视渔业活动中常识性的休渔规则,全年对整个渔场的倒吊鱼 (tangs)进行捕捞,而不是将其分为两个部分轮流捕捞,以保证倒吊鱼能够 完成两年的成熟周期。他们将兽皮和毛皮卖给上海的商人,赚取巨额利润。 他们用卢布交易, 因此促使上海逐渐崛起成为远东地区卢布兑换的主要中 心。最后,俄罗斯人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人的原因,鸦片消费已经开始在 当地俄罗斯人和土著人中流传开来。 4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官员计划通过将中国人组织成为同乡庄园 (мещане)的方式使他们定居下来,于是鼓励他们拥有房产。由于中国法律禁止妇女离开自己所在的村子,还推动他们与赫哲族或朝鲜族妇女通婚。

① 对比Истор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和《沙俄侵华史》前两卷,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这部两卷本史书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并不依赖中国文献,反而是根据十月革命之前和苏联早期对于远东历史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在那些研究成果出版时,俄一苏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必要对于叶尔马克和叶罗费•哈巴罗夫(哈巴罗夫斯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的暴行或者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的帝国主义野心保持沉默。

② "蛮子"这个名字来源于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意思是"野蛮人"。但俄罗斯人使用这个词并没有种族的涵义,他们将汉族人和满族人都称为"蛮子"。1867年,发生在阿斯科尔德岛上的中国淘金者和俄罗斯当局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事后就被称为"蛮子战争"。

④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8. лл. 9-35.

俄罗斯官方还计划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专门的学校,与东正教传教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每天在城市街道上跑来跑去的中国孩子有个去处。^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带有一定的反华情绪,但这些官员并没有提出大规模驱逐中国人的计划,这与1990年代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俄罗斯获得了乌苏里江地区以后,朝鲜族移民开始增多,到 1888 年,朝鲜人已经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南乌苏里地区建立了 18 个村,定居者有 7800 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官员欢迎朝鲜族移民,因为他们更加喜欢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比中国人更顺从,更容易同化。但是内务部的人认为朝鲜人是清帝国的潜在伙伴,应该加以防范,所以他们计划将其从边境地区驱逐,并重新安置在周围都是俄罗斯人的地区,并且对他们征税,授予他们俄罗斯国籍。^②

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对于中国人和朝鲜族移民仍然采取"利用并控制"的政策。这种政策得以执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能够享有比他的西伯利亚同事更多的决策空间。就其本质而言,这项政策需要通过试错来进行灵活的调整和演进。例如,虽然俄罗斯商业法律禁止外国人参与使用平底船进行近海运输活动(Ka6otaж),但在滨海地区的海运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和韩国船主。所以,总督安德烈•科尔夫男爵(Ahapeň H.Kopф)便忽视了这条禁令,转而对外国人收费,并用这笔费用帮助俄罗斯发展自己的近海运输业。[®]1879年,东西伯利亚总督推出了收费许可制度以管理在俄罗斯领海捕鱼的外国船只。但由于日本渔民租用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进行捕捞,这种制度被证明毫无效果。因此,1884年,科尔夫开始根据渔获的出口量收费。只要费用适度,这一制度是可以让日本渔民感到满意的。在1890年,他们还向俄罗斯驻东京使馆请愿,要求延长这一措施。[®]科尔夫将这些成功归因为他任职

①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8. лл.44-45.

② РГИА ДВ. ф.1. оп.1. д.1106. 1.5об. 这份文件另见于РГИА. ф.560 (Общая канцелярия Министра финансов). оп.21. д.506. 1.8об.

③ РГИА ДВ. ф.1. оп.1. д.1106. 1.4; 另见于 РГИА. ф.560. оп.21. д.506. 1.7.

④ РГИА. ф.560. оп.21. д.506. лл.6-6об.关于这一议题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参见Eisuke Kaminaga, "Maritime History and Imperiology: Japan's 'Northern Fisheries' and the Priamur Governor-Generalship", *Imperiology: From Empirical Knowledge to Discussing the Russian Empire*, ed. K.Matsuzato,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6, chap.13.

前三年里所拥有的行动自由。他试图通过这些成功说服中央政府授予他 10年的特殊权限,以便对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经营的各种行业(промыслы)收税,授予外国人俄罗斯国籍,并且推动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向乌苏里江地区移民。内务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Дмитрий Толстой)支持科尔夫,但是科尔夫计划中包含的很明显的独断决定权遭到了财政部的反对。例如,当他们问"行业"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科尔夫和内务部副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韦(Вячеслав Плеве)将其定义为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诸多现在还没有被私人占有的地区所进行的"自然产品的提取"。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不发达的国家财产体系使得建立契约非常困难,但是科尔夫认为,一个灵活的税收执行系统将能防止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掠夺。

政府终止了授予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独立作出决定的权限,但却要他去完成一些自相矛盾的要求。政府想要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自行发展,而不再需要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向其转移资源和资金。为此,总督只能剥削由中国人建立的商业和运输网络、由朝鲜移民从事的农业生产,以及日本渔民的渔获。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不愿意他们的东部战略要塞变得只能依赖周边国家而存在,也不想在如此接近中国边界的地方聚集数量如此庞大的清朝人。于是,我们遇到了俄罗斯远东开发过程中的历史性困境。直到今天,这种困境仍然在持续。不与东亚国家紧密合作,这一地区始终无法生存,但全心全意地与周边国家合作,又会引起中央政府心中的焦虑,这将使它变得更倾向于为东亚一体化进程设置障碍,例如,禁止远东地区的人们购买中国东北的粮食和日本的二手车。^①

① Юкимура Сакон. Проблема ввоз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хлеба в политик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в начале XX в. Тамож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2:39.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7. С.84–91. 俄罗斯在远东的困境一直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参见 John P. LeDonne, "Proconsular Ambitions on the Chinese Border: Governor General Iakobi's Proposal of War on China",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5:1-2, 2004, p.58. (关于当代远东地区日本与俄罗斯的二手车交易,参见阎德学、黄灏: "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二手车交易研究",《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6页。——译者注)

从远东到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1860年代初)

1860年,《北京条约》巩固了俄罗斯对乌苏里江地区的管辖。巨大的滨 海州出现之后,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再次提出他之前的计划,即将这个州 从东西伯利亚总督区分离出来。此时他正集中精力巩固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 防御,无暇顾及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远东地区的问题,因此,他催促西伯利 亚委员会同意将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州都从东西伯利亚总督的管辖范围中 分割出来。虽然此时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已经想要从东西伯利亚总督的职 位上退休, 但他完全能够通过他的追随者米哈伊尔 • 科萨科夫保持自己在东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影响力。科萨科夫也确实在 1861 年成为了东西伯利 亚总督,而且从 1856 年开始,彼得·卡扎克维奇(Petr V. Kazakevich)就成 了滨海州军事长官(直到1865年)这两个人在穆拉维约夫1840年代以来的 扩张行动中都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为了进一步优化东西伯利亚总督区的 规模,阿穆尔伯爵提出将叶尼塞省划归西西伯利亚总督区。①由于国务秘书 弗拉基米尔·布特科夫(Vladimir Butkov)的支持,阿穆尔伯爵将这个问题 与正在讨论中的奥伦堡州、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地区合并成为一个巨型总督区 的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提案给沙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皇要求西伯利 亚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御前讨论。此外,他还建议委员会成员阅读阿穆尔 伯爵穆拉维约夫的信,并提前提出他们的观点。^②

针对这一要求,战争大臣尼古拉·苏霍扎涅特(Nikolai O. Sukhozanet,1856-1861年在任)认为,将滨海州从东西伯利亚分离出去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这一地区的发展还离不开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支持。此外,由于这一地区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东西伯利亚总督获得官方授权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与中国开展外交活动,滨海州也不应该被剥夺这一权利。根据苏霍扎涅夫的观点,如果叶尼塞省被划给了西西伯利亚,那么托博尔斯克省(西西伯利亚总督区最西边的省)也得划归内务部管辖。苏霍扎涅夫彻底地批评了阿穆尔伯爵想要在幕后控制东西伯利亚和滨海州的野心。他承认远东地区因为季节性的原

①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3об.-4.

② РГВИА. ф.38. оп.8. д.46. л.7.

因与伊尔库茨克的交通时常中断,但伊尔库茨克与圣彼得堡之间全年可以进行通信联系,所以东西伯利亚总督区能够与外交部协调行动,能够相应地指示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教士团的活动。^①苏霍扎涅夫警告说,如果乌苏里江地区与阿穆尔州的行政权分离,那么对于二者都有损害,因为他们同属阿穆尔河流域,联系非常紧密。^②

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努力证明,将滨海州分离出来的理由,是因为俄 罗斯向东的不断扩张使东西伯利亚总督区变得过于庞大。而西西伯利亚总督 古斯塔夫 •加斯福德(1851-1861年在任)也发现治理新获得的中亚领土(七 河地区和伊犁地区)并不比治理远东地区更容易。加斯福德写道,他和他的 继任者需要努力与中国、浩罕汗国划定边界,并且还要控制 50 万过着游牧 生活的穆斯林,他们永远都不会像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通古斯人以及不 久的将来归属俄罗斯的其他东西伯利亚部落那样听话。按照加斯福德的观 点,叶尼塞省不应该归他管辖,因为该省的首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鄂木斯 克的距离是到伊尔库茨克距离的 1.5 倍。与西西伯利亚的情况相反,东西伯 利亚总督可以在前往圣彼得堡的途中定期巡查叶尼塞省。 在紧急情况下, 西 西伯利亚军队应该从鄂木斯克派往西南方向,而不应该向东(叶尼寨地区)。 加斯福德还反对将托博尔斯克省从西西伯利亚总督区划走,因为托博尔斯克 省的人口相对比较集中,拥有发达的葡萄园和酿酒厂,也是西西伯利亚总督 的主要财政来源。而托木斯克省的主要人口都是采矿的农民, 如果独立支撑 西西伯利亚总督区的财政的话,会负担过重。[®]此外,失去托博尔斯克还会 剥夺西西伯利亚进入以鄂毕河、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为基础的运输体系最 便利的入口。4

加斯福德批评建立一个涵盖奥伦堡州、草原地区和中亚的巨型总督区的

① 从170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东正教会就在北京派驻了传教士团。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给在雅克萨战争中被清军俘虏的俄国战俘的后代提供宗教生活。由于清政府没有认同现代国际体系,传教士团还肩负有俄罗斯使馆的作用。传教士团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研究中国、中国人和清朝,传教士团被视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天津条约》(1858年)签订后,欧洲国家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此之后,传教士团的作用才变为纯粹的宗教活动。

② РГВИА. ф.38. оп.8. д.46. лл.16-19.

З Там же. лл.20-25оb.

⁽⁴⁾ Там же. 1.26.

想法。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草原州和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缺乏"定居生活的基本要素",因此不应该设置统一的独立的管理体系。^①这几个州需要邻近的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省提供食品和其他资源。加斯福德强调,唯一能够确保这些游牧民族进行"道德改造"并且服从俄罗斯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办法,是使游牧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融为一体。无论这样一个巨型总督区的首府设置设在哪里——奥伦堡或者鄂木斯克——加斯福德都认为,由一个人来治理从里海到天山山脉的广袤领土是不可能的。他强烈反对将叶尼塞省和托博尔斯克省转给西边的总督区(或者说将西伯利亚总督区向东推进)。而加斯福德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建立一个包括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的"第三个西伯利亚总督区"。这样贝加尔湖以远的地区就被分离出来,而东西伯利亚总督也不需要放弃叶尼塞省。^②

虽然阿穆尔伯爵的提议由于"不成熟"而被西伯利亚委员会否决,但是这场讨论不仅清楚地表明,从伊尔库茨克治理远东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表明,离开了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改革,远东地区的行政区划改革不可能实现。[®]此外,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很多继续推动俄罗斯亚洲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关键问题。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否已经足够"成熟",以致可以从东西伯利亚独立出来了呢?一位地方官员是否能够(或应该)被授权负责整个与中国的边界?应该怎样处理诸如外贝加尔、叶尼塞和托博尔斯克这些中间地区?在获得新领土之后是否有必要将总督的管辖权东移?

从中亚到远东(1863-1878年)

1863年12月,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加上中国西北地

① "公民"和"公民意识"的概念当时通常在俄罗斯边缘地区的行政官员中使用,参见 Paul W. Werth, At the Margins of Orthodoxy: Mission, Governance, and Confessional Politics in Russia's Volga-Kama Region, 1827-190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24-125.

② РГВИА. Ф.38. оп.8. д.46. дл.28-30.

③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4.

区出现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叛乱(1862-1877年)^①,这都使得关于创建一 个囊括哈萨克草原和中亚的巨型总督区的讨论再次出现。®国务秘书弗拉基 米尔•布特科夫编制了一份备忘录,对于领土区划改革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设 计。这份计划获得了沙皇的批准,并且下令在1864年8月之前做好执行法 令的一切必要准备工作。[®]为此,政府要求俄罗斯亚洲部分的总督们对此发 表意见。当时的东西伯利亚总督、阿穆尔伯爵的继任者米哈伊尔•科萨科夫 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提出将远东地区从东西伯利亚总督区分离出去的计划。 与阿穆尔伯爵不同的是,科萨科夫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外贝加尔州在内的完全 成熟的阿穆尔总督区。他为这一设想辩解的理由是,乌苏里江地区人口的很 大一部分都来自外贝加尔州,而且乌苏里地区也需要外贝加尔持续的物资支 持。此外,阿穆尔河使得乌苏里江地区成为外贝加尔州的"自然延伸"。从 军事角度来看,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无法防御的, 除非新任的总督可以任意 部署外贝加尔地区的资源。对阿穆尔河沿岸和外贝加尔两个地区进行统一管 理,将使俄罗斯能够协调对蒙古和中国的政策。至于西伯利亚,伊萨科夫提 出,可以将托博尔斯克省转归内务部管辖,其余各省(从托木斯克到雅库茨 克)可以合并成为一个单独的西伯利亚总督区。

与此同时,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久加梅尔(Aleksandr O. Diugamel')主张,在楚河和伊犁河以外的地区(也就是未来的突厥斯坦总督区所辖领土),只要设立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单位就足够了。^⑤俄罗斯政府支持了久加梅尔的想法,于1865年初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来审议"俄

① 指清朝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译者注

② 关于苏菲派叛乱的问题参见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chap.4. 虽然直到1864年夺取塔什干,俄罗斯分割占领中亚的计划才最终完成,但在1863年,从奥伦堡开始的堡垒防御线已经延伸到中亚,并且控制了锡尔河下游盆地。这也就引发了应当以何种结构来管理未来中亚的哈萨克草原地区的争论。

③ РГВИА. ф.400 (Главный штаб). оп.1. д.264. лл.9-9об.这一方案提出组建一个新的总督区,授权其管理所有哈萨克人,而将西西伯利亚总督区改造成为一个仅由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组成的"民政总督区",包括诸如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叶尼塞等地。(Там же. 1.8).

Ф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4-4об. и 5-5об.; РГВИА. ф.400. оп.1. д.264. лл.12об.-13.

⑤ РГВИА. ф.400. оп.1. д.264. л.11.

罗斯亚洲部分和奥伦堡州的领土划分"。虽然委员会仍然认为这样一个单元有助于哈萨克人"公民意识"(гражданственность)的发展,但最终推翻了先前的成立一个巨型总督区的决定。[©]1863-1865 年间,在草原和中亚地区设置巨型总督区的尝试的失败,为未来俄罗斯亚洲部分区划调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865-1866 年,草原委员会走遍整个哈萨克草原开展了研究,这些研究促成了 1867 年独立的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创设,而且也促成了1867-1868 年期间在哈萨克草原地区进行的行政改革。[©]

1869 年,政府向东西伯利亚派遣了一个由大臣一级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由海军中将(General-Adjutant)伊凡•斯科尔科夫(Ivan G. Skolkov)担任主席。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使该委员会得出结论:新获得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需要一个以有组织能力且有思想的官员为首的独立领导层,这与《西伯利亚法典》所要求的官僚主义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该委员会认为,东西伯利亚军区的所有部门都集中在伊尔库茨克,而东西伯利亚的军队都集中在阿穆尔和滨海各州,这是不正常的。委员会提议,将行政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并且授予这些新的行政部门以必要的独立性。[®]为了对抗这种有利于海军的结论,1868 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科萨科夫重提他在1864年的建议。在1871年,由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 Konstantin Nikolaevich)主持的"阿穆尔事务特别会议",命令内务大臣准备一份关于"与突厥斯坦和奥伦堡总督区相连的整个西伯利亚"的新规划方案。这花去了他们两年时间,在1873年,内务部委员会作出结论,废除东西伯利亚总督区,建立包括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在内的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

1871年的伊犁危机显示出 1867年的领土区划改革不能克服分散式的总

① РГВИА. ф.400. оп.1. д.264. д.16.

② Осеков Б.К.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тепной комиссии (1865-1868 гг.). 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87; Жиренчин К.А. Рефор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6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авов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③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6-7об., и ф.1604. оп.1. д.767. л.3.

④ РГВИА. ф.400. оп.1. д.264. л.6;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7. л.3. 列姆涅夫在他的书中详细描述了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的斗争。参见Росс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249-260.

督区体系中存在的固有缺陷,于是,找到一种方法来协调俄罗斯整体的对华边境政策便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1876年3月15日,由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主持的一个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于5个月后,即8月5日由沙皇最终批准。这份决议总结了1869年以来各部门之间的历次谈判,为1882-1884年的领土区划改革奠定了基础:决议提出建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首府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但该总督区不包括外贝加尔州;解除太平洋港口指挥官(海军军官,符拉迪沃斯托克军事长官)对滨海州的管辖权,将其转隶另一位军事长官(陆军军官)麾下;将滨海州首府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往阿穆尔河河口的哈巴罗夫卡(即后来的哈巴罗夫斯克)。[®]因此,这个州的民事政府也由海军转给了陆军。[®]

值得赘述的是,这些改革计划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取得军事胜利并由此与中国之间形成了从帕米尔高原一直延伸到波西耶特湾的漫长边界的结果。新的战略现实唤醒了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他们需要考虑如何协调对边界的管理。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他们被迫就两个相关问题进行政策辩论:哪个部应该被授予哪块领土的管辖权;以及如何划分(如果有的话)领土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历来被委托给海军部管理,但在获得新的领土之后,支持在海军部与战争部之间重新分配管辖权的声音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官员,例如东西伯利亚总督科萨科夫,又呼吁改革,要求未来远东的行政单位应包括外贝加尔地区,以便其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些倡议都有助于确保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最终以建立总督区的方式进行重组,而不是成为一个缺乏独立性的行政单位。

① 总督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在紧急的战略问题上做出决策,而且在重要的国内政治活动中也要做出判断,而无需等待中央政府的确认和协调。因为俄罗斯帝国领土复员辽阔,而通信系统又不发达,这种方式是必要的。但这也致使俄罗斯缺乏全国统一的外交政策。例如,在伊犁危机时期,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赫鲁晓夫(Aleksandr P. Khrushchev)就与考夫曼的政策完全相反,他选择不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② 这次会议提出,"根据塞瓦斯托波尔的先例",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城市地位。

③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10-10об.

对华关系紧张推动领土改革完成(1878-1884年)

虽然沙皇在 1876 年 8 月 5 日批准了大公领导的委员会的决议,但决议 最终只有一部分被执行。部分原因是俄土战争(1877-1878年)以及随后在 伊犁地区(喀什噶尔)出现的对华外交危机。在与滨海州政府相关的 1876 年决议的头两项内容实施之前,就花掉了4年的时间。^①同年,也就是1880 年,七河州的管辖权由突厥斯坦总督转给了西西伯利亚总督,从而把处理俄 罗斯与整个中国西部的边界问题的决策权交到了同一名官员手中。②虽然滨 海州的行政改革在很早以前就被讨论并批准了,但却是因为在与中国边界的 另一端的突发事件才得以实施。1877年,在镇压了苏菲派叛乱以后,清政 府对于自己在《圣彼得堡条约》(即《伊犁条约》)中收回伊犁地区的外交 胜利并不感到满意。他们增加了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加强了对东北地区 的殖民开拓(原文如此),在中俄边境地区新建了很多城市和堡垒,并且将 行政中心转移到这些城市。尽管明白中国在边境沿线的突发举动背后的推手 是英国,但俄国政府却没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因此他们自己在滨海州进行 的改革、七河州管辖权的移交、动员志愿船队(建立于1878年)进行敖德 萨和远东地区之间"环绕世界"(round-the-world)的运输活动,以及其他 一些方便农民向远东迁移的举措,都受到了限制。③

中俄边境局势的急剧恶化促使战争大臣彼得•万诺夫斯基(Petr Vannovskii)于1882年1月4日召开各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创建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单位;让突厥斯坦总督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中亚事务上;将临近中国准噶尔地区的边境地区事务从他的管辖

①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7. л.3об.

② Там же. л.4.

③ 柏林会议(1878 年)上的外交失败激怒了俄罗斯社会。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商业海运援助协会(the Society for Aid for Russian Commercial Sea Transportation)建立了这支志愿船队。根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1882 年,在南乌苏里江地区的俄罗斯人仅有 13696 名农民,但是俄罗斯政府并不想以提供财政支持的方式为农民提供前往远东的交通费用。政府官员的理由是一旦由国库支付运输费用,会使那些在家乡地区耕不好地的懒惰农民志愿前往远东。然而,1880 年代初严峻的军事形势使得政府采取了一项临时措施(1882-1885 年):支付农民向远东移民的旅费。结果,政府所担心的事情确实出现了,"1882-1885 年移民"将成为乌苏里地区长期的社会公害。

范围中剥离出来,创建一个由三个哈萨克民族州——七河地区,塞米巴拉金 斯克和阿克莫林斯克——组成的新总督区来处理该地区事务。尽管在 1876 年以后中俄关系恶化,但这次会议还是对 1876 年创建一个新的阿穆尔河沿 岸行政—军事单位的决议执行不力提出了批评。^①会议指出,由于要同时负 责中亚和中国西部事务,而这两个任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使得突厥斯坦总 督承担了过重的负担。会议发现将中国西部边境地区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 分,由西西伯利亚总督区和突厥斯坦总督区分别管辖会造成很多混乱,并且 指出,1871年的伊犁危机就是这种混乱的典型例子。^②为了纠正这种状况, 会议要求建立一个草原总督区(Steppe governor-generalship),并且将"俄 罗斯本土"的托博尔斯克州和托木斯克州的管辖权转给内务部。^③如果该建 议得以实施,就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外,即建立一个种族 上同质的(非俄罗斯族)总督区:这与加斯福德 20 年前的计划背道而驰, 加斯福德的计划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就是哈萨克人的领地只有与俄罗斯 族地区合并在一个总督区里才能够进行成功的管理。本次会议所期待的领土 改革计划合理地将中俄边境分为三个管辖区——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东西 伯利亚总督区和草原总督区——分别负责俄罗斯与中国东北、蒙古和中国西 部的边境地区事务。 4

在审议过程中,会议显然也考虑了俄军总参谋部亚洲司的一位少将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军方认为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改革是在与英国展开全球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备忘录指出,俄罗斯"完全意外"地通过获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弥补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损失,这也平衡了英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英国并没有对在黑海的胜利感到满意,并已经开始通过波斯湾和阿富汗侵占里海沿岸地区。而此时俄罗斯为了应对英国的举动,也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了中亚地区,特别是在 1865 年征服整个锡尔河盆地。俄

⁽¹⁾ РГИА. ф.1284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общих дел МВД), оп.60, д.47, дл.2-3об.

② Там же. лл.5-6об.要想穿越构成俄罗斯和中国西部边界的天山山脉,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塔城和伊宁。塔城属于西西伯利亚总督区,而伊宁则属于突厥斯坦总督区。(见图2)

③ Там же. лл.7-7об., 8об.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分离出去之后,草原总督区的人口大约还有170万。

④ РГИА. ф.1284. оп.60. д.47. лл.7об.-8.

罗斯声称,最近与土耳其的战争(1877-1878年)实际上是俄罗斯与英国之 间的战争,俄罗斯控制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部盆地的结果,对英国在阿富汗 的基地形成了威胁,能够阻止英国从印度向地中海调动军队,这就削弱了英 国在柏林会议上提出傲慢诉求的能力。柏林会议后, 西欧人试图引诱中国政 府采取反俄行动,他们以俄罗斯在金融和外交方面的缺陷说服中国。俄罗斯 根本没有为同中国开战做好准备,根据这位少将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在亚洲 地区的中俄边界沿线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的组织尚不能胜任。 ① 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与土耳其的战争使俄罗斯的高级指挥官清楚地认识到阿穆尔河沿岸 地区在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全球竞争中的价值。在一次穿越中国吉林省的研究 旅行之后,俄罗斯总参谋部的雅科夫 • 巴拉巴什(Iakov Barabash)上校指 出: "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大国,英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和 责任,而俄罗斯能够负担的,只有集中力量建设一支太平洋舰队。利用取得 拥有很多良港的乌苏里地区的机会,获得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很多地方, 俄罗斯都无力与英国竞争,但"从阿穆尔河也可以给欧洲造成严重的损害"。 俄罗斯在太平洋方面的努力将会提升帝国"在欧洲的政治力量"。在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罗斯需要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可能爆发的另 一场战争做好准备;未来在欧洲爆发每一场战争时几乎也同样如此。

万诺夫斯基所组织的会议决定取消西西伯利亚总督区,而于同年 5 月建立草原总督区。然而,在远东地区的改革开始之前,对华冲突就爆发了。1883 年春,吉林将军从珲春派遣军队佯装自己对波西耶特湾附近的萨维罗夫卡的朝鲜人村拥有主权,从而穿越边境到达这个海湾(见图 1)。清军很容易便围困了萨维罗夫卡的俄国军营,为了解围,东西伯利亚总督德米特里•阿努钦(Dmitrii G. Anuchin)别无选择,只有派遣符拉迪沃斯托克唯一的军队南下,结果使得港口无人防守。对于俄国人来说,幸运的是,由于春季解冻,使得阿努钦能够派遣援军,并且迫使中国人撤退。^③中国没有再次向东进攻,仅仅是由于这段时间在其南部省份爆发了另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中法战争(1884 年 7 月-1885 年 6 月)。但是中国的进攻改变了阿努钦的看法,

① РГИА. ф.1284. оп.60. д.47.лл.10-14.

②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54. лл.1-3.

③ РГИА. ф.733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оп.194. д.343. лл.64-64об.

他要求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增加军队,特别是要防卫波西耶特湾周围地区。 他提议再召开一次各部联席会议讨论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军事和政治问题。

阿努钦特别关注吉林省的边境军事指挥官吴大澄(1835-1902年)声望的提高,他在政府层面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一省军事长官的范围。为了确保"一个繁荣的满洲",吴将军想要的不仅仅是萨维罗夫卡村,而是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波西耶特地区。正如巴拉巴什在前一年提交的报告中所说的,阿努钦表示,"在满洲地区,旧式的军事管理体系(八旗体系)已经被文官(管理体系)所取代",而且在所有重要职位上,"无知、愚蠢、懒惰、贪婪的满族官员"已经被那些"能干又充满活力"的汉族官员所取代。结果,困扰中俄边境中国一侧的长期混乱最终得以解决。还有其他令人不安的事态也在发展。阿努钦强调,清政府不仅取消了对汉人向东北地区殖民的禁令,而且开始积极推动此事,特别注意推动向"乌苏里江边境附近的无主之地"移民。一支新的装备速射步枪的正规军已经驻扎在东北地区,而且还在吉林建立了一个年产7000支速射步枪的兵工厂。阿努钦声称,目前"至少有45个常规步兵营和骑兵营驻扎在吉林城和三姓。"。

1880 年代,在吴将军的推动下,阿努钦所描述的行政与军事改革得以执行。这些改革措施有时会遇到吉林将军铭安(1877-1883 年在任)的反对,铭安倾向于认为,伊犁危机已经解决,没有必要再加强东北边境沿线的防御力量了。而吉林位于东北地区腹地,八旗系统很多官员的职位得到了保留,民政管理很落后。1850 年代,中央政府调动吉林八旗军队前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该地区的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土匪横行乡里,赌博盛行。吴大澄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同时阿努钦注意到,吴大澄改革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针对八旗体系,很多八旗官员不懂汉语。(值得注意的是,吴将军试图改变八旗军队世袭制组织原则的努力与俄罗斯试图以类似的方法推动哥萨克改革差不多同时发生。)随着新的文职政府的建立,吴大澄又设立了武器和移民部门,由吉林将军管辖,在吉林省生产现代化武

① 三姓, 地名, 清朝时期东北地区重镇, 今佳木斯市依兰县。——译者注

² РГИА. ф.733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оп.194. д.343. лл.65-65об.

器(在此之前,吉林的防御完全依赖从其他地区运输过来的武器),并推动农民前往本省边境地区定居。[©]在俄国人担忧地看着这一切并且无力地进行谴责时,在 1880年,吉林的一份官方报告这样写道:

1861 年划界剥夺了我们一千平方英里的广阔领土。绥芬河、兴凯湖和满洲故地现在都属于我们的敌人……只有东部三个堡垒(三姓、宁古塔和珲春)仍然保持完好,但周围土地上几乎没有人定居,人口少到甚至我们失去他们都不会感到遗憾……现在俄罗斯商人已经建起了一个大城市,人们从路上和海上聚集到那里,西方人的船舶和军舰都在珲春东部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停泊。俄罗斯人建起了木制的堡垒和兵营,集中了大量的士兵,而且他们的防御情况始终秘而不宣。但是当他们进行操练演习时,隆隆的枪炮声在几十公里之外都可以听到,当地居民说那里有两万名士兵。^②

根据阿努钦的要求,1883 年 5-6 月再次召开了会议,计划建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与 1876 年决议不同,这次将外贝加尔州包括在内了。会议重申了前东西伯利亚总督科萨科夫关于(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包括外贝加尔州的观点:要将经济重心放在阿穆尔河水系,以及需要在一位官员统一领导下,整合针对蒙古和中国的边境政策。[®]在一份不能确定作者身份的备忘录中我们看到,1880 年的领土区划改革,也就是将七河地区的管辖权从突厥斯坦总督区转给西西伯利亚总督区的那次改革,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领土区划改革的模板。[®]与会者认为,从楚科奇延伸到波西耶特的滨海州太大了,而且 1880 年将其首府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到哈巴罗夫卡并没有改善南乌苏里地区的军事安全形势。因此,他们计划将滨海州分成三个部分:北部的勘察加地区、科曼多尔群岛和萨哈林岛将形成一个新的州,南部乌苏里江地区

① 佟冬主編:《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256-299页。另见[日] 塚瀬進:「中国東北統治の変容――1860~80年代の吉林を中心に」北海道大学出版会『スラブ・ユーラシァ叢書4 近代東北アジアの誕生――跨境史への試み』、2008年12月、278-282頁。

② [日]塚瀬進:「中国東北統治の変容――1860~80年代の吉林を中心に」、281頁。

③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12об.-16.

④ РГИА. ф.1604. оп.1. д.767. л.4.会议提议修改西伯利亚法典, 赋予东西伯利亚各省省长更多的独立于总督的权限。(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18об.-19об.).

也将成为一个州。其余的领土——大约与阿穆尔河下游盆地差不多大——并入现在的阿穆尔州,因此整个阿穆尔河盆地就被归入同一个州,命名为阿穆尔州。^①由于新的阿穆尔州的管辖范围向东延伸,与会者提议这个州的首府应从布拉戈维申斯克迁往哈巴罗夫卡。^②

与清帝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迫使俄罗斯政府按照 1882 年万诺夫斯基会议决议加快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领土改革。然而,1883 年春,波西耶特湾周围出现了一系列冲突。应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的要求,1883 年 5-6 月召开了决定性的也是最后的各部联席会议。令阿努钦失望的是,这次会议不仅决定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从东西伯利亚总督区分离出来,而且还决定将外贝加尔州也划给它。军事冲突使得俄罗斯政府各部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的尔虞我诈被暂时搁置,战争部以势不可挡的主动性实施了领土改革的决议。如果没有前面 20 年的充分准备,改革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 20 年让整个官僚体系能够充分思考应该如何管理从《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获得的帝国领土,并且最终决定将其与一个老西伯利亚地区——外贝加尔州——合并在一起。通过这些讨论,俄罗斯也形成了新的"远东"概念。

阿努钦与外贝加尔问题

东西伯利亚总督德米特里·阿努钦(1879-1885年)与他的前任们观点不同,他的前任都恳切地要求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从东西伯利亚分离出去,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分歧只是要不要将外贝加尔地区划给它,但阿努钦所反对的正是这种分离本身。他在1880-1881年向沙皇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提出,他反对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分离出去,仅仅建议将滨海州的首府从哈巴罗夫卡迁到南乌苏里地区。这项建议背后的战略逻辑是阿努钦的理念,即在与中国的战争中,俄罗斯在南乌苏里地区只能维持防守的态势,任何真正意义上

① РГИА. ф.1149. on.10. д.60. лл.16-18, и ф.1604. on.1. д.767. л.4. 然而,最终结果是只有第一部分领土(勘察加、科曼多尔群岛和萨哈林岛)被分离出来了。

② 因此,根据这项计划,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而不是哈巴罗夫卡成为总督区的首府,但它将失去州首府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因为阿穆尔州最后并没有向东扩展,哈巴罗夫卡成为总督区的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仍为阿穆尔州首府。

的进攻性行动都必须以北京为目标,只能从外贝加尔地区发动,而且只能借 助从俄罗斯欧洲部分调动的资源。①在出席 1882 年 1 月 4 日万诺夫斯基组织 的会议时,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松花江(在哈巴罗夫斯克上游汇入阿穆尔 河)河口到北京的距离是2017公里,而从贝加尔地区的中俄边境到北京的 距离是 1237 公里。此外,乌苏里地区到北京之间既有山脉又有活跃的中国 移民聚居地,而贝加尔地区到北京之间是一片荒漠,人烟稀少而且多是同情 俄罗斯的蒙古人。根据这种战略观点,阿努钦总结道,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 东西伯利亚应该由一个军事指挥官负责。[©]在阿努钦的观点中可以看到很明 显的南乌苏里情结,他认为在南乌苏里地区,"我们的力量永远都比中国弱, 因为吉林和奉天省是现在这个王朝的摇篮。" [®]阿努钦补充说,唯一能够确 保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忠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办法,就是将其置于东西伯利亚 总督区的管理之下。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只有通过伊尔库茨克才能与诺夫哥罗 德和莫斯科建立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被切断,该地区就将落到来自德国、美 国、中国和日本的商人和渔民手中。在鄂霍次克和堪察加地区与雅库茨克之 间的邮政联系被废除之后, 当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 当地人对于在旧金 山发生的事情比对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近期出现的由俄罗斯志愿 船队开展的"环绕世界"运输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利用万诺夫斯基会议中将外贝加尔归属东西伯利亚总督管辖的妥协式的决议,阿努钦坚持阿穆尔河沿岸和外贝加尔需要统一在一起,以便达到他最希望的结果,即避免阿穆尔地区分离出去。但在 1883 年,大臣委员会也决定将外贝加尔州并入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阿努钦意识到再反对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从东西伯利亚分离出去已经毫无意义,于是,他在 1883 年 10 月给沙皇的信中转而将全部的努力集中到至少阻止将外贝加尔州划给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根据阿努钦的看法,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不会成为一块统一的领土,因为外贝加尔(赤塔)联结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

① РГИА. ф.1683. оп.1. д.20. л.142об.

② РГИА. ф.1263. оп.1. д.4235. лл.394об.-95об., 398-99об., 400-401.事实上, 在伊犁危机期间, 俄罗斯总参谋部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即在对华战争中, 俄罗斯应该在哪里发动反击, 是从蒙古还是从东北? 参见Alex Marshall,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and Asia*, 1800–1917, London: Routledge, 2006, p.75.

③ РГИА. ф.1263. оп.1. д.4235. л.403.

戈维申斯克的道路每年会有两次中断。在对华战争期间,外贝加尔只能听从伊尔库茨克的指挥。作为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一部分,外贝加尔只会成为来自德国、美国、中国和日本商人和渔民的殖民地市场。^①此外,新的阿穆尔河沿岸总督也将被管理流亡者的大量工作所压垮。阿努钦的观点赢得了沙阜的支持,沙阜下令大臣委员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②

1883 年 12 月,外贝加尔州的军事长官卢卡·伊利亚舍维奇(Luka Il'iashevich) 断然否定了阿努钦的观点。在俄罗斯帝国, 总督和他属下的军 事长官之间存在对抗关系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因为总督对于下属工作过 分挑剔的干预经常会激怒军事长官。不过,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军事长 官能够这样刻薄甚至可以说侮辱性地批评他的上级。首先, 伊利亚舍维奇讥 讽地说, 本来总督从来没有关心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道路联系季节性中断 的问题,结果为了不想让它的行政管理权从东西伯利亚分离出去,却突然对 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之间的道路联系中断如此敏感。目前,因为管理流 亡者的责任过分集中地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东西伯利亚总督担负的负担过 重。在伊利亚舍维奇看来,鉴于乌苏里和外贝加尔地区在战时毫无疑问将由 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挥,因此讨论俄罗斯人是从乌苏里地区还是从外贝加尔对 中国发动反击其实无关紧要。整个外贝加尔地区有1万名俄军士兵驻扎,而 阿穆尔州的防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继续依赖外贝加尔。尽管阿努钦关于反 击必须从外贝加尔出发的想法有一些合理的基础,伊利亚舍维奇仍然认为这 一行动需要进行精心的准备,以免重演 1839 年瓦西里·彼罗夫斯基(Vasilii Perovskii)的悲剧。那场发生在中亚的"惩罚远征" (punitive expedition) 以在途中损失了一半的兵力而告终。根据伊利亚舍维奇的说法,应该将外贝 加尔交给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尽管信誓 旦旦地说外贝加尔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但直到最后其实什么 也没有做。③

伊利亚舍维奇继续论述道:虽然阿穆尔伯爵耗资巨大的远征已经过去了 30 年,但阿穆尔地区的人口仅仅达到了 5 万,而且他们还继续要依靠外贝

① РГИА. ф.1263. оп.1. д.4235..лл.386об.-387об.

② РГИА. ф.1683. оп.1. д.20. лл.144-145.

③ Там же. лл.138-139.

加尔提供粮食。这块土地最近才刚刚开始耕种,畜牧业则完全没有。当航运 季节开始后,外贝加尔地区的商人会前往阿穆尔地区,为该地区提供所有必 要的商品,并购买外国制造的商品(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环绕世界"的商 品),然后在8月返回外贝加尔。这些商品到不了像伊尔库茨克那么远的地 方,他们比托木斯克提供的商品贵多了。换句话说,远在伊尔库茨克的人对 外贝加尔"没有任何兴趣"。此外,将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两个地区合 并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也将促使包括阿穆尔河、石勒喀河和音果达河建成一 个完整的运输系统。根据伊利亚舍维奇的观点,新总督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便是使俄罗斯通过"环绕世界"运送过来的商品在阿穆尔河沿岸市场的份额 最大化,以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 ①因此,阿努钦和伊利亚舍维奇不仅代 表着俄罗斯对远东地区两种相反的看法,而且也代表着对于全球化对该地区 会产生怎样影响的两种明显不同的预期。 阿努钦认为,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需 要伊尔库茨克的支援,否则就会变成一个外国商人和渔民的殖民地。而伊利 亚舍维奇则认定,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外贝加尔而不是东西伯利亚在支援阿 穆尔河沿岸地区, 而且他似乎对于这个新建立的包括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 岸的广大地区很有信心,他认为这一地区在其总督的保护下,能够勇敢且成 功地参与世界市场。在1884年2月11日举行的讨论阿穆尔问题的特别会议 上, 阿努钦提出的将外贝加尔州继续归属东西伯利亚总督管辖的要求遭到了 否决。一位参加会议的海军中将指出, 阿努钦只是在重复阿穆尔伯爵穆拉维 约夫几十年前的计划。②

1884年6月16日,沙皇批准设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总督区,因为矿产(特别是金矿)开采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东西伯利亚总督手里。[®]但另一方面,这个新总督也比他那些受到《西伯利亚法典》

① РГИА. ф.1683. on.1. д.20. лл.лл.139-141.也许是由于和阿努钦的冲突,伊利亚舍维奇被解除了外贝加尔军事长官的职务,由雅科夫•巴拉巴什接任。

② РГИА. ф.1149. оп.10. д.60. лл.41-43.

③ 东西伯利亚矿区并没有进行分割,因为大部分金矿都属于皇室(并非国家资产)。而且阿努钦坚持反对建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利用沙皇的物质欲望。因此,虽然新的总督区建立起来了,但东西伯利亚总督继续负责远东金矿的开采。

桎梏的西伯利亚同事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在俄罗斯帝国行政机构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个地区的第一任总督通常都扮演着创始人的角色,但他前任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总督区的体制框架和行为方式。首任阿穆尔河沿岸总督A•N•科尔夫男爵也不例外。他拒绝了最早以布拉戈维申斯克为首府的设想,将首府设在哈巴罗夫卡,因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离中国边境太近而离南乌苏里地区太远,这让他很不舒服。

几乎从《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日、帝国获得大量新领土开始,俄罗斯的军事和民政官员便开始寻找如何在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行政区划重构的背景下管理新领土的最优方案。改革最初的火花可能是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和他的盟友弗拉基米尔·布特科夫的宫廷密谋,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从奥伦堡延伸到中亚的巨型总督区,但造成审议过程长达数十年的真正原因,是新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了许多看上去不可调和的问题。《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与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一起使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一条非常漫长的边境线,因而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任何行政和领土改革都不得不在这个背景下进行讨论。在拒绝了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和布特科夫关于建立巨型总督区的建议之后,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去处理由于突厥斯坦总督K·P·冯·考夫曼独断的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他的政策引发了伊犁危机。1882年草原总督区的建立解除了突厥斯坦总督对于毗邻中国边境地区的领土的管辖权,这使得将(中俄)边境地区划分给草原总督、东西伯利亚总督和未来的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进行管辖成为可能。

随着俄罗斯扩张的步伐向东迈进,各总督所辖的领土向东移动也就不可避免了。此外,这场伟大改革也使得一些地区自身地位的改变成为可能,主要是奥伦堡总督和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的一些地区,从"非常规"治理状态转为内务部管辖下的常规治理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对于一些处于中间地位的地区,例如外贝加尔、叶尼塞、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等地的归属展开了辩论。辩论涉及两个附带的问题:一个是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转为常规治理地区,就将造就一个由同质民族(哈萨克人)所组成的草原总督区,这与俄罗斯帝国民族政策的一般原则相矛盾。另一个是外贝加尔的归属将影响到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生存能力。草原总督区和阿穆尔河沿岸

总督区的建立,是采用非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即在哈萨克草原上建立一个由同质民族组成的大区,而将一个老西伯利亚(Old Siberian)地区交给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因此,只有在 1882-1884 年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区划全面改革的情况下,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俄罗斯政府才能够建立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

这些行政与领土改革是俄罗斯帝国与清帝国在阿穆尔河流域和中国东 北地区争夺霸权而展开的大规模竞争的组成部分。在1858-1860年沿阿穆尔 河和乌苏里江划分满洲(东北地区)之后,两大帝国竞相在控制的满洲领土 内推动军事、经济和行政力量的发展。在表现方面,双方都坚信对方在殖民 方面更加勤奋, 武器装备更加精良, 对于未来战争的准备更加充分。俄罗斯 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成了该地区快速发展背后的驱动力。在 19 世纪中叶,只 有少数满族人和其他当地人生活在这里。 但半个世纪之后,这一地区已经有 了足够的交通、通信和农业资源,可以进行"零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 了。^①到了 1880 年代初,俄国军队已经在认真准备与清帝国一战,有关远东 地区领土区划改革的所有犹豫都被一扫而空。但如果将军事动机作为改革的 原因,并以此认为这就证明俄罗斯扩张主义者倾向于向东扩张,那就太过于 草率了。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始终认为乌苏里地区是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 夫冒险主义的幸运产物。而且他们认定,一旦清帝国入侵乌苏里地区,俄国 根本没有机会获胜。正是由于这种悲观主义的存在,才使得俄军制定了一个 伪全面战争的计划,计划军队由外贝加尔向北京推进。◎这并不是一种毫无 意义的反事实想象,俄罗斯与清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关系会怎样发展,确实主 要掌握在清帝国手中,它已经从1840-1860年间所遭到的损害中恢复过来, 在 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并没有显得很不像样。

即便在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建立之后,外贝加尔的"归属"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总督区的出现并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南乌苏里情结。

① John W. Steinberg et al., eds.,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Zero*, 2 vols, Leiden: BRILL, 2005-2007.

② 我们在帝国的西部省份也能找到同样的心理状态。因为"波兰情结"的存在,政府反波兰的政策变得非常严苛:很多人都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获得波兰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是特定情势下未经充分准备的幸运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在与当地的"波兰元素"的竞争中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1887 年,陆军和总督都担忧地表示,清帝国继续在中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远东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清帝国。^①不出意料的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南乌苏里地区,使得"被遗弃的鄂霍茨克"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但这些问题就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进行讨论了。

(封帅 译)

[Abstract] Around 1860, with conclusion of the Aigun Treaty and the Beijing Treaty, Russia obtained vast new territories of Priamur and trans-Ussuri reg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began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amur Governor-Generalship in the Far East region. However, it is until 1884 that the Priamur Governor-Generalship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20-year delay and discussion is not only because of low efficiency of the bureaucracy but also due to the fact that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or-Generalship dealt with overall adjustment of Russian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Russia. As a result, Russian power in Asia reconfigured and various complex, seemingly irreconcilabl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appeared. Russian expansion in the F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n immensely long border with China. So any administrative and territorial reforms in Priamur had to be discussed within this context. Russian officials then had to consider comprehensively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Finally, after debates and efforts in over 20 years, Russi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break through a number of old traditions and carry on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reform within its Asian territory. As a part of the reform, the Priamur Governor-Generalship was created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siatic Russia was achieved.

[Key Words] the Priamur Governor-Generalship,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Power Reconfiguration

① 佟冬的研究也证实当时的俄国人确实感到不安,虽然有些夸张,但确有事实依据。(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第266页。)

【Аннотация 】 До и после 1860 г. с подписанием «Айгу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и «Пек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Россия получила новые обшир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бассейнах рек Амур и Уссу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а о создании нов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но только в 1884 г. было создан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 в Приамурье. 20 лет прошли в обсуждениях и разрешении проволочек не только из-за не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бюрократии, но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это был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что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а связана со всесторонне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делений всей азиат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что неизбежно привело бы к реконфигураци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зии, и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вызвало бы множество сложных и трудно разрешимых проблем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Расшир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ивело к наличию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ротяжённой границы, все реформ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деления всеобъемлюшей Приамурья должны проходит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это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должно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реформ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дел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после 20 лет дискусс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наконец, решило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многих старых традиций, решило провест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ую реформу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деления всей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как часть реформы создало в 1884 г. как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 в Приамурье, завершив реконфигурацию баланса сил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з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иамур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 реформ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деления, реконфигурация баланса сил

(责任编辑 韩冬涛)

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

曹 群**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周边海权发展战略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在相隔甚远的太平洋、波罗的海、黑海三个海域与不同的对手为敌。俄国的应对方略是,在保持强大的陆军的同时,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在全球抢夺势力范围,从而开始在三大海域建设独立的作战舰队。然而,俄国经济基础薄弱,根本无力支撑其全球殖民扩张所必需的海上力量发展计划。同时,在内部派系斗争因素的影响下,俄国缺乏一贯和一致的策略,且在威胁预判和战略谋划上存在重大失误。在当时,制海权对于一场战争的胜败至关重要,俄国的海权战略与其亚太战略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俄关系的发展走向及冲突结局。

【**关键词**】日俄战争 俄国 海权战略 远东问题 亚太战略 【中**图分类号**】D83/8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02 -0151-(27)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争斗中,远东地区的中国东北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参与激烈利益争夺的不仅有位于该地区的俄国和日本,其他列强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也因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以不同方式加入进来,从而引发了一场纷繁复杂的远东多国大博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 曹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弈。当时,制海权对于战争胜败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使得制定适合俄国国情的海权战略成为重中之重。

从日俄战争结束至今,学术界对于日俄战争的研究一直热度颇高,但对当时俄国的海权战略却关注不多,对于日俄战争前俄国海权战略的研究著述则更少。关于日俄战争中的海战部分,1908 年在俄国海军总参谋部辖下成立了编写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宏大的写作大纲(经 10 年仍未能完成此大纲),从1912 年至 1918 年,共出版了7卷叙述性的著作以及9卷档案资料。①也许是由于不少参战的海军将官当时仍然在世(包括编写委员会成员),编写委员会比较倾向于尽量避免细节描述,在分析时也难免带有"同情自身惨败"的偏见。

苏联海洋军事专家彼得罗夫(М.А.Петров)在 1926 年出版的《俄国对海上世界大战的准备》(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虽然面世较早,但对于一战前俄国海权战略而言却是一部高屋建瓴的著作。该书较为全面地分析论述了自 19 世纪 8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海军战略的发展变化,对研究日俄战争前俄国海权战略尤有价值的是前三章。彼得罗夫颇具"大局观"视野,他"点面结合"、详略得当地评述了俄国在不同海域的海军战略发展的自相矛盾和相互影响,并指明了俄国在各战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不协调。彼得罗夫在军事学上的造诣令后世学者难以企及,该书的许多战略评析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且影响深远,至今仍为研究这一时期俄国海军战略的学者所青睐。但正如彼得罗夫在"编者按"中所说,"关于经济原因的研究并未纳入本研究"^②,该书对于影响俄国海权战略的更广泛和更深层的一些方面(如经济、政治、外交以及高层派系私斗等)发掘不够深——这些方面的因素与一国海权战略的制定和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非常值得进行综合研究。

在彼得罗夫的著作之后,还有一些关于日俄战争海权战略方面的著述,

① Рабо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ммиссии по описанию действий флота в войну 1904-1905 при Морском Генеральном штаб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троград. 1912-1918.

② Петров М.А.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6. С.7.

比如贝科夫 (Быков П. Д) 的《日俄战争 1904-1905 年——海上作战》^①和 佐洛塔列夫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与科兹洛夫 (Козлов И.А) 合著的《日俄战争 1904-1905 年:海上斗争》^②,但都存在"大局观"视野不够以及肤浅和简略的问题。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方面也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俄国海军 历史的著述,其中一些很有参考价值,例如《俄国海军三百年:19 世纪-20 世纪初》^③。

近年来,可以称得上"继承"了彼得罗夫"大局观"视野的研究著述,乃是独立学者尼古拉斯•帕帕斯垂提加基斯(Nicholas Papastratigakis)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海军力量:对日俄战争的军事战略和准备》(Russian 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Build-Up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该书的观点与彼得罗夫的见解基本相同,其一开篇便进行了明白表述:"……这些年,俄国外交政策将极重的砝码压在远东事务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战区的任务和利益。这尤其牵涉到那些肩负重任的陆海将军,他们一直计划着有效地防卫俄罗斯位于中欧、近东、中亚或远东的广阔边境的每寸国土。换言之,远离太平洋的海军当权者们也必须顾及其他两个主要海军战区也就是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防卫措施。"[®]该书对于本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彼得罗夫的著作相比较,其研究的重心更加突出——以日俄战争前俄国的海权战略为主;文献资料也更加丰富——对于俄国在此一时间段与海权战略有关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皆有所涉及。对于笔者的研究,不论在材料方面,还是在视野高度方面,该书都有极大助益。

国内对于日俄战争前俄国海权战略的专门研究较少。鉴于俄国海权战略 失误是导致俄国败于日本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非常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

① Быков П.Д.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М., 1942.

②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Козлов И.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Борьба на море. М., 1990.

③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Козлов И.А. Три столе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АСТ; СПб.: Полигон, 2004.

⁽⁴⁾ Nicholas Papastratigakis, Russian 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Build-Up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11.

⑤ Ibid, p.1.

二、俄国周边海权之困境

俄国自彼得大帝时代起便一直积极地寻求和攫取通往世界大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但却存在着很多障碍,令其很难取得并保有周边海域的制海权,以通往世界大洋。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周边地理、气候、政治和军事四大因素的制约影响。

俄国周边有四大海洋区域——波罗的海、黑海、日本海、北冰洋。然而,俄国在这四大区域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与世界大洋系统连通。在北冰洋区域,濒临此区域的俄国领土气候极端恶劣,且海岸线离俄国的人口和工业中心过远,俄国无法在此找到进入世界大洋系统的通路。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拥有其东南海岸线,但是同样由于气候的原因,只有南部海域全年不冰封而能通航,且俄国在此唯一的海军基地利耶帕亚^①与德国边界太近而极易遭到德军的封锁。在黑海区域,由于黑海是通过多国公约限制下的黑海海峡^②而与地中海相连,俄国军舰想冲入地中海阻力很大,极易遭到英国海军的包围拦截。在远东的日本海区域,由于俄国的远东部分离其统治中心过远,同时日本海大半由日本的各个岛屿以及朝鲜海峡所环绕,俄国舰队在地缘政治条件限制下很难在此自由航行。虽然 1898 年俄国在中国黄海获得了一个通往太平洋的不冻港旅顺,但旅顺与海参崴类似,二者都离俄国中心过远,且

① 此处采用今名,该地位于今拉脱维亚西南部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语称其为 "Liepaja"。1795-1918年,该地属沙皇俄国,当时其俄语名称为利巴瓦(Либава)。

② 黑海海峡(亦称土耳其海峡)是土耳其境内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以及它们之间的马尔马拉海的总称,是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唯一的交通水道和战略要地。18 世纪后期,沙俄发动对土战争,侵占了黑海北岸大片领土并迫使土耳其于 1774 年 7 月 21 日签订了《楚库克一凯那尔吉和约》,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行海峡的权利。1833 年,俄土两国签订了《温卡尔一伊斯凯莱西条约》,沙俄进一步获得了该海峡只对沙俄一国军舰开放的特权。此后直至 1840 年间,该海峡实际上处于沙俄控制之下,但《温卡尔一伊斯凯莱西条约》缔结后,俄、英对海峡的争夺愈益加剧。1841 年 7月13 日,英、法、奥、普、俄、土 6 国签订了《伦敦海峡公约》,这是对海峡制度作国际规定的第一个多边条约,在实际上废除了沙俄的特权。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1856 年的《巴黎和约》重申了1841 年《伦敦海峡公约》的原则。1871 年的《伦敦海峡公约》再次确认黑海海峡对外国军舰不开放的原则,1878 年的柏林会议又再次确认了《巴黎和约》和 1871 年《伦敦海峡公约》。从此直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俄国从未放弃重获在黑海海峡的特权的企图,但一直未能如愿。

自身军工设施落后。^①

俄国在其周边四大海域中的三大海域(除北冰洋外)有着不同的对手, 而且这三大海域又各自分隔且相距甚远,这便导致三大区域的军队互援基本 不可能做到。在波罗的海与太平洋之间的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海岸沿线,俄 国并不拥有增援据点,这便使得俄国舰队由波罗的海驶至太平洋的路途非常 不安全。虽然在理论上俄国舰队可以自由地沿北冰洋远航至远东, 但是这条 航线成为可能的前提是拥有大量先进的破冰船, 所以这条航线在日俄冲突的 那个时代对于俄国来说不具任何实际意义。②地缘政治军事因素决定了俄国 在理想状态下必须在三大区域都拥有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然而实际上俄国 的财政状况无法支撑三大区域的海军力量同时同等发展。在1895-1904年期 间,俄国在三大区域都遭遇了严重危机:它需要在波罗的海对抗德国,也需 要在黑海应付英国强大的地中海舰队,同时还需要在远东防备日本。军事需 求和经济不足的矛盾导致俄国必须在三大区域中适时调整优先发展地区,而 选择任一区域作为优先发展地区自然便会"抢走"其他区域力量发展所需的 资源[®]。于是,俄国所面临的"三难"情况是,当俄国选择优先发展一个区 域时,俄国在另外两个区域的对手便可能趁机改变与其的力量对比。在力量 对比变得不利于俄国的区域,俄国将面临艰难抉择,或者选择退缩,与对手 暂时妥协,或者选择硬顶而被迫迎接一场在军事准备上处于弱势的战争。

三、俄国应对困境之战略计划与实施成效

(一) 三大区域的战略使命和海军发展计划

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俄国便一直梦想跻身欧洲海上强国前三名。为此,它实施了坚决有力的海军扩建计划,以期成为陆海并强的大国。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的海军建设战略可以采用以下两种当时现成的理论:一种理论是

①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О.Р. Айрапетов, М., Три квадрата, 2004. С.116-117.

② Петров М.А.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6. С. 8.

З Там же.

以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观点为代表的"蓝海学派"(Blue Water School),着重强调海军的功能首先是取得制海权——有能力发动进攻将敌方的舰队彻底歼灭,之后转向消灭敌方的商船,然后监督中立商船以及建立对敌方海岸线的封锁。要想实现马汉理论中的制海权,便必须使舰队大量配备拥有火力强大、射程远、射速快、装甲厚和航行性能优秀的战列舰。^①另一种理论以法国的"青年学派"(Jeune Ecole)的观点为代表。该理论出于节约开支^②的考虑,并不像马汉那样强调战列舰的作用,而比较着重于建造众多的鱼雷舰进行防御战。"青年学派"的这种防御战略得以成功实现的条件是必须配备机动灵活的沿岸陆上防御系统——大量的沿岸监测据点、广泛的电报联络网、坚固的防御基地以及能够机动调往所需地点的陆军部队和海军舰队。^③

虽然"蓝海学派"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末期已然肇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强国采纳其理论,"着手建造强大而昂贵的战列舰舰队",但由于俄国在经济上落后于其他列强,因而导致俄国海军不得不节省开支,"追求一种混合战略",为保颜面而宣称"兼容以上两种战略理论的基本原则"。[®]亚历山大三世在位之时,俄国与日本尚未在远东发生冲突,因而并未将太平洋战区列为重点。尼古拉二世继位之时,为了谋求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俄国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主导了"干涉还辽",日俄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

在远东区域,俄国决策层当然非常清楚必须谋划应对日本的复仇。据此,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了战略分析,并逐步取得了针对远东情势的"海权论"共识:"主要是因为俄国陆军被牵制于欧洲,在此地区(远东)的地面部队甚至迟至1904年仍然弱于日本。尽管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但该铁路运输能力在战争爆发前依然严重不足。因而,俄国从欧洲迅速而大规模地

① P.Pare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p.444-477.

② 当时,法国的财政收入无法同时满足建立足以抵御德国的强大陆军以及足以抗衡英国的强大海军的需求。

③ E.M.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446-454.

④ Nicholas Papastratigakis, Russian 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Build-Up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268-269.

调集陆军增援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乃是一个岛国,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登陆和供给依赖于掌握制海权。如果俄国剥夺日本的制海权,那么俄国便将获得战争的胜利,甚至无须动用其陆军。或者,为了给俄国陆军争取时间以最终部署足够的增援部队,海军应能延迟或至少限制日本人在某些地区登陆。因此,海军力量是支撑俄国远东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尼古拉二世强烈的海军至上主义信念,以及蓝海学派在俄国逐渐增强的影响力,都加强了赋予海军在保卫俄国远东利益上关键角色的认识。"^①

客观来讲,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制海权是应对日本报复的不错的战略,但这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俄国正在进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这也需要大量资金。如果仅仅只是这两项,那么俄国疲软的经济也能勉强应付。可是,俄国不仅在远东有敌国,它在西线的压力更加沉重——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也需要大量资金。更严重的是,对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的战略规划,俄国高层长期存在分歧而不能统一,导致该两区域海军力量发展缺乏系统的连贯性。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的海军发展战略失策,不仅造成了本地区的严重隐患,同时也消耗了俄国有限的资金,影响了远东海军力量的发展。

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虽然在 1881 年便确定了与德国进行造船竞赛以取得制海权的战略决策[®],但是由于长期的经费短缺以及此后在远东的投入越来越多,波罗的海舰队并未能按照原有计划发展成一支能够与德国舰队相匹敌的海上力量,并且逐渐放弃了与德国争夺制海权的目标。不过,正当太平洋舰队扩建计划即将完成之时,俄国决策层逐渐重新回到与德国进行海上竞争的老路。比如,在1902-1903 年间,海军少将阿巴扎(A.A.A6a3a)(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成员之一)曾提议在波罗的海沿岸采取"青年学派"的防御战策略,同时也提议应尽可能快地建成该地区的战列舰舰队。[®]按照彼得罗夫的说法,这一战略转向"既不符合政治局势,也不适应战略需求(在与日

① Nicholas Papastratigakis, Russian 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Build-Up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p.269-270.

② Петров М.А.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 С.25-29.

③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2681. Л.25-26.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О. Р. Айрапетов. М., Три квадрата, 2004. С.119.

本开战前集聚所有力量在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最后也与实施计划的现实可能性不相协调。"^①

俄国高层转回与德国争夺波罗的海制海权的战略规划并非日俄战争前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海军部长期战略分歧以及政策摇摆的一种二必选一的结果——波罗的海与远东的海军发展优先权之抉择。鉴于俄国有限的物资基础,这便意味着抉择波罗的海舰队的战略使命,或者是防御性的("青年学派"),或者是主动性的("蓝海学派")。然而事实上,自1881年确定战略决策以后,"波罗的海防御问题往往被归为次要方案",而且当波罗的海舰队主动性出击的思路形成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甚至一直处于"不设防状态"。针对这种情况的"缓解剂是水雷防御"。但此一方案虽经常被提出,却"从来未能完全实施"。同时,这一"未能完全实施"的方案却一直在消耗物资,这实际上"延缓了在远东必需的事前集聚"。^②

在黑海区域,俄国决策层曾有共识:在 1881 年确定的战略决策强调重建黑海舰队,并将其作为发展俄国海军力量的"首要急务","其他海域舰队发展皆位列其后"。[®]虽然黑海舰队的战略使命是积极为"博斯普鲁斯远征"做准备,但这一 1881 年决策中的"首要急务"却经常因波罗的海和远东的问题而一直未能切实落实,"关于黑海舰队使命重要性的主张变动无常,从80 年代至世界大战前皆属常见之事"。[®]就战略决策而言,强调黑海舰队发展重要性的时机并不合适,因为这恰巧在不可避免的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由于近东问题再次凸显而作出决定将大量物资转向黑海,并积极策划攫取黑海海峡。在当时,俄国若要攫取黑海海峡,必然会引发俄土战争,同时在复杂形势下也将引发与欧洲列强的战争。这样便需要制定黑海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协调一致的战略发展规划。但根据目前的史料,两大舰队基本毫无联系,一直各自发展,并没有在做战略规划时进行政治上、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配合。同时,黑海舰队的军舰型号选择并不全面,其战列舰大部分都是针对攻克沿岸炮台与突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建造的,并未考虑到与驱逐舰的战斗。另外,

① Петров М.А.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 С.64.

⁽²⁾ Там же. С.65.

③ Там же. С.68.

⁽⁴⁾ Там же. С.89.

(二)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决策与实施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俄国海权战略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与英国和德国都发生了一些利益冲突,因此俄国政府对于与这两个竞争对手的战争是有战略预测的。俄国高层认为,虽然无法指望俄国舰队能够战胜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但是英国人登陆之后则完全不是俄国庞大陆军的对手,因此英国并不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对俄国而言,德国的威胁是最严峻的,因为德国拥有毫不逊于俄国的陆上力量。俄国政府最恐惧的是,大量德军能够搭乘军舰成功地在俄国陆军的侧翼或者后方登陆。在黑海区域,俄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限制黑海海峡落入敌国控制之下,并且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必须使黑海舰队远远优越于土耳其海军。同时,俄国黑海舰队一直梦想着重新掌控黑海海峡(如此则能解决黑海沿岸俄国领土的防御问题)。为此,自 1885 至 1903 年,俄国一直在计划组织陆、海军协同远征。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难以互援,而俄国所面对的主要敌手又各不相同,因此其战略发展计划是在两大海域发展两支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这是1880-1895年间俄国高层的战略共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来导致俄国惨败的远东区域尚被视为次一级战区。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开始对远东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最为重大的发展便是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但是俄国政府一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防备德国的俄国陆军主力调离西方战线(这点甚至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和战争中也未曾变化)。因此,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增长是非常有限的。真正使得俄国海权不得不又增加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是"三国干涉事件"。在此之后,日本成了俄国的重要潜在敌人,俄国被迫开始重新审视其海权战略。此后,俄国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抵御德国和英国,而且还必须将必要的精力投向远东防备日本,从而俄国开始谋求建设三大海域独立作战舰队。而就俄国的财政状况而言,它无力同时同等地发展三支独立舰队,因此不得不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调整其区域优先发展权的分配。

① Петров М.А.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 С.89-90.

1895 年 10-11 月,针对地中海问题召开了御前会议,会议再次重申加强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的力量,认为在太平洋地区挑选出合适的不冻港之前将优先发展地中海地区的力量。[©]1896 年,在黑海舰队一直为近东"突发事件"处于战备状态的同时,远东局势萌生了潜在的对俄不利因素。基于新获取的关于日本的情报,俄国高层发现它之前的战略计划落后于日本海军发展的速度,日本庞大的海军扩建计划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至 1903 年时,日俄在远东的力量对比将非常不利于俄国,这使得俄国高层必须重新考虑太平洋舰队添造新舰的问题。1898 年,当俄国在远东获得其渴望已久的不冻港旅顺之后,关于加强太平洋舰队的问题终于在俄国政府内部逐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对于东西两线的威胁,俄国政府最后决定必须全力维持在波罗的海的力量平衡,但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之前则须优先满足远东的需求。

1900 年,尼古拉耶夫军事学院的战略演习报告对于俄国在三大区域的海军力量配置作出了客观评判:虽然太平洋舰队已经增添了不少军舰,但是俄国在远东与日本的实力对比仍然处于弱势,并且估计在将来也很难超越日本;同时,随着俄国在远东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力量,俄国在欧洲地区变得越来越弱;如果再不加强欧洲舰队的建设,那么俄国在西方战线将遭遇惨重失利。[®]当俄国专注于经营远东的时候,德国正在中东地区利用巴格达铁路[®]

①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1474. Л.40.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О.Р.Айрапетов. М., Три квадрата, 2004. С.121.

② 1897年12月,海军司令部研究处处长尼杰尔米列尔(А.Г.Фон Нидермиллер)向海军部长官特尔托夫提交了一份报告草案,其中陈述了扩充太平洋舰队的必要性,因为俄国 1895年的海军发展计划并未能考虑到日本超出预计的相应计划。尼杰尔米列尔指出,日本显然正在准备加入远东复杂的列强利益争斗,日本 1896—1905年海军舰船建造计划的物资分配中 1904—1905年所占的部分非常小,大部分都投向 1896—1903年,这便意味着军舰建造计划的大部分任务将在 1903年夏得以完成,而这明显是为了赶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之前日本将能全副武装地面对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纷争。(参见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88.)

③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28-129.

④ 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推行东进政策,将势力伸入中东,力图修建一条联接欧陆的大铁路——自汉堡、柏林经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直抵波斯湾。这条巴格达铁路不仅能使德国控制土耳其,而且严重威胁到高加索、波斯等地区和英属印度,因此遭到了俄国、法国尤其是英国的反对和阻挠。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了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的铁路的租让权,1893年又取得了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1903年又获得了从科尼亚向前延伸,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

试图控制小亚细亚,奥匈也趁机在巴尔干半岛拓展势力,与俄国竞争^①。德国以及奥匈在欧洲对俄利益的威胁,让俄国政府意识到有必要筹建从波罗的海至黑海的联合战区。德国被认为是俄国的首要敌人。1903-1904年尼古拉耶夫军事学院的战略演习报告指出,对德战争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与德国在小亚细亚的利益冲突,也可能是巴格达铁路对俄在波斯湾利益的侵犯。^②

1902 年春,按照尼古拉二世的意见,制定了俄国海军舰船建造计划: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力量与德国波罗的海舰队相等,使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力量与日本舰队相同,使俄国黑海舰队有能力穿过海峡进入地中海,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二者的总体力量与德国所拥有的舰队相等。该计划的实现期限为 21 年(1903-1923),分为三个 7 年完成,其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加强黑海舰队。在该计划中,新造舰船需要经费 15,200 亿卢布,老舰整修和改造需要经费 21,350 亿卢布,同时相应的军港改建以及作战人员增加也需要大约 30,650 亿卢布,实现该计划所需的经费总共约为672,000 亿卢布。^③鉴于当时的俄国国家岁入不过 25,000 亿卢布,该计划的经费难题实际上根本无法解决。^④

此后,经过海军部和财政部的几番商讨,直拖到1903年12月,海军司令部长官罗日斯特文斯基(3.П.Рожественский)关于 1904-1914 年军舰建造计划的报告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不过此后不久爆发的日俄战争破坏了该计划付诸实施。在沙皇最后批准的计划中,依然着重于加强黑海舰队的建设,力图实现"博斯普鲁斯远征",以使俄国军舰能够自由游弋于地中海。关于远东,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远东服役的战列舰预计将于1906年增至10艘。到那时,俄国在远东的舰队将强于日本。在罗日斯特文斯基的报告中,基于以上前提的假设(并未考虑到日本敢于在1906年前挑起战

① 1900 年,奧匈帝国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军事盟约,以防止俄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1902 年,俄国对于"奥罗同盟"予以回应,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军事协定。在 1903 年,俄国政府研究了如何抵御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在黑海沿岸地区可能发起的军事行动。

②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0.

③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2681. Л 25-26; Д. 2480. Л. 263.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1.

④ H.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1881---1917, London: Longman, 1992, p.103.

争),认为俄国在远东是安全的,在 1906 年后并无增加大型战列舰的必要,只需进一步添置布雷舰、炮艇和辅助舰。[®]至于在波罗的海地区可能爆发的对德战争,报告提出应当依靠配有装甲舰的鱼雷舰队,并且承认由于财政不足无法拥有与德国舰队同等数量的战列舰,同时认为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从黑海和远东调派增援舰队。报告虽然承认,对德战争开始后,太平洋舰队调往波罗的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于波罗的海舰队成功调往远东则认为是可行的,并且认为可以在对日战争时起到很大的作用。报告认为,与将波罗的海舰队调往远东相比,更加现实的做法是在地中海区域保留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战列舰,并在黑海舰队突破土耳其海峡之后与其联合,而从地中海区域向波罗的海区域调派增援舰队是不会有许多困难的(报告故意忽视了英国的妨碍,关于这一点将于后文详述)。[®]

综上所述,俄国虽然对于远东越来越关注,但也并没有放弃在其他地区发展势力。首先,坚持在波罗的海地区保留一定的力量以防备德国;此外还曾一度特别关注黑海地区,并妄图实施 "博斯普鲁斯远征"。同时,俄国对于巴尔干也不愿放松,在1902年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对抗奥匈与罗马尼亚的军事互助条约(1900年)。另外,俄国的商船和军舰还出现在了波斯湾(英国在此拥有垄断地位),这引起了英国的担忧,因为英国不愿在波斯湾出现类似租借旅顺口的事件。俄国这种多线进取的战略超出了其国力支撑度,其全球殖民的野心是无法实现的。库罗巴特金对此的评论比较中肯:"我对维特说,在我们沙皇的脑中有着规模宏大的计划。他要为俄国夺得满洲,使朝鲜依附于俄国,还梦想将西藏纳入俄国掌控,同时他还想取得波斯,不仅要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还要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我们大臣基于各地的情势不同而耽搁了沙皇实现他的梦想,并令他越来越失望;他越来越觉得,他是正确的,他比我们更加理解俄国的荣誉和利益。因此,在沙

①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3047. Л.11-12.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3.

皇看来,齐唱颂歌的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那些人比我们这些大臣更加正确

②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3047. Л.14.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3-134.

四、俄国海权战略失策之原因分析

(一) 经济发展与军事计划之间的矛盾

财政大臣维特在俄国政府中拥有很高的地位(类似于首相),他所制定 的长期财政政策对于宏观战略有着很大影响。在日俄战争开始前十年,俄国 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集中干整顿国家财政、加快工业增长、维护卢布的稳定和 保证对外贸易平衡。维特从 1892 年担任财政大臣起,便大力推行发展经济 和工业的政策。维特认为:"俄国必须像一个强国那样发展工业,即使这样 会导致暂时的武力不足。"②正是由于俄国实施这样的财政政策, 陆军部和海 军部这种"不盈利部门"的财政拨款一直受到维特的严格限制和缩减。同时, 按照维特的看法, 在地缘政治上俄国是一个陆上强国, 因此相对而言, 陆军 的财政拨款应当优先于海军。维特认为,俄国巨大的资源应当主要用来发展 陆军,因此未必能够留下足够的资源来发展同陆军旗鼓相当的海军。3当然, 维特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海军一些军官的反对,其中便包括主张优先发展太平 洋海军力量的"太平洋派"海军军官。对于日俄战争而言,太平洋舰队是否 拥有足够的力量取得"制海权"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海军中有不少 人要求加强远东舰队。维特限制海军发展的观点得到了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 的支持。库罗巴特金强烈反对远东海军舰队的继续扩建,他曾说,"俄国目 前依然是个陆上强国,它的主要支柱,当然,是陆上军事力量。" ④

虽然有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的反对,尼古拉二世加强海军的意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军分得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但是,俄国的陆、海军发展何者应当优先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政府内部对此仍大有分歧(沙阜

①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М.Н.Покро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Нижполиграф, 1923. С.36.

② H.Rog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1881---1917, p.104.

③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1728. Л.118.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12.

④ РГИА. Ф.1622. Оп.1. Д.269. Л.90.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25.

亦不能决断一切)。在陆、海军分配俄国贫乏的军事物资问题上,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对现状不满。在 1903 年 3 月,当陆军部申请 1904—1908 年的财政拨款时,总司令部的多布洛罗伊斯基(С.К.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中校报告说:过去 7 年,海军的预算提高了 66%,而同期陆军仅提高了 12%。相对于 1883 年,海军的预算已经增加了两倍。[©]与陆军方面一样,海军方面也对自己得到的财政拨款不满足。海军方面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建成海上强国,所以海军部所强调的是:尽管在 1895 到 1902 年间海军军费预算几近翻倍,但海军部1902 年的预算依然少于陆军部当年预算的三分之一。[©]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俄国的宏观战略存在着两个最关键的矛盾: 其一,俄国长期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对于"非盈利"的军事开支进行了财政紧缩,然而却在这一时期在东西两线(黑海和远东地区)都部署或实施着积极进取的计划,这便造成了经济发展和军事发展何者应该优先的问题。其二,俄国陆军和海军何者应优先发展。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要确定俄国的战略发展方向,究竟是陆上强国还是海上强国。基于俄国的财力,它并无可能二者兼备。然而,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却妄图在维持庞大陆军的同时在东西两线都获得出海口,并且还整合马汉"海权论"和法国"青年学派"的理论,制定出了不适合俄国经济基础的"攻防皆可"的海军建设战略。

令以上矛盾雪上加霜的是,俄国战略决策层还想在全球多线进取。这就需要在波罗的海、黑海和远东同时维持三支强大的、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而这是俄国当时的财政能力根本无法支持的。为此,维特一直力图说服沙皇(但未成功):"俄国海军不要寄希望于将其舰队分布于三个单独区域,并在三个区域都保持相当的规模,而且能够同时进行独立的行动,比如……在黑海及其附近海峡,在波罗的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及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对于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维特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当时,俄国并不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所有战线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必

①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Д.56. Л.27.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25-26.

②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2496. Л.27.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12.

③ РГИА. Ф.565. Оп.1. Д.317. Л.60-61.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90.

须牺牲某一方面。

(二) 内部派系斗争和外交政策与军力发展的不协调

俄国政府的特性也是影响俄国战略制定的重要因素。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和一致"程度往往会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尤其会受到专制统治者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影响。从俄日战争前的俄国政府组成情况来看,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时的政府内还留有大量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老部下,这些大臣都有各自拥护的政策路线。尼古拉二世对于政府各部门的完全掌控一直拖延到了1903年(他在当年8月28日维特离任财政大臣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我掌权了。"^①)。正是由于尼古拉二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彻底摆脱维特的"影响",因此他采用扶植其他大臣进行平衡牵制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战略决策制定的客观性(战略分歧背后有着许多争权夺利的派系纷争的因素)。例如,尼古拉二世选择支持"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激进的远东政策,并对财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所支持的比较符合日俄实力对比的远东"温和路线"采取无视的态度。^②

作为"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成员之一,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童年好友)是"太平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在不断地寻找机会企图夺得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海军元帅的地位。在"波罗的海派"与"太平洋派"之争中,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鼓吹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力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为培植私人势力以及获得沙皇宠信的招数。"太平洋派"吸引了不少海军将领,这些军官有些确实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太平洋对于俄国舰队而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些则是出于迎合尼古拉二世明显的对远东的偏爱。^③

在尼古拉二世的"纵容"下,远东太平洋区域曾获得优先发展权,但这种优先地位后来又被西线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夺走"。虽然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加强了不少,但最终还是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于日本。因此,俄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与其军力发展水平相协调,走"温和"让步的妥协路线比

① Днев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1890-1906 гг. Берлин: Слово, 1923. С.21.

② D. MacLaren McDonalnd, *United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1900-191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32, 45.

③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72.

较稳妥。但是,"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看法是,"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而谈判拖得越久对俄国便越有利,俄国便能更多地在远东占有优势。这种外交手段的适用条件是日本摸不清俄国在远东的军力以及没有实力和信心发动进攻,然而当时日本的间谍已经基本摸清了俄国在远东的军力——据日俄战争期间被俘的日本参谋本部少校军官供认:"我们了解,俄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在资源上是强于日本的,但俄国只是在欧洲强大,在亚洲大陆的这一面,它是弱于我们的。"^①

在"内部不统一"的长期困扰下,俄国外交策略开始逐渐变得与其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越来越不相一致,而且变动不一、前后矛盾。在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国际纠纷中逐渐与许多大国发生利益冲突,如德国、奥匈、英国。在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压力下,俄国和法国于1891-1893 年间形成了对抗三国同盟的秘密军事同盟。在 1895 年的"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敌对国家——日本。法俄同盟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远东。虽然,俄法两国在 1902 年曾就远东联合舰队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最后无果而终。^②因此,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在远东处于没有盟国支持的艰难境地。而且,由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过大,使得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列强都站到了日本一边。

(三) 威胁预判和战略谋划失误

俄国海权战略有着自己的"大局观",其失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威胁预判不准确。俄国没有考虑到日本会突袭率先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它猜测:日本应该"理性"地选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时挑起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欧洲战场"被认为是首要战场,而远东战区的胜败则被认为对于"世界大战"来说是无关大局的。关于此种"大局观",俄国军事学家司伟琴(A.A.Свечин)有过经典的分析评述: "在对战争的准备上,我们落后于日本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战争的远东战区归为第二重要。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满洲命运的解决必须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利。我们准备好了遭受最坏情况——日本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爆发之时向我们宣战。在当

①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5.

② Там же. С.115.

时的情况下,主战场乃是临近西方的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所有为了取得第二战场优势而对我们在决定性地点力量的削弱都是错误的。 在亚洲的胜利并不能补偿在欧洲的失利;与此相反,欧洲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则是完全清除日本在满洲战绩的开端。"^①

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俄国一直没能获取可靠的情报,它只能根据猜测进行判断。在俄国政府内部占多数的观点是:在日本进攻大陆这一似乎不合情理的情况下,东京会满足于迅速占领朝鲜,而俄国对此种事态转折将不情愿地予以认可。在彼得堡,只有喀琅施塔得海岛要塞的指挥官马卡洛夫(C.O.Makapob)海军中将和总司令部长官侍从萨哈罗夫(B.B.Caxapob)将军预见到了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军港的可能性。^②

在威胁预判失误的情况下,俄国海权发展的战略谋划也是不成功的,拿出的方案在很多地方是草率的和想当然的。在 1901 年,为调整三大海域力量发展战略,俄国政府开始讨论如何应对德国舰队力量的大发展。尼古拉二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加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可是他所支持的观点却非常可笑:为了使波罗的海舰队与德国舰队力量相当,应当将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联合组成一支统一的舰队,远东舰队必须能够成为波罗的海舰队的辅助力量。尼古拉二世同时还认为必须加强黑海舰队(增至 12 艘装甲舰和相应的巡洋舰和布雷舰),使其不仅能够完成"博斯普鲁斯远征",而且能够冲入地中海区域。^③

对于尼古拉二世的幻想方案,仅有少数海军军官表示赞同,而大多数 军官包括海军司令部都持质疑态度。大多数海军将领认为,基于俄国的地 缘特性,俄国无法实现三大海域的互相支援,因此对于沙皇提出的波罗的 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联合计划表示反对。他们指出,即便在战时能够将 军舰从太平洋安全地调回波罗的海,那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

① Свечин А.А. Такт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Офицерская стрелковая школа, 1912. С.2.

② Симанский П.Н.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на заре XX столет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Золотарева. М., АРБИЗО, 1994. С.522.

 $[\]textcircled{3}$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3047. Л.6.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0.

间,波罗的海舰队将被强大的德国舰队削弱,远方赶来的增援舰队不可能带来明显的益处。[©]按此逻辑,很显然可以反推出,如果日本海军在远东强于俄国,那么从波罗的海向太平洋调拨增援舰队同样不能起到作用。但是,前文所述的罗日斯特文斯基报告故意淡化日本海军在远东的相对优势,并认为波罗的海舰队调赴远东是可行的,同时还荒唐地提出从黑海向远东调派增援舰队。事实上,该报告基本上是为了逢迎沙皇的观点[®],它故意忽略了英国会在地中海妨碍俄国军舰行动的事实。受这份报告的观点影响,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报刊中出现了将黑海舰队调往远东的提议,而俄国外交部则很现实地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将形成对俄国来说更加麻烦的"第二战场"(与英国在近东)。[®]

威胁预判和战略谋划失误还集中表现在俄国周边三大海域力量发展计划的制订中。比如,临近日俄战争爆发之时的 1903 年底,在俄国政府制定的 1904-1914 年海军战略发展计划中,并无对日本威胁的应有的重视,却决定将大部分物资投入建设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在 3.71 亿卢布的预算拨款中,70%的经费将用于建造 16 艘战列舰(其中7艘指定给了黑海舰队,9 艘指定给了波罗的海舰队),而远东仅仅计划增添 13 艘炮艇。^④

五、俄国亚太战略与海权战略的失误及不协

如前所述,俄国海权战略的"不协"不仅体现了军事方面的失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亚太战略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矛盾。正是由于在长期和宏观的战略上缺乏"一以贯之",俄日关系逐渐恶化,并产生了难以

①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2496. Л.3; Д.2680. Л.2-3.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0-131.

② 尼古拉二世在 1895 年 10 月的御前会议上曾提出如下看法: "在我看来,与其削弱黑海区域调拨一艘军舰给太平洋舰队,还不如在地中海区域保有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军舰。"这一观点后来反映到罗日斯特文斯基报告中即是,在黑海保留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战列舰以使可以增援远东可能的战事。

③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3229. Л.2-6.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27.

Ф РГА ВМФ. Ф.417. Оп.1. Д.3047. Л.14.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133.

妥协的利益纠纷。纵观日俄战前十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次策略抉择对于日俄交恶、开战并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一)"三国干涉还辽"之失误

在日俄战前,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由来已久,向前可追溯至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甲午战争临近结尾之时,远东复杂的国际纠纷也愈益 公开化,中日两国政府争相拉拢相关欧洲大国。 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连续向 全世界报告中日马关谈判的经过,提醒列强日本控制接近北京的直隶湾将导 致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这将会严重影响列强的在华利益。 ①日本方面则向相 关国家进行瓜分中国的暗示,它表示不会反对英国索取舟山群岛或者德国占 取中国东南某个省份,也不会反对俄国占据北满作为补偿。②在这场由中日 战争引起的远东国际纠纷中,欧洲列强各怀鬼胎:英国认为俄国是其在远东 的主要对手,于是想利用战胜的日本阻挡俄国南下与其争夺在华利益,因此 表示"没有发现自己有理由于预这次谈判": 法国在欧洲需要俄国制衡德国, 不得不尽量满足其盟友在远东的需求,表示"同意将使自己的行动与俄国相 符合";德国积极支持俄国的东进政策,一方面希望促成俄国与英国在远东 的矛盾激化,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让俄国调开部分西线军队以间接削弱俄法同 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表示"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参加俄国认为在东京所必需 的任何行动,要使日本清醒它不仅要放弃割占含有旅顺港的南满,还要放弃 割占澎湖群岛"。③

概括言之,俄国当时的应对策略可有三种选择——"联中抗日"、"联日削中"和"消极观望",其战略决策的关键是从中选出一种最有利于俄国的方案。高层大臣会议的争论核心在于是否应当针对日本进行军事干涉。最后的决议倾向于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而以总司令部长官奥勃鲁切夫为代表的"联日削中派"的方案则因属于少数观点而未被写入决

① 参见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0卷,第18-30页。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的往来电稿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对于辽东和台湾的割地企图"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英法俄等国很有可能会干涉中日议和。

② A.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p.63.

③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ние, 1932. № 3. С.79-80.

议。在此后的御前会议中,维特成功地说服了本来持对日妥协观点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完全采纳了维特的方案。^①事后看来,部分高层属意的"联日削中"策略未必对俄不佳:日本将来必与英国产生矛盾,俄国不应阻碍日本侵华,而应与其进行利益妥协(以南、北满划分势力范围),并鼓励日本尽快走上挑战英国在华利益之路(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二)"旅大租借"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战略漏洞

"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政府遵循维特的设计方案,以"拯救者"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经济上的"和平侵略":首先,法国人投资占大多数而俄国人掌控下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 1895 年底)向中国提供了大笔贷款(清政府用以加快完成对日赔款);其次,1896 年 6 月 3 日,维特、洛巴诺夫和李鸿章签订了在远东"共同对日"的"中俄密约",中国为此答允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与此同时,随着清朝在朝鲜势力的消失,俄国开始在朝鲜发展自己的势力与日本相抗,并签订了洛巴诺夫一山县协定(亦称 1896 年 6 月 9 日莫斯科议定书),实际上确立了日俄两国对朝鲜的共管。

如上所述,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渗透是非常迅速的,而且这一成功是在没有明显提高在远东的陆海军力量的条件下实现的。不过,随着"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俄国政府在远东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按照沙皇的指示,针对德国占领胶州,为讨论远东不冻港问题,1897年11月26日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按照维特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由于已预见到(强占旅大)这个步骤"是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情,必将以惨祸结局,于是同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争论了好几次。"对于维特指出的——英国和日本都将不会对此漠然处之,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声称这点由他来承担责任,他相信:无论日本还是英国都不会对此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这次会议最后还是决定不占领旅顺口或任何其他港口。尼古拉二世尽管对维特的意见"感到不快",但还是同意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拟定的会议记录中写入:"陛下并不希望赞同外交大臣的建

① Рыбаченок И.С. Союз с Францией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в.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3. С.45.

议。"[®]然而会后不久,尼古拉二世和维特的政敌穆拉维约夫便改变了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强占旅大的军事行动。强占旅大这一决策给俄国在远东带来了不少麻烦,中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此都感到非常愤慨。诚如维特所言,俄国占领了"曾经迫使日本离开的、在它打了胜仗后夺得的这块领土",进一步把俄国引向了"不幸的对日战争",同时还"破坏了同中国的全部传统关系"。[®]

由于"旅大租借"问题,俄国的注意力从朝鲜转回满洲,俄国将在远东的军队战术单位由旅提升到了军,同时还成立了专门保卫中东铁路的护路队。俄国人千方百计地夺得了旅顺这一远东不冻港,但是在保住这一据点的战略上则存在着重大失误。最为重大的失误在于财政方面。按计划,旅顺军港要塞工事的彻底完成要到1909年,对于旅顺要塞的拨款不仅是微薄的,甚至还少于对大连的拨款。财政大臣维特对此不能说没有责任,他忽略了军事拨款(亦即加快旅顺建设)的优先性:在1904年前,由于财政赤字,对于旅顺的实际拨款只有460万卢布[®],而对于大连的拨款却超过1850万卢布[®],且这些拨款主要是用于大连自由港的基本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军事防御工事。从战略上看,如果大连没有坚厚的防御工事而被敌方攻占,那么大连将成为敌方可以利用的进攻旅顺军港的良好基地。

在俄国远东海军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对于旅顺的利用也存在巨大的战略漏洞。旅顺离海参崴 1500 公里,这便决定了海参崴对旅顺的支援并不能很快到达,同时旅顺本身并不拥有支撑海上关键战役的持续物资储备,这也就使得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选择在旅顺施行保守的防御方案。按照阿列克谢耶夫的方案,俄国在旅顺的海军战略从一开始便是防御性的,俄国希望依靠旅顺为据点控制附近海域,以阻止日本人在辽东半岛或者朝鲜西海岸直接登陆:俄国希望通过海上防御赢得时间将陆军调赴满洲,这样才能真正防守

① Витте С.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Николая Второго (в 2-х томах). Берлин: Слово, 1922. Т.1. С.121.

② Там же. С.129.

③ Погребинский А.П.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финансы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инансы», 1968. С.50.

④ Головачев П. М.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здание Е.Д.Куско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Исидора Гальдберга, 1904. С.165.

住旅顺这一据点;与此同时,俄国可以自海参崴派出巡洋舰向日本的船舰发起进攻并割断其海上交通线路。正是由于这种方案设定,阿列克谢耶夫坚持在海参崴保持4艘巡洋舰作为"牵制舰队"。当俄国在远东的海军舰队实力弱于日本的情况下,分散性的战术其实不利于集中一点的大规模战役,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俄国在远东的重要据点旅顺是非常需要这些"牵制舰队"来抵抗日本舰队的。另外,俄国在海参崴的舰队,由于离旅顺航程过长(且还需防卫海参崴要塞)、船舰的作战能力以及自身目标太明显,仅仅能完成袭击日本商船的任务。[©]

(三)日俄战争的导火索——东北撤军问题

1900 年夏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随着俄国军队开入中国东北,列强对于俄国的对华野心开始愈益担忧。在列强中,英国,作为俄国在华的主要劲敌,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01 年 9 月 7 日,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此后各国军队陆续撤离北京,俄国军队何时撤离中国东北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01 年底,日本政府内倾向于对俄妥协的伊藤博文访问俄国。伊藤博文提出了他认为可以向日本国内"好战派"交代的协议基础条件:俄国应当彻底让出朝鲜,任凭日本全权主宰;日本则容忍俄国占领关东州并修筑通往旅顺口的中东铁路支线,但要俄国从满洲撤军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②与此同时,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也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伊藤博文此行不过是最后的与俄妥协努力。俄国政府并未接受伊藤博文的协议基础,而是用反建议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顶了回去,这便加速了英、日两国关于英日同盟的谈判。

1902年2月12日,英日宣布建立同盟关系,这对于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在列强的一致反对下,俄国很难再拒不撤军,遂于1902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虽然签订了撤军协定,但是俄国政府内部的远东政策分歧并未解决,正如前文所述,"三巨头"[®]之间的

①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30.

② Витте С.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Николая Второго (в 2-х томах). Берлин: Слово, 1922. С.147-156, 185.

③ 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经常用"单鼻子眼儿"、"乌鸡"和"蝌蚪"讽刺谩骂与己派对立的财政大臣维特、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并将此三人的松散(三人间对于远东问题也有某些不同观点)派系谑称为"生疥癣的三巨头"。

分歧以及同"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争斗,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也在产生愈益严重的恶劣影响。在"对日强硬派"的影响下,俄国在撤军最后期限到来之时非但没有按约撤军,反而继续增兵。这样一来,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利益矛盾已彻底不可调和,只能走向战争。

随着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意图吞并,在 1903 年时,俄国在西伯利 亚军区和阿穆尔军区的驻军已增至 4 个西伯利亚军和两个独立师。①在此一 阶段,俄国政府虽然一直向远东持续增兵,但对于其他地区也从未放弃侵略 野心。1900年初,基于对英布战争的背景,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曾向沙皇 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一《沙皇外交当局论 1900 年俄国在东方的任务》。穆 拉维约夫在报告中提出,可以利用英国在南非陷入挫折之时,调整紧缩俄国 在远东的开支而把力量转向中亚和近东——在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增加俄 国的影响,而他着重强调的是,俄国必须立即明确博斯普鲁斯计划。 ②对于 远东的问题,穆拉维约夫反对在朝鲜建立加煤港,理由是,为了保住此一据 点便必须在加煤港修建防御工事,而这是需要庞大开支的。海军部长官特尔 托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日本是俄国的天然敌人,而旅顺不能胜任对日 作战基地的使命, 且与海参崴相距过远, 这是俄国远东海军在战略上的重大 弱点。鉴于此,他指出,为了使两地海军互援,便必须在朝鲜南部取得一个 加煤港。®俄国政府最后决定租借朝鲜的马山浦为加煤港,但是马山浦并没 有建立防御工事。俄国人的战略假设是俄国舰队取得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 势,这样马山浦便能发挥其战略作用——在此驻扎的俄国舰队可以利用马山 浦储存的煤为能源,进而封锁日本西海岸和下关海峡。可事实上,日本舰队 比俄国太平洋舰队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陆、海军战略协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 在陆军方面,前线军区的作战方案必须经过库罗巴特金和总司令部的审核, 而且彼得堡有权进行修改。然而,在海军方面,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 作战方案却不必经过类似的审核。这样一来,战争中陆海军协同作战势必成

①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360-361.

②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18.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ние. 1926. С.18.

③ Там же. С.20-21.

为不可能,因为不论海军部还是陆军部都不清楚阿列克谢耶夫在远东的海军作战计划。[®]在海军部和阿列克谢耶夫之间,除了偶尔的私人联系,关于重要问题并不存在系统的信息交流[®]。

六、结 语

本文着重评析俄国海权战略,并非言其可完全决定日俄战争之胜败,海 权战略之重要性需结合陆权战略方可得见。

日俄战争之时,从日俄两国在远东的力量对比来看,任何与日本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都需要从西伯利亚和欧俄部分向远东调派援兵。俄国陆军在日俄战争前共有 20 个步兵军和 2 个骑兵军[®],然而这支强大的部队却不能全部调往远东,因为它的主要任务还在于防备西方的德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及时将适量的军队和给养运送至远东前线。在 1901 年底,俄国在南满和"关东区"总共动员了约 6 万士兵,而将如此数量的部队聚集起来并做好战备,需要不少于 60 天的时间。与此同时,日本却早已能动员数十万的军队发起进攻。至于俄国驻扎在外贝加尔和西伯利亚军区的绝大多数可用于增援部队,从动员到能投入战斗,需要 5-6 个月的时间[®]。此外,对于日俄战争的结局而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作用至关重要。在 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爆发之时,外贝加尔段铁路以及中东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四对列车,而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三对列车[®]。可是,将军队调赴前线聚集并展开,每一个军需要 90-92 列火车[®]。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当时的俄国如遇突发事件是无法立即将足够的兵力和给养运至远东的。在日俄战争前

①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Козлов И.А., Шламин В.С. История фло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 2-х тт. (неок.). М., 1996. Т.1. С.185.

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29.

③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А.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на рубеже XIX – XX столетий (1881-1903). Москва: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73. С.143.

④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описанию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пб., 1910. Т.1. С.193-194.

⑤ 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тоги войны.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Berlin: J.Ladyschnikow Verlag, 1911. C.228-230.

⑥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Д.500. Л.96-97. Цит. п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С.28.

夕,俄国在远东的陆军兵力总共不过 12 万左右;日本陆军却已拥有步兵 156个大队、骑兵 54个中队、野山炮兵 106个中队,其中仅在中国和朝鲜地区的驻军(台湾 2个混成旅、朝鲜 1个步兵大队,中国华北 7个步兵中队)便大约有 20 万人^①。而且,日本并无如俄国防备德国一样的后顾之忧,它可以倾全国之力展开对俄作战。

基于以上所述,正是由于俄国在远东陆军兵力有限且运输能力不强,取得对日制海权才显得异常重要,因为只有利用海军尽可能遏制或延缓日军登陆,才能向远东调集足够的兵力赢得战争优势。俄国的海权战略与陆权战略有紧密联系,单独让其中之一为对日作战的失败负全责是不客观的,二者同等重要,应一同为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劣势负责。

古人云: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短时段以及军事方面来看,俄国的海权战略须对远东战前俄军的劣势负很大责任。如前所述,俄国的经济基础并不能完全满足俄国在三大战区、东西两线都实施积极进取的政策。然而俄国急于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其海权战略存在着狂热的冒险主义倾向,且在宏观部署上并不协调。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俄国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严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定一贯和一致的战略。于是,俄国缺乏军事基础的"强硬而不妥协"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它在远东"骑虎难下",并最终将其引向了一场准备严重不足的战争,并最终惨败于日本。

但从长时段以及总体大局来看,海权战略只是俄国全球大战略所涉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一部分。具体针对日俄冲突而言,亚太战略中的不协和失误才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决定日俄关系走向的种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须为俄国战败负主要责任。因为 20 世纪初年的战争已经越来越具有与之前战争不同的特征,如欲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便需保证其政府各部门一致地发挥国家综合力量进行"全面战争"(总体战争),而这便要求在战争前及早制定出整体配套协调的宏观战略。对于制定宏观战略而言,基本要求便是将政府各部协调统一,但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政府则连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做到。在日俄战争前,俄国的亚太战略是逐步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对制定

① 沼田多稼蔵『日露陸戰新史』岩波書店、1940年、28頁。

这一战略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分裂的共识"。正是根源于亚太战略决策中各方面的分歧和失误,俄国才一步一步[®]遭遇了惨败的命运。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sea power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ssia surrounding itself faces a dire situation, that it had different opponents in three waters, namely, the Pacific, the Baltic and the Black Sea, far apart from each other. Coping strategy of Russia is: maintaining a strong army, it had been vigorously developing sea power to snatch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world by building a separate battle fleet in each of three waters. However, Russia's economic foundation was so weak, that it couldn't affor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plans of the necessary naval forces for its global colonial expansion. Mean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factional struggle, Russia was lack of a consistent and coherent strategy, and it had made major mistakes in aspects of threat anticipat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t that time, command of the sea was critical to the victory or defeat of a war, Russia's sea power strategy, together with its Asia-Pacific strategy, had large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conflict outcome.

Key Words Russo-Japanese War; Russia; sea power strategy; Far Eastern

①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战略经验分析则可,比如:通过之后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和俄国为了抵制其他列强进入中国东北,通过"日俄密约"基本上就是按照奥勃鲁切夫的方案,划分了满洲的势力范围。"日俄密约"是在俄国战败的条件下谈判达成协议的,而奥勃鲁切夫"联日削中"的方案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为避免日俄冲突乃至战争而提出的,根据他的主张,俄国可以在同日本协调的情况下,不仅得到北满,甚至还有可能得到朝鲜北部部分领土(包含朝鲜北部沿岸的不冻港)。从军事—政治战略意义上,我们无法判断奥勃鲁切夫方案和维特方案之间哪一个从长远来看对于俄国更加有利,但是可以判断的是奥勃鲁切夫方案对于时刻必须在西线维持庞大军力而财政上捉襟见肘的俄国而言更加容易实现,而维特方案成功的必须条件是大大提高远东的俄国陆海军力以威慑日本不敢复仇(尤为重要的是,在对于兵力和补给运输非常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前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果当时选择"联日削中",那么至少可以延缓俄国与日本的利益冲突激化,俄国可以得到在远东准备战争的较充足时间,以使其远东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problem; Asia-Pacific strategy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конце 19- начале 20 ве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тяжёлой ситуации, у России были различные соперники 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далеко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Балтийской море и Чёрном море. Стратегией России по преодолению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был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сохранением сильной сухопутной арми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ть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е силы для борьбы за сферы влияния в мире,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начал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тдельных флотов в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х трёх морях. Однако слаб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позволяла ей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вой план развити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дл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наличия факторов внутренней фрак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в России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согласова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а такж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основные ошибки в вопросах ожидания угрозы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В то время морская власть имела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обеды или поражения в войн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месте eë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ей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повлияла на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исходы конфликт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Росси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责任编辑 黄翔)

中国的"瓦西里"与他的俄罗斯朋友

——走私者与他们的跨文化身份*

吴若痕**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苏边境上走私者的生活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除了走私行为的经济维度,历史学家通过走私现象也可以了解走私者超越"民族"或"文化"概念的身份构成。货物的流通如何与走私者的身份联系起来,以及相反,走私者的身份又如何决定了他们走私的网络及策略?对中苏边境地区走私者的跨文化身份的分析,有助于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

【关键词】苏联 中国 东外贝加尔 边境 走私

【中图分类号】D83/8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2-0178-(23)

简介

关于此人的事情令人起疑。1930 年春天,在赤塔中央火车站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李召志(音译: Li Zhaozhi)。这个跨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城市是东外贝加尔(Восточное Забайкалье)的行政中心,位于贝加尔湖以东约四百英里。在赤塔火车站,李先生或是登上一列火车,或是在站台上与他人碰

^{*} 本文英文版即将出版 ("'Vasily' of China and his Russian friends. Smugglers and their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 in: Dan Ben-Canaan, Frank Grüner, Ines Prodöhl (eds.), Global Challenge and Regional Response. Early-Twentieth-Century Northeast China's Encounters with the World, New York: Springer 2013.)

^{**} 吴若痕(Sören Urbansky),德国弗莱堡大学,讲师。

面。但是,李先生既不是售票员,也不是车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如其名所示,他具有亚洲人而非高加索人的面部特征。赤塔的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和一般人都注意到了车站里的李先生。但是他在车道边干什么呢?

本文研究 1920 年代晚期到 1930 年代早期中苏边境上走私者的生活。虽然走私品贸易通常来源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我并不想写关于走私的经济史。通过走私现象,历史学家也可以研究走私者超越"民族(nation)"或"文化"概念的身份。^①商品往来是如何与走私者的身份联系起来的?反过来,走私者的身份又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策略和网络?为了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将集中关注中俄边境上走私者的跨文化身份。根据狄克•霍尔德(Dirk Hoerder)对"跨文化主义(transculturalism)"这一名词的定义,本文将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人理解为有能力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如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帝国实体)生存与行动,并创造出一种混合或交叠生活方式的人。^②霍尔德说,"策略性的跨文化能力包括在多重情境下对生活内容的多重概念化,和在多种文化可能性间的明智选择。"^③作为研究假设,我认为走私者常常策略性地利用他们的跨文化能力以达到经济目的。与霍尔

① 很多概念,如"跨民族(transnationality)"、"混杂状态(hybridity)"、"第三空间(third space)"、"中间文化(culture in between)"以及"缠绕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ies)"——这里只提出其中的一部分——都提倡从民族—国家路径(nation-state approaches) 向 研 究 人 的 能 动 性 (peoples agency)、思想 状况(mentality)或文化创造(cultural creation)的转变,当然也可加以改造,以适用于对 走私者人格特点的研究。

② 从 1990 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几个学科的学者开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的概念。早在 1940 年代,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在他对非洲一古巴文化的开创性描述中创造了"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一词。在当代学者中,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维尔士(Wolgang Welsch)的跨文化概念被广泛引用,但对研究走私者身份来说过于一般化。W.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 Partikularisierung", A. Wierlache ret al. (eds.), Jah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Intercultural German Studies, vol.26, München: ludicum 2006, pp.327-351. 霍尔德的方法对研究走私者身份来说可能更为适用,其中最重要的是D. Hoerder, "Transculturalism(s): From Nation State to Human Agency in Social Spaces and Cultural Regions", Zeitschrift für Kanada-Studien, 2005, no.45, pp.7-20.

③ 虽然与霍尔德2005年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很接近,但这段话引自 D. Hoerder, "Historians and their data. The complex shift from nation stat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eople's Transcultural Live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Summer 2006, vol. 25, no.4, pp.85-96, 引自 p.91.

德将此概念应用于移民的主要不同在于,本文研究的走私者中只有某些人 具有移民背景。那么,到底是走私行为创造了跨文化身份,还是跨文化性 是一个人成为成功的走私者的前提呢?

我在这里使用的第二个用来理解中苏边境上走私者生活的概念是玛丽·露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区"(contact zones)。与第一个概念密切相关,普拉特将"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理解为"接触区的一种现象"。在她称为"接触区"的概念中,——一个允许两种或更多文化混合的区域——普拉特探讨了殖民碰触(colonial encounters)空间中的"跨文化"现象。在本文的设置中,殖民语境可以忽略,因为在本文研究的时代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但是,"接触区"的概念仍然用处很大,可以应用于此,因为它描述了"地理和历史上彼此隔离的人互相联系,并建立持续关系的空间"。[©]

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走私者在卷入复杂的走私活动前,常常已在接触区生活工作了多年。在尝试分析走私者身份之前,首先应该了解生活在边境区域的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缠绕,以及他们互动的接触区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本文将论述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将简要介绍边境的多民族环境,以及现代国家边界控制的缓慢出现。其次,通过集中关注作为主要走私品的黄金,粗略描绘这个区域的走私活动是如何开展的。通过考察两个黄金走私网络的案例,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尝试分析走私者的跨文化身份。

一、渗透的边界, 多民族的边境

霍尔德认为跨文化背景的人也创造了"跨文化空间(transcultural spaces)"。^②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俄边境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跨文化空间"——或"接触区"——生活于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

① M.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6

② 参见 Hoerder, "Transculturalism(s)", p.8.

们并不怎么关心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总的来说,建构于十九世纪、体制化于二十世纪的民族国家的角色是次要的。这对于边界两边来说都是如此:

"从 1900 年代早期到 1950 年代中期,中国边境地区满洲里是数千名俄罗斯殖民者的家,他们沿着带有半殖民色彩的中东铁路定居下来。不久之后,更多逃离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移民跟随而来。许多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臣民生活在哈尔滨市和沿铁路通行区的村庄中。这些人大部分保留了他们革命前的生活方式,说俄语,并保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代表了俄罗斯'在国外的文化'(culture abroad),在许多方面与他们周围的中国文化相隔离。"^①

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东亚居住者的情况与此类似:正如中国东北三省并非单一民族实体,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也是一个居住着来自许多不同地方的人的地区。到十九世纪晚期,俄罗斯人以及沙皇帝国的少数民族与东亚移民共同居住在这些地方。因为清政府放松了前往东北三省的控制,每年有几千名汉族移民来到俄罗斯的东部边境。事实上,远在俄罗斯人搭起他们的第一个棚子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居住在俄罗斯远东的某些地方了。也有不少朝鲜人和日本人涌入这一地区。^②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几千名东亚人居住在日渐兴起的远东与西伯利亚的中心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及其周边的农村地区。例如,1912年俄罗斯人其实只占符拉迪沃斯托克人口的58%。^③相较于涌入满洲里的俄罗斯臣民,俄罗斯和苏联东部地区的东亚人更多,数量也更稳定。与中国东北的俄罗斯移民不同,许多在俄罗斯的中

① 特别是 O. Bakich, "Charbin, 'Rußland jenseits der Grenzen' in Fernost", in: K. Schlögel (ed.), *Der Große Exodus: Die russische Emigration und ihre Zentren 1917 bis 1941*, München: Beck, 1994, pp.304-328,特别是 p.327. 关于中东铁路的简史,参见 S. Urbansky, *Kolonialer Wettstreit. Russland, China, Japan und die Ostchinesische Eisenbahn*, Frankfurt/Main: Campus, 2008.

②关于俄罗斯远东每个东亚社群的独特之处,参见 J. Stepha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71-79.

③ D. Wolff, "Russia Finds Its Limits. Crossing Borders into Manchuria", in: S. Kotkin, D.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M. E. Sh arpe, 1995, pp.40-54, p.42 °

国暂居民常常很难被描述为"纯粹的"中国人。中国人比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更容易同化于一个陌生的社会。沙皇时代晚期的国民性(nationality),由东正教、采纳俄罗斯文化、服从国家独裁,而非由民族(ethnicity)或种族(race)来决定。在俄罗斯的中国人转信东正教,起名"瓦西里"(Василий)或"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一些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结婚(其中男性移民多于女性移民)。这一情况只是在苏联统治加强时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1930 年代晚期,大部分中国人被苏联驱逐出境,或驱逐至中亚。[©]

那么,当如此多的中国人居住在俄罗斯边境时,为什么李召志无论何时在火车站等待都会引起赤塔人的注意?在驱逐俄罗斯的东亚人开始之前,赤塔的情况已和其他东部边境城市有所不同。东外贝加尔不像俄罗斯东部其他地区那样民族众多。虽然外贝加尔的工厂、建筑工地,特别是金矿雇佣了共约 20,000 名"黄种工人"(желтые рабочие)——在俄罗斯媒体上东亚人被如此归类——他们在此区域中所占的份额远低于黑龙江(Приамурье)和乌苏里斯克(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地区。^②赤塔也是这样。1910 年代赤塔约有 70,000 人^③,但市中心只有几百名中国居民。1920年代早期,在新的困境导致人口更多下降以前,赤塔的中国人主要在城市的老巴扎(барахолка)经营小生意。^④中国人或其他东亚人的出现,对赤塔比对其他城市的居民来说更不"正常"。不可避免地,许多赤塔市民都能认出李召志的脸。只有除去民族标签,历史学家才会发现,许多亚洲移

① 开始时移民所占的比例不稳定,但到这一地区完全处于苏联统治下时,移民比例明显下降。 V. Larin, "'Yellow Peril' Agai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vin: Kotkin, *Rediscovering Russia*, pp.290-301, p.297。也可参见 Stephan, *Far East*, pp.212-213。

② 一系列名为 "关于外贝加尔的黄种劳工的问题 (К вопросу о желтом труде в Забайкалье)" 的批判文章估计,1915年外贝加尔的中国人多达19,800人。大部分人受雇于金矿。金矿中的中国人占到所有矿工的75%到90%。参见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5.1.1916, 8.2.1916.

③ 随着铁路的修建,赤塔的人口在短短十多年中,从1897年的11,522人增长到1910年的74,325人。参见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а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том 1. Ст. Петербург, 1914. С.293.

④ 早在1922年,城市政府曾试图强迫中国人离开,以干扰其制造业生意。华侨联合总会曾就此向城市政府提出抗议。参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Чит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АЧО). ф.R-15. оп.1. д.50. лл.13-14.

民虽然受到当地居民的注意,却仍然可以找到方法掩护自己的生活,并在 两种不同文化中成功生存。下文将探讨那段时期内俄罗斯(之后是苏联) 与中国两国边境的渗透程度。

在这一时期是哪些人和什么东西在穿越边境? 本文研究的中俄边境东 段,即东外贝加尔地区,大约在三百年前就划出了边界。^①然而,到十九世 纪末,该边境对商贸和旅行来说仍然是相对开放的。人们实际上可以毫无 限制地穿越国境。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岗哨彼此相隔数十英里。中国这边的 边境岗哨"卡伦"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初,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仍然十 分倚重于边境贸易和移民劳动力。俄罗斯哥萨克人在额尔古纳河左岸伐木 养牛。中国农民耕种俄罗斯的土地,他们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城市供应水 果、蔬菜和谷物。清王朝的臣民也在俄罗斯的金矿工作,与俄罗斯人交易 商品。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的自由口岸 (порто-франко) 体 系培育了活跃的跨边境贸易,并将东俄罗斯的某些地区置于沙皇帝国海关 控制以外。在早期阶段,只对酒、鸦片、茶叶和黄金等单个产品实施某些 贸易限制。但因为缺乏有效的边境管理,即使这些限制也很难落实。直到 1890 年代中期, 俄罗斯财政部的一个委员会才致力于为恰克图以东的俄罗 斯边境部分建立海关控制系统。这一努力在1900年代早期导致了自由口岸 的取消,并建立了一个与俄罗斯欧洲边境地区类似的海关服务中心。但现 代控制系统的创建并未打断跨境贸易。所发生的恰恰相反。虽然海关将检 查点之外的大多数边境商贸定为非法,但他们常常使得这一商业活动变得 更加吸引人。接下来加强控制的努力,如 1913 年取消 50 俄里长的边境自 由贸易区,也未能有效地减少当地人跨越边境的经济活动。

① 其他中俄边境于19世纪中期划定。参见 S.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Sharpe, 1996, chapter 1.

② 关于远东各省如何从自由口岸到建立俄罗斯海关的全面叙述,参见 Беляева Н. От порто-франко к таможне. Очерк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03.

内战的混乱推迟了苏俄东部国境上经济控制机制的建立。在 1922 年 "国家政治保卫局" (OΓΠУ) [©]建立之后,苏联的秘密警察部门开始负责 边境控制,海关服务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下降,职员也大量裁减。 事实上,1920 年代是走私的黄金时期。直到 1920 年代末,国家针对走私的政策才开始由"软"变"硬"。针对职业走私成员网络的清洗运动和严厉惩罚使得走私活动变少。[©]

但是,并不是反对走私的国家政策,而是国际层面的关系最终消灭了走私。1920 年代晚期中俄关系恶化,最终爆发了 1929 年的中东铁路事件,导致边境沿线的军事部署陡增。[®]到 1930 年,俄罗斯与中国边境的管制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严格——但是依然很薄弱。在 1930 年代,走私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使非法穿越边境、走私和刺探成为逮捕的惯常理由——常常只是宣称如此。但是,与经济走私作斗争的最重要原因并不是大恐怖(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而是日本建立的满洲国——位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傀儡国——引发了苏联东部边境上歇斯底里的战争恐慌,持续了整个 1930 年代,并最终导致走私活动的终结。[®]就在中苏边界建立有效的海关管控来说,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边境经济管控令人惊奇地一直成效不足。

二、河两岸的淘金热

第二部分将探讨走私是如何在边境地区展开的。走私以及对抗走私的 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中俄边境上的持续现象。违禁品进出口的数 量及其构成,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二者都依赖于诸多因素,如走私是为个

① 这个机构在1922 到1923年间称为 ГП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在1934年并入国家内务委员会(НКВД,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② 关于19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反对走私贸易的国家政策,参见 Попенко А. Опыт борьбы с контрабандо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84-конец 20-х гг. XX в.). Хабаровск: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ФСБ России, 2009. С.72-118.

③ 参见, 比如 Urbansky, Kolonialer Wettstreit, pp.136-143.

⁴ Stephan, Far East, pp.233-235.

人消费,还是为了再出售,边境两边的供需情况,卢布的价格和兑换的可能性,对走私犯惩罚的严厉程度,对边境地区居民宣传鼓动运动的成效,等等。

两种货物在走私者中一直特别流行:俄罗斯黄金和中国酒。酒的非法进口和黄金的非法出口的原因类似,最重要的是中俄市场价格的巨大差异。二者的非法交易常常是彼此相关的。对黄金和酒作一番比较很重要,因为黄金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易,而酒一直只是地方或区域交易的货物,供应链更短。酒与酒精产品(如伏特加和白酒)是走私进入俄罗斯的最重要的商品,在中国生产,而主要由俄罗斯人消费。①中国人很快成为俄罗斯边境居民主要的伏特加供应商,反过来也催化了黄金走私,因为这种贵金属是俄罗斯进口违禁品的主要交易媒介。鉴于黄金是全球范围内交易与走私的物品,它与世界市场中的网络和跨本土(trans-local)合作有着明显的关联,因此接下来我将着重关注黄金走私。黄金走私将许多不同的人牵扯进高度复杂的供应链中,其中既包括挖掘者,也包括走私者和贩卖者。

远在沙皇政府考虑在它的亚洲国界上实施有效的经济监管之前,黄金的非法交易已经成为边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黄金的发现引发了奔向黑龙江的热潮。几千名中产阶级寻富者、"捕猎者"、农民和流浪者来到这里碰运气。他们或是来自邻近地区,或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其他地区,有的甚至来自国外。淘金者沿着界河两岸开挖,不分国籍。在 1880 年代,满洲最北部的"黑龙江上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on the Amur)"吸引了几百名来自黑龙江地区的俄罗斯人。他们穿过河流,加入中国河岸上的非法淘金活动,身边不远处就是中国矿工。他们建立了短命的"热尔图加共和国"(Zheltuga Republic)。几年

① 关于中俄边境地区酒的非法生产及其走私网络,以及它在道德、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影响,参见 S. Urbansky, "Der betrunkene Kosake. Schmuggel im sino-russischen Grenzland (circa 1860-1930)", Martin Aust (ed.), *Globalisierung imperial und sozialistisch*. Russland und die Sowjetunion in der Globalgeschichte 1851-1991, Frankfurt/Main: Campus 2013, pp.301-329.

后,类似的"跨国努力"(transnational endeavours)又出现在俄罗斯那 边。[©]

淘金业成为界河两岸重要的经济部门。到世纪之交,黑龙江省北部的黑河、嫩江附近,呼伦贝尔北部,有几十座金矿,多数属于中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企业家。[®]对俄罗斯来说,淘金是更重要的工业部门。不要说俄罗斯的阿穆尔(Amyp)或东部的其他地区,仅外贝加尔就有 149 座金矿,几乎一半都位于邻近中国的东外贝加尔边境上,年平均产量超过200 普特(3.28 吨)。相比之下,黑龙江的金矿年产量只有 110 普特(1.8 吨)。[®]虽然 1901 年后私人和国家所有的金矿的黄金开采量有所下降,挖金者的人数却大幅增加。1909 年,外贝加尔的金矿雇佣了 17,210 名工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阿穆尔地区的金矿情况类似。中国低等劳工的比例从1900 年的 15%上升到 1915 年的 76%。[®]直到 1920 年代晚期,中国工人的比例才显著下降。

跨境贸易何时变成了走私?通常,居住在边境的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贸易活动是犯罪行为。世代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不受控制地从边境的另一边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走私并不是和这些人同一时代的概念。许多人认为他们只是商人,因为这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线,几十年来,在外贝加尔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只是人为定义而非实际上强制实行的边界。一

① 关于"热尔图加共和国"的历史以及它之后的传奇故事,参见 M. Gamsa, "Califo rnia on the Amur, or the 'Zheltuga Republic' in Manchuria (1883-8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April 2003, vol.81, no.2, pp.236-266. 1883年漠河发现金矿,来自各个国家的金矿盗采者、商人和各种投机投资者,在中国的领土上非法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史称"热尔图加共和国"。他们建立了市政府,制定了法律,并设有警卫队和税收机构。1886年,清政府派兵武力取缔,"热尔图加共和国"就此被彻底清除。——编者注

② 关于满洲里的黄金采矿,参见 Торгашев В. Золото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1928. No.8. C.47-52; Кормазов 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Хейлунцзян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1927. No.3. C.41-44.

③ Обзор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 1910 год.[Чита, 1911]. С.63-69. — Кормазо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41.

④ 相比于1897年的4,686名工人和1901年的7,710名工人。Обзор.С. 69-70。 类似数目的工人在中国一边的矿山和金矿中工作。Кормазо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41.

⑤ Stephan, Far East, p.73.

个例外是走私黄金、鸦片和酒的商人。远在海关哨所建立以前,从 1860 年 代起这些商品就被禁止进、出口。

虽然黄金在全球范围内交易,但它抵达世界市场的方式却常常依赖于地方网络。那么,它是通过何种渠道被走私的?谁在中国一边接收这种贵金属?它被走私了多少?如果以损失的海关收入来看,从俄罗斯和之后苏联运出的黄金是最重要的走私物品。到第一次世界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年从俄罗斯向中国外流的走私黄金估计有 150 普特(2.46 吨),至1920 年代中期跌至大约每年 80 普特(1.31 吨)。也就是说,在沙皇俄国的最后三十年,黄金年产量的 20%—60%被中国人走私出远东。[©]走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价格的差异。1927 年苏联政府的黄金价格是每克 1.29卢布,而中国市场几乎为每克 2 卢布。[©]

直到十月革命,中央和地方政府想要制止向国外非法售卖黄金的企图常常受到俄罗斯矿业公司的挑战,它们严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③冬季回家的中国劳工成为黄金走私的主要群体。众多的移民金矿矿工和薄弱的边境管理,使得这一走私渠道最受青睐。^④但是,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的接触区,走私活动通过它们得以开展。比如边境村庄中的杂货店,哥萨克人在那里购买日用品和伏特加,常常即以黄金来交换。海关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在满洲里的边境火车站逮捕乘客,大多数为中国商人,被捕时经常被查出随身带有几千卢布和黄金。在海关记录中,黄金的重量特别以俄磅(фунт)而不是索拉尼(золотник)标明。^⑤黄金购自伊尔库茨克、赤塔或金矿,据说会在中国地面上最先出现的主要车站之一销

① Кормазов.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46. 1923年,苏联东部挖出的黄金的三分之一消失于中国市场。根据1925年的官方数据,4.1吨价值五百万卢布的苏联黄金被走私进入中国。参见 Попенко. Опыт. С.114.

② 1920年代晚期的非法黄金输出显著下降。Попенко, Опыт. С.114.

③ 工资差异并不重要。在低酬雇佣中——这是唯——个两国人民彼此竞争的部门——1916年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工人的工资比中国同行高10%至20%。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8.2.1916.

④ ГАЧО. ф.107. оп.1. д.125. л.365.

⑤ 老的俄罗斯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1索拉尼为4.26克。

售,如满洲里、扎赉诺尔和海拉尔。^①但被搜查的乘客和经常光顾边境商店的顾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走私者知道自己可以很轻易地绕过海关警卫。如果他们乘坐火车,就会在达斡里亚(Даурия)等俄罗斯领土上的最后几站下车。在那些尘土飞扬的草原村庄,他们将走私货物转交给骑马的同伙,其中许多人都是俄罗斯人。少数几个岗哨以外的边境几乎没有什么控制,黄金顺利地在马背上通过边境。^②如果不希望的事情发生了,某个走私者在某处被抓,也有办法与官员们进行协商。哥萨克人和海关职员常常十分腐败,他们对从满洲里非法进口来的走私伏特加上瘾,他们不去保卫边境、抵制走私,自己反而变成了走私者。

由于国际冲突,对边境的控制到 1930 年变得严格起来。穿越中苏边境变得愈加困难。虽然走私贸易事实上吸引了所有民族和社会群体,但却再也不是普通金矿矿工或火车乘客能够从事的了。酒的区域走私风险较小,黄金走私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危险。因此,不同的走私者网络开始出现,也必须采用新的走私贸易策略。

三、瓦西里的"俄罗斯关系"与亚内切克(Янечек)的老朋友

在第三和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会再次提到李召志。我们将了解到,这个以赤塔为基地的中国男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爱看火车的人。但他是他那一时代典型的黄金走私者吗? 1930 年前后的黄金走私者与其他时期的走私者有所不同吗? 李召志的职业或许可以作为例子证明那些违反海关管理的人如何利用他们的跨文化身份以达到经济目的。但是,很难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走私者的思想状况。与其他"底层群体"(subaltern groups)的情况类似,历史档案中很少有关于这一边缘群体的生活记录。探索走私者跨文化身份(以及分析走私网络的复杂,和 1930 年前后中苏边境令人咋舌的"开放")的最好方法是去查看被捕的走私者的口供。在口供里,他们回

① ГАЧО. ф.13. оп.2. д.55. л.2-2 обл.更多例子参见同一文件中的 лл.31-37.满洲里站俄罗斯海关工作人员给赤塔海关地区调查员的备忘录显示,1916年冬天几乎每天都有携带黄金的火车乘客被抓。参见 ГАЧО. ф.78. оп.3. д.77. лл.2, 12-3, 15.

② ГАЧО. ф.13. оп.2. д.56. лл.142, 144.

答对他们的职业状况以及与"另一边" 联系的问讯,其中许多资料现在历史学家都可以得到。[©]我会集中关注发生在中苏边境上的两个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走私的典型案例。[®]这两个 1929-1931 年间在外贝加尔及周边地区活动的中苏走私者网络的案例,或许可以说明那时的跨国网络是如何运作,以及其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跨文化身份的。

第一个案例:读者已经知道赤塔车站的李先生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卷入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瓦西里"。"瓦西里"(资料中只提到了他的这个绰号)是个 30 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俄语流利,穿着具有"俄罗斯一外贝加尔风格"[®],一件黑色的短皮外套,一顶同样质地的帽子耷拉到他的耳朵上。从衣着上看,他已经很好地被同化了。像其他苏联边境地区的许多中国人一样,"瓦西里"从俄罗斯内战起就是一个居住在赤塔的移民工人。"瓦西里"通过自身努力,慢慢变成了一个生意人。到1920 年代中期,他在城市的中心市场老巴扎有一个蔬菜摊(图 1)。这个市场是赤塔城中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主要接触区。他的事业发展并未止于此。他和被赤塔人称为"农民"(Крестьянин)的同伙并不只是在大巴扎上卖黄瓜和洋葱,而是拥有一个更加辉煌的副业。他们从在东外贝加尔金矿工作的中苏矿工那里秘密购买天然金块和金沙,然后走私运到满洲里。令苏联官方开始怀疑他们的是,无论何时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要出发,和李召志一样,他们总会出现在赤塔火车站。正如之后所了解到的,

① 仅赤塔的地方档案馆就有几千本关于被捕走私犯的备忘录。最早的文件可追溯到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年。大多数案件记录于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仅第一个опись фонда Р-1243 "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таможня" 就有1703个文件,其中包括"被没收的货物信息(сведения о задержанных товарах)",如1930-1937年间的走私案件(但主要是1930—1932年间)。苏联和中国的案犯数量相当。多数问讯材料包括被没收货物的清单、抓获时的情况(走私者在距离国家边境多远的地方被抓获,抓获时是否反抗,等等)、对走私者的问讯记录(包括全名、年龄、出生地、国籍、宗教、教育、法律与金融状况、子女数目、兵役、党派、政治经历)、目击证人及家庭成员的证词,有时还包括判决结果。1930年代早期开始的问讯材料没有使用价值,因为编写这些材料的官员受到政治目的的驱使。

② 这里检视的两个案件都不是个别情况,两者都反映出当边境管理逐渐增强时走私的典型类型。例如,参见对1930年11月被捕的中国淘金者 Chu Jian 的问讯,他只是被记录的几百个相同走私类型案件中的一个。 ГАЧО, ф.f.Р-1243. оп.1. д.980. лл.1-11 обл.

③ ГАЧО. ф.Р-1243. оп.1. д.1360. л.4.

他们雇佣家庭主妇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Мария Землякова)作为信使, 把黄金从赤塔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儿再转交给其他中国人,由他们 走私进入中国。



图 1 巴扎 (барахолка) — 赤塔主要的市场, 1922 年 8 月 资料来源: 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是如何运作的?在 1929 年冬天到 1930 年春天,作为秘密信使泽姆利亚库娃三次成功地从赤塔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瓦西里"和"农民"在赤塔把黄金和钱交给泽姆利亚库娃。具有农业学校学历的泽姆利亚库娃女士在坐火车时用床单或其他不会引起注意的东西盖住这些利润丰厚的行李。第一次旅行时她还十分紧张,只带了 4400 卢布却拒绝走私黄金。第一次成功以后,她变得大胆起来,开始黄金和钱都带。之后,她每月旅行一次,每次携带至少 1 俄磅的黄金和成百有时成千的卢布。在她第一次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她按约定在市场附近的谢苗诺夫街等从赤塔来的"瓦西里"。在 7 号房子,他们与另一个中国男人碰面。此人俄语说得很好,和两个中国女人住在一起。泽姆利亚库娃从"瓦西里"那里了解到,这个

身材肥胖的绅士在 1920 年代 "新经济政策"时期拥有一个公司,在生意失败后他也没有变得很穷。她只见过他一次。不久之后,这个富裕的中国男人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了满洲里。在她第二次和第三次去黄金角(Золотой Рог)时,和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接头的是一位"中国医生"(доктор-китаец)。她的服务获得了高额报酬。在第一次旅行中,泽姆利亚库娃女士得到了 175 卢布,之后是每次 200 卢布。^①资料中并没有揭示为什么黄金被绕道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黄金最终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很可能走私者网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才开始运作。很可能中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将黄金带入满洲里,或者如果汇率合适,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将黄金兑换成外币,然后将这些硬通货走私进入中国。这一网络显然运转良好,但到 1930 年,警觉的政府开始关注腹地的走私网络了。

1930 年 3 月 27 日,赤塔东 35 英里的卡雷姆斯科耶(Карымское)车站。当搜查到 62 号列车时,泽姆利亚库娃的成功旅行就此结束。她把贵重行李扔到火车车厢连接处。这一行为并没有拯救她。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在泽姆利亚库娃的行李中找到了 1342 克黄金和 1755 卢布,其中只有 55 卢布是属于她的。警察没有找到"农民",但他就在同一趟车上。他坐在另一节车厢里,很可能及时消失了。"瓦西里"也下落不明。^②为什么警察没有逮捕他,或者第二个"俄罗斯中国人"(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ц) "农民"? ^③国家政治保卫局肯定对把这两个中国人抓个正着最感兴趣。"瓦西里"在赤塔的房子——有人看到泽姆利亚库娃在那里出现过几次——之前已经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搜查过。"农民"和"瓦西里"住在一起,"瓦西里"之前也被抓过。政府当然知道幕后主谋是谁。

警察果断地搜查了同一车厢的另外两名乘客,这让泽姆利亚库娃十分惊奇。她不知道"瓦西里"和"农民"在她身边安插了监视人员:李召志(读者已经从赤塔主车站知道了)和康新田(音译: Kang Xintian)。[®]和泽姆利亚库娃女士一样,这两个男人都被当场搜查了。李召志是在册的失

① ГАЧО. ф.Р-1243. оп.1. д.1360. лл.6-7.

② Там же. лл.20-21.

③ Там же. л.18.

④ 我们只知道他们名字的西里尔字母注音: "Ли Чжао-чжи"和 "Кын Сын-тиан"。

业人员,口袋里有 101 卢布,康新田是工厂工人,口袋里有 40 卢布。[®]对于赚钱很少的穷人来说,这显然是很大的数目,但要据此认定他们为走私者还不够。尽管如此,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巡逻兵逮捕了全部这三个人。工作人员知道,李召志和康新田在赤塔宽街(Широкая)共住一间公寓。两个人都是"瓦西里"和"农民"的亲密朋友。根据赤塔的某个经国家政治保卫局盘问的中国证人的证言,这四个中国男人作为一个小组行动,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是他们的俄罗斯"面孔":

"这个'瓦西里'经常到处旅行,但常常离开赤塔向东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方向走,这两个中国人李召志和康新田……与他在车站见面。我认为'瓦西里'买黄金,李召志是他的帮手。有一次我离开赤塔去一个村找工作。我没找到工作,在我回来的路上,李召志走到我跟前,问我是否碰巧带了一些黄金。他以为我是一个金矿矿工。我告诉他我没有黄金,当我问他问这个干什么时,他一个字也不说就离开了。(镇里的)中国人之间有传言。他们都知道'瓦西里'做黄金生意,从什么地方买到黄金,再通过这个俄罗斯女人卖掉。…她(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常常一个人来车站,但总被李召志远远跟着。她一上车,李召志就密切监视她。在她最后一次旅行中,当她被捕时,……不是'瓦西里'就是'农民'把黄金给了她。这两个人中的一个上了同一趟火车,在另一节车厢。但李召志和康新田这两个中国人就坐在这个女人的车厢,以便监视她。"^②

有意思的是,这个被盘问的年轻中国人将"瓦西里"称为"瓦西里",而没有提到任何中国名字。虽然这个中国证人记得他在他家里见过"瓦西里",并因此可能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但他为什么依然使用绰号?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不管警察如何不惜代价,这个被盘问的人也不会说出幕后人员的名字。当这两个被捕的中国男人不能隐藏在他们的俄罗斯假名(如果他们有的话)之后时,官员们用他们真实的中国名字称呼他们。走私者用不同的假名不是什么秘密。是否这两个被关押的中国人和泽姆利亚

① ГАЧО. ф.Р-1243. оп.1. д.1360. л.20.

② Там же. л.18-18 обл.

库娃一样,只是真正控制这个组织的"瓦西里"和"农民"的替罪羊,我们并不知道。

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看上去完全满足中国走私者的要求: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女士坐在苏联火车上,不会像一个中国乘客那样引人注目,也不太可能被警察搜查。而且,她从来没有在中国居住过,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中国文化也不熟悉。如果泽姆利亚库娃女士和"瓦西里"与"农民"一样具有跨文化背景,中国人"瓦西里"和"农民"也不会挑她来从事这项工作了。泽姆利亚库娃后来可能想到了为什么这两个中国男人坐在她的车厢里,因为她可能联系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其他中国人,等等。如事实所示,她只是中国走私者网络内的一个无辜的外人。

还有其他因素使得泽姆利亚库娃与这些中国男人合作,并使她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这就是信任。[®]泽姆利亚库娃女士与"瓦西里"和"农民"相识多年,她并不知道他们真实的姓名,但和其他俄罗斯人一样称呼他们为"瓦西里"和"农民"。泽姆利亚库娃女士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 1920 或1921 年赤塔的老中心市场。她和丈夫常常在那儿从"瓦西里"和"农民"的杂货店里买菜,——这发生在政府捣毁中国人生意之前好几年。[®]在1929 年下半年,"瓦西里"交给泽姆利亚库娃这个危险的信使工作。根据问讯记录,她在外贝加尔铁路管理局里当中级职员的丈夫库兹玛(Ky3ьма)最初可能帮他们买过火车票,但很快就担心起来,要他的妻子远离这些冒险的生意。但泽姆利亚库娃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项任务。轻松赚钱的前景可能打消了她的顾虑。信任在这里看起来也很重要:1920 年代早期,她有时在"农民"那里赊账买菜。自那以后,看上去她开始信任这两个"几乎是俄罗斯人"的中国人。像"瓦西里"和"农民"那样的居住、活动在不同文化空间,具有全面跨文化能力的人,可以在文化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他们不仅仅只是说俄语,穿得像俄罗斯人,他们对俄罗斯文

① 很奇怪,历史学中几乎没有把信任(confidence)作为一个分析范畴。乌德·弗列维特(Ute Frevert)编纂了对信任从中世纪至今在不同环境下的全面综述,涵盖了从政治到经济、市民社会、军事、家庭与友谊等不同领域。U. Frevert (ed.), *Vertrauen. Historische Annäherun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② ГАЧО. ф. Р-1243. оп.1. д.1360. л.6.

化也十分了解,这使他们可以与信任他们的俄罗斯人交朋友——这对建立复杂的跨国走私网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多年社会信任的建立和面对面的关系肯定促进了泽姆利亚库娃与"瓦西里"和"农民"的合作。那些称呼你为"朋友",让你改天付钱,并看起来"几乎与俄罗斯人一样"的人似乎可以放心信任。[©]

对这两个中国人的信任并没有把她从对金钱的贪婪中解救出来。档案 文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泽姆利亚库娃想过奢侈生活的想法。档案中只有 一次关于警察搜查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公寓的信息。国家政治保卫局官 员找到了一枚金戒指、一枚金胸针和价值 18 卢布用来补牙的黄金。^②她并 不是完全不考虑后果。"在最后一次离开(赤塔)前,她保证这是最后一 次,然后就有足够的钱去疗养院看病了",她丈夫后来回忆说。^③文件中 没有说这一案件的最终法律判决,但对本文来说这也可以忽略。

这一特别的案例还能告诉历史学家些什么?"瓦西里"和"农民"只是链条中的一段,还有许多其他人牵扯进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名中国医生和一名商人(文件中只提供了很少的信息),赤塔的李先生和康先生,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不知道的人。但"瓦西里"和"农民"是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他们联系起了缺乏跨文化身份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这对这一跨境事业来说是必需的。

场景切换:第二个案例的中心人物是 36 岁的阿卡迪•亚内切克 (Аркадий Янече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在卡雷姆斯科耶车站逮捕泽姆利 亚库娃一年后开始调查这个案子。也是黄金走私,也牵扯到俄罗斯人和中

① 弗列维特的书中并没有对信任作为走私网络前提的详细评论。但弗列维特在前言中,他提到了几个可能影响依赖程度的要素。U. Frevert, "Vertrauen. Eine historische Spurensuche", Frevert, *Vertrauen*, pp.7-66. 史蒂芬·戈里森(Stefan Gorißen)对前工业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了三个对在经济伙伴间建立信任至关重要的维度:第一,体系信任(Systemvertrauen),比如所有参与者都同意普遍接受的标准、价值与规则;第二,经济伙伴的社会信誉,比如可依赖性(Vertrauenswürdigkeit);第三,个人对商业伙伴的信任。至少最后两个可以用在瓦西里的"俄罗斯关系"上。参见S. Gorißen, "Der Preis des Vertrauens. Unsicherheit, Institutionen und Rationalität im vorindustriellen Fernhandel", Frevert, *Vertrauen*, pp.90-118. 特别是 pp.112-115.

② ГАЧО. ф.Р-1243. оп.1. д.1360. лл.7, 21.

③ Там же. л.4-4 обл., 引 自 л.4 обл.

国人。又一次,两个国家国民之间的持续关系帮助克服了国籍与民族的界限。这个故事发生在博尔贾(Gopsa),这是一个外贝加尔分支铁路线上的一个冷清之地,它连接赤塔和中东铁路,从边境坐火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内切克、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相反,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在亚内切克的厨房桌边碰到了四个中国男人。在这次搜查中,检查员发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白银、黄金制品和一条金腕表。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两件连衣裙、几件套装、几米长的白丝绸、羊毛套衫、毛巾和大量的茶叶——都来自国外。亚内切克试图让检查人员相信,银币和沙皇黄金硬币是他私人收藏的旧钱币,孩子们经常拿着苏联银币玩耍。根据亚内切克的声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是买来的。衣服和布料以前全都用过,"一些东西用过十多次,其余的只用过一两次。"[®]警察估算这些没收充公的东西价值 2000 卢布以上,因此调查委员会对亚内切克的走私行为确信无疑。检查员指控他非法从满洲里进口外国布料和茶叶,卖给俄罗斯消费者;黄金和白银制品则是他从苏联购买,并在国外非法销售。[®]亚内切克对于指控十分失望,他说:

"这令人十分悲哀,在这些情况下,苏联老百姓,不管是他们从国外回家,还是世代居住在苏联领土上,因为害怕自己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只要他们还拥有这些东西,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就得保留每一张海关收据或者是财产登记册。"[®]

他的请求没有说服官方,因为那些他希望用来证明自己所有权的文件 "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杯茶让一个朋友签署。" [®]两位博尔贾居民——中国 工人王力琛(音译: Wang Lichen)和清洁女工玛尔法·布尔佐娃 (Марфа Бурцова)是检举证人。两个人一致指认亚内切克是走私犯。布 尔佐娃女士就在最近还看到"一些中国人" 拿走藏在亚内切克家里的衣

① ГАЧО. Ф.Р-1243. оп.2. д.8. лл.7, 30-31, 引 自 л.30.

② Там же. лл.51-53.

③ ГАЧО. Ф.Р-1243. оп.2. д.8. л.31-31 обл.

④ Там же. обл. л.52.

服,把它们运到别鲁哈(Белуха) 矿换取黄金和白银。只要这些中国人出现在亚内切克家里,他就与他们说话。布尔佐娃说,这一生意持续了一年。这位女士确认亚内切克将把黄金卖给满洲里的投机商。^①和俄罗斯人结婚的王力琛在他的声明中支持了布尔佐娃的观点。他添加了更多指控,说亚内切克甚至常常把走私来的东西卖给博尔贾地区的人。他从中国走私者那里拿到进口来的布料,中国走私者则在回去的时候走私黄金和白银。^②

阿卡迪·亚内切克是如何拥有如此众多的中国朋友的?和前一个故事一样,人物的生平十分具有启发性:亚内切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苏联人。他 1895 年出生于沃伦斯基辖区(Bonsinck,今天乌克兰西北),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接受调查时他是博尔贾国家银行分行办公室的会计人员。但他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开始这一工作。从 1907 到 1928 年,他在不同地方以不同职位服务于俄罗斯和苏联海关。他最长的任职是在位于中国领土上的满洲里海关,他在那里工作了九年。^③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交朋友,正如亚内切克所间接承认的:

"在我家的满洲里商人中我只认识辛范斌 (音译: Xin Fanbin),其他人我以前既没有见过,也从来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第一次见到(辛先生)是当我住在满洲里的时候,那时我常常和他做生意。但我从来没有向国外卖过白银和黄金,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在我家里把搜查来的白银和黄金物品卖掉。" [®]

辛范斌被问讯时也承认他与亚内切克有密切联系,并回忆说他们从 1922 年起就开始做生意。他的背景也能提供一些启发。和满洲里的大多数中国移民一样,34 岁的辛范斌来自中国山东省的一个村庄。^⑤1928 年 7 月亚内切克离开满洲里去博尔贾后,他与辛范斌的联系并没有中断。1929年,在辛范斌的兄弟去莫斯科的路上,亚内切克接待了他。^⑥对辛范斌来

① ГАЧО. ф.Р-1243. оп.2. д.8. л.31-31 обл. л.6.

⁽²⁾ Там же. л.5.

③ Там же. лл.7, 21.

⁽⁴⁾ Там же. л.7.

⑤ Там же. л.21.

б Там же. л.7.

说,这也不是第一次去国外。从 1928 年到 1930 年,他去过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Екатеринослав,现名字为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石头城(Каменец-Подольский),以及其他苏联城市,他在这些地方的街道上售卖不同的东西。当苏联官员问他,他和其他三个中国男人在亚内切克的房子中做什么时,辛先生用流利的俄语说,他们要去中国西部寻找工作。他们想通过苏联转道去新疆。因为预算有限,他们没钱买去中国西部的全程票,因此决定先买到博尔贾的票,停下来短暂拜访一下他们的"好朋友"阿卡迪•亚内切克。[©]

走私文件留下了许多未回答的问题。它没有告诉我们辛范斌和亚内切克在满洲里的"黄金二十年代"(golden twenties)里从事什么生意——我们应该记住,亚内切克是被苏联海关正式雇佣的职员。评价当时的判决是正确还是错误,这看起来更不可能。亚内切克和辛范斌的辩解听上去都言之成理,判决和证词看上去也是。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法律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件揭示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阻隔和民族感情在其中却并不重要。阅读这些文件时,人们几乎可以忘记 1929 年中国和苏联正在打仗——满洲里正是主要战场。

对比第一个案例,以及关于"跨文化主义"的概念,亚内切克和辛范斌都居住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作为海关人员,亚内切克在满洲里工作了近十年,这是一个位于中国领土的边境城市,却拥有同样数量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海关稽查员的工作使他每天都会见到中国人。档案资料中没有提到他是否会说中文或者有一个中国名字。但是,与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比较起来,阿卡迪•亚内切克肯定具有一些全面的跨文化能力,可以动员起来服务于他的走私生意。他把自己的厨房改造成了一个用以储存走私物品的仓库。辛范斌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同样密切。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苏联的黑市上做生意。无论是辛范斌还是亚内切克,两人都拥有交叠的生活和对"其他"文化的深厚知识,这使他们一旦需要,就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可能性中作出聪明的选择。

① ГАЧО. ф.Р-1243. оп.2. д.8. л.31-31. обл. л.21.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案例提供了关于中苏边境上走私活动重要性的一个新视 角。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走私交易不仅仅只具有经济意义。历史学家通过 走私者网络、走私者的事业以及生平,也可以研究边境地区的跨文化身份 与民族间的联系。

沿中国边境地区的走私行为当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到 1920 年代末,走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对抗,对边境的控制变得严格起来。到 1930 年,从事走私的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火车乘客或金矿矿工,此时出现了更加复杂的走私者网络和新的走私交易策略。直到那时,货物流通与走私者跨文化身份之间的联系才变得清楚起来。

这两个案例的重要性是什么?"农民"和"瓦西里"具有跨文化身份吗?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跨文化身份来从事非法贸易吗?那么,那个当初的海关工作人员阿卡迪•亚内切克呢?是否只是因为他与中国人做生意,他就具有了跨文化身份?因为资料来源中并没有揭示,像亚内切克先生和来自中国的"瓦西里"那样的人是如何界定他们自己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学家必须猜测。那么,此时对赤塔的"瓦西里"案和博尔贾的"亚内切克"案进行归纳是否合适?当然,外贝加尔的黄金并不总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中国。最短的路线,坐火车过满洲里或坐船穿过额尔古纳界河——如在"亚内切克"案中——似乎更为普遍。许多慢慢消失的黄金也可能最终藏在某个苏联家庭的枕头下或帽盒里。尽管如此,还是常常可以在档案资料中发现1930年代前后像"农民"和"瓦西里"这样的跨文化人物。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案例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对亚内切克和"瓦西里"这两个案例的研究可以说明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们展示了中苏边境上的走私者网络是如何通过长期的社会和经济 联系建立起来的。如本文所示,走私者在卷入复杂的走私活动之前,常常 已经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接触区中生活了许多年。阿卡迪•亚内切克在 一个中国城市为苏联海关工作。辛范斌以及其他两个中国人"农民"和 "瓦西里",在建立走私者网络之前,在苏联的集市上做生意。他们主要 的同伙都是老朋友或老客户。亚内切克以及"农民"和"瓦西里"在参与走私活动之前已经认识他们的合作者好些年了。这些联系转化为走私网络,其中的所有人都受益于这种跨国的共生关系。此外,"瓦西里"案解释了像玛利亚•泽姆利亚库娃那样的俄罗斯人如何被利用作为苏联内陆的"掮客",它显示了普通俄罗斯人如何与常常隐身幕后的中国走私者进行合作。"亚内切克"案则描绘了另一项有时使人卷入走私活动的重要技能,即一种特定的职业联系,如作为海关工作人员。

某些其他结论也很容易得出。两个例子都说明,走私者作为一个在复杂环境中工作的社会群体,可以被定义为具有产生于跨文化生活背景的特殊技能的人。两个研究案例的一个突出相似点是,长期生活在俄罗斯和苏联的中国人参与走私。这些人也说俄语,熟悉俄罗斯文化。案例研究描述了中国移民对俄罗斯以及之后苏联社会的融入。两个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阿卡迪·亚内切克虽然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多文化城市生活了九年,但很可能除了一些基本的洋泾浜词汇外并不会说中文。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些网络的人都有移民历史。但是,因为与中国人的持续接触,他似乎比较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且与中国人相处良好。"农民"、"瓦西里"和亚内切克也可以同样被称为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专家"。通过研究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清楚地发现,走私者策略性地利用他们的跨文化能力以服务于经济目的。是走私行为创造了跨文化身份,还是跨文化性是成为成功的走私者的前提,这个问题仍然可以讨论。但无可置疑的是,跨文化背景一定是成功的走私活动的前提。另一方面,走私网络中的互动反过来加强了跨文化技能。

(滕静茹 译 张 昕 校)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lives of smugglers in the Sino-Soviet borderlands during the late 1920s and early 1930s. While studying phenomena of smuggling, historians can – besides its economic dimension – also learn about identities of smugglers, which go beyond the notions of 'nation' or homogenous concepts of 'culture'. How was the transfer of commodities connected with

smugglers' identities, which, in turn, shaped their strategies and networks? To answer this key question, the text focuses on smugglers'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Sino-Soviet borderlands.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China, Eastern Transbaikalia, Border, smuggling

[Аннотация] Жизнь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 конце 1920-х -начале 1930-х годов — вопрос достойный изучения. Кром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аспекта контрабанды историк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контрабанды изучения явления также ΜΟΓΥΤ ПОНЯТЬ создание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ами выходящего за рамки «нация» или «культура» понят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ак связаны между собой поток товаров 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ов, а также наоборот,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ов определяет их контрабандные сети и стратегии? Анализ транскультурны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ей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помогает ответить на данные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Китай, Восточное Забайкалье, пригранич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трабанда

(责任编辑 张 昕)

俄罗斯研究(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2 期

(总第 180 期)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 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 021-62232113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 中国知网

网址: 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 公开发行 ·

定价: 20.00 元